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间谍战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丰富的内容，充实的材料介绍了二战以来各大国及热点国家之间的情报及间谍活动，生动地讲述了发生在另一条战线上的形形色色的更为隐蔽、更为激烈和更为残酷的战争。

引 言

间谍的历史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久远。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可以说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间谍。

远古时代，在部落、家族相互交战中，间谍活动就已成为敌对双方攻与防的重要谋略和手段了。公元前5世纪，我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在《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对间谍、反间谍活动的规律作了理论概括，提出了“五间”之说。他的间谍理论在古今中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宋太祖赵匡胤在宫廷内设立的“皇城司”，是世界上最早的直属于皇帝的间谍机关。在中世纪的欧洲，伴随着频繁战争和社会变革，间谍活动逐步得到发展，各国先后设置了比较完备的间谍机关和间谍网。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把间谍活动直接用于掠夺和战争。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则把间谍、反间谍活动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两次世界大战为间谍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间谍战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二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推行全球战略、争霸世界所展开的间谍战，把间谍活动推向了极盛时期。超级大国的黑手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的间谍活动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

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是间谍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高技术武装了间谍，高技术本身又是间谍猎取的重要目标。

高技术情报侦察领域的广泛运用，尤其是间谍飞机和间谍卫星的大量出现，为间谍活动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间谍的传统概念。目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大部分军事情报是靠卫星侦察获取的，卫星已成为不折不扣的超级间谍。在间谍飞机、间谍卫星大显神威的今天，用高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人工间谍，仍在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电脑间谍”正在悄悄兴起。

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许多国家都在酝酿改革自己的情报间谍机构，但是谁也不想削弱它。

秘密战线裁军无望，间谍战休战无期。

现在，就让我们撩起间谍黑幕的一角，领略一番现代间谍战的奥秘。

间谍战

一、无处不在的电子间谍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用这句话形容电子间谍是十分贴切的。在太空有间谍卫星，在大气层中有间谍飞机，在海上有谍船、谍艇以及安放在海底的各种监听装置，以及像臭虫一样多的窃听器令人防不胜防。电脑间谍战方兴未艾……

(一) 海上间谍

1. 庞大的间谍船队

(1)美国间谍船队的组成 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准建立间谍船队。第一艘被国家安全局选中作为间谍船的是“瓦尔德兹列兵”号，它的主要任务是监听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及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内部的斗争情况。第二艘是“莫勒军士”号，其主要任务是监听古巴情况。它们是海军即将退役或已经退役的勤务船只，其貌不扬，行动缓慢，但隐蔽性好，且能最大限度地搜集和截获电磁辐射信号，是理想的海上流动间谍站。以后相继加入间谍船队的有：“牛津”号、“乔治城”号、“詹姆斯城”号、“贝尔蒙特”号、“自由”号、“旗帜”号、“普韦布洛”号、“棕榈海滩”号，等等。

美国利用间谍船在汪洋大海中进行情报活动，虽已不算稀奇，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间谍船的底/细知之甚少。自从“普韦布洛”号被捕获以后，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普韦布洛”号遭擒 “普韦布洛”号间谍船是由一艘二次大战时建造的供应船改装的，船上只有两门口径为50毫米的机关炮，几乎没有自卫能力。

1968年1月23日，“普韦布洛”号驶进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海域，被朝鲜政府扣押，人赃俱获。船上83个美国人中除麦克·布恰船氏和直接驾驶这艘船的舵手以外，都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从事情报活动的专家，其中，修马克中尉和海里斯上尉是这艘船上进行情报活动的指挥者。船长麦克·布恰供认：“我们在侵入朝鲜海域后，在清津、元山等许多地点，侦察各种军事目标的配置状况，监听、搜集各种电波，观测朝鲜领海的水深、潮流、水温以及盐分、透明度等情况，侦察朝鲜雷达警戒网的配置情况和港口的容纳量、出入港口的船舶数、兵力以及海军舰艇的机动情况等等。”海里斯上尉在供词中写道：“我的任务是甲电子侦察装置搜集雷达信号和各种无线电波，向驻日本的美国太平洋海军电子情报总部报告，还通过那里接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指示。”从船上缴获的高度精密的侦察设备及许多文件则是这艘船进行情报活动的物证。间谍船装有电子和无线电设备，以及译解密码的电脑。它们的任务是监听对方战术通信系统。它们有庞大的天线来接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用电子设备消除噪音和静电干扰。它们还装有测向器，以便确定它们监听的电台的精确位置。它们的无线电接收机是与磁带录音机的键盘连接在一起的。

专业人员立即把那些最迫切需要注意的东西从搜集到的资料中挑出来，用船上的电子计算机把它们译出。截获的其他资料则先记录下来，留待以后处理。间谍船还从事电讯分析，即研究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模式，以确定对方军队的战斗序列、部署和战备状态。它们还搜集对方雷达的战术技术参数，以便采取相应的电子对抗措施。间谍船也对水面舰船和潜水艇进行监听，即利用声纳系统了解特定地区水面舰船和潜水艇往来的情况。为了保证安全，间谍船安装有机械保险装置，以便必要时毁坏自己的秘密装备使其免于落入敌人之手。在“普韦布洛”号事件中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之一，就是自毁机械装置在应该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间谍船的自卫能力很差，它装载的侦察设备比间谍飞机多得多，因此间谍船就成了敌对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普韦布洛”号事件和1967年以色列

对间谍船“自由”号的误射，这两件事迫使美国做出选择，要么为间谍船提供护航，要么中断这类船的海上侦察活动。美国选择了后一种办法，同时扩大了“侦察潜艇”的活动范围。

(3)前苏联间谍船的踪迹 前苏联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拖网船型间谍船队。在世界各大洋上，经常可以看到苏联间谍船的身影。

前苏联海军原来使用改装的拖网船，一种典型的改装的拖网船为排水量720吨、共有32名船员的“海洋”级。由于电子装置数量不断增多，以及要求船上配备更多的专家，使得间谍船的尺寸和定员一个劲儿地扩大，最新的“树香脂”级间谍船，排水量达4000吨，有180名船员。毫无疑问，这些间谍船孜孜不倦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前苏联海军掌握北约海军实力、战术和部署的全貌，而且还为它在改进海上加油、航空母舰的操作等技术方面，节省了好几年的时间。

前苏联间谍船的兴趣似乎无所不包，从发射导弹到扫雷，从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到最单调枯燥的海军作业，都要窥探一番。

间谍船获取的大部分情报必须记录下来，并带回去加以分析。但是，一些“热门”情报则通过更快的手段传送回去。多年来，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格局，图-95“熊”D式飞机总是在间谍船的上空飞来飞去，很可能担负传递信息的任务。后来，这种信息是通过卫星来传送的。有相当数量的间谍船在舰桥上面安装有大型长方形罩，一个可能的用途是覆盖卫星通信天线。

前苏联间谍船用于尾随在公海上航行的北约舰队，或为某种特殊目的停在一条专门的巡逻线上。它们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北爱尔兰海岸附近，在那里可以监听英国陆军及北爱尔兰警察总部的无线电网的通信，也可监视导弹核潜艇进出克莱湾的情况。前苏联间谍船曾在英吉利海峡追踪法国试航的第一艘装有热核弹头的导弹战略潜艇，也曾闯进英国北海油田，距两台石油钻机仅500米进行侦察。在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都留下了它们的踪迹。

毫无疑问，在这些船的上层结构或底舱中，隐藏着许多探测器。图1标出了看得见的探测器，每根桅杆的顶部都有一个测向环。舰桥上面有一个大型建筑，估计是为了给监视专家和他们的设备提供更多的工作空间用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作空间，舰桥前部的上甲板又向前延伸了一段。

图1“海洋”级拖网船

圆锥全向接收无线； 雷达接收机； 测向环； 高频接收用的折叠偶极子天线； “顿河-2”导航雷达； 垂直杆状天线； 雷达接收机； 偶极子天线同轴馈电线； 用于偶极子单端供电的馈电天线护板； 环形测向天线

间谍船给前苏联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一些价值颇大，但大多数可能没有用处。不过，间谍船毫无疑问得以密切监视北约的演习，监视西方航空母舰的操作和军舰航行中补给的程序，这些程序随后都被有效地利用到前苏联海军中去了。

更加现代化的“海滨”级间谍船，是专门设计的，船体更大。间谍船没有什么标准装备，同一艘船，不同航次，携带的天线和探测装置可能截然不同。携带什么装备取决于执行什么任务。

2. 神出鬼没的“磨石”

美国的侦探潜艇在 1960 年 U-2 事件后的短时间内就投入了间谍活动，它们的应用随着“普韦布洛”号落入敌手而增加。有时，侦探潜艇在前苏联海岸的活动进入到美国正式承认的 3 海里的领海内，远远超过了前苏联宣布的 12.5 海里的领海范围，在他们长久监视前苏联海岸线期间进行的所谓“磨石行动”中，间谍潜艇至少发生了两次险些被捕获的事件。这一行动始自 1959 年，内容还是截取和拍摄两个方面。主要目标是前苏联，有时在行动中，也捎带上越南和中国。所以经常会渗入前苏联、越南和中国的 3 海里领海水域。

属于这项计划的每次任务规定为 90 天。事先都编造好一套故事，以便应付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例如说他们是在进行海底测量，或是利用声纳研究海洋水温、实地核实从卫星取得的有关海洋资料数据等等。

执行“磨石”任务的规章制度特别严格。全体船员严禁擅自开动电子设备，以防被前苏联反潜设备测知和侦破。甚至开关舱门都得小心，一点多余的声音都不许有。

这项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了解到了有关前苏联潜艇部队的大量重要情况，像苏制潜艇的外形、结构、功能和噪声类型，以及这些潜艇的导弹和导弹发射能力等等。任务要求中有一项是识别“声音真迹”，掌握前苏联潜艇的动向。

所有这些拦截和拍摄行动其实都瞒不过前苏联人的眼睛，也不是往来自由全不冒半点风险的。例如，1961 年 8 月 28 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就播放了塔斯社的一篇声明，指责“外国潜艇”犯下了若干“侵犯苏联国家海岸线的行为”，而这些潜艇的目的“都是为了侦取，苏联的军事情报的”，因此，塔斯社最后警告说，前苏联政府已命令国防部“采取措施摧毁这些入侵者”。

到此时为止，美国间谍潜艇在活动时尚未受到攻击，但出现国际纠纷的潜在可能性一直存在，而今则越发明显了，而且不久之后，也确实出现了千钧一发、死里逃生的情况。拿拍到前苏联 E 级潜艇底部照片那次为例，当时美国潜艇撞着了那艘苏制潜艇的底部，撞坏了自己的指挥塔。在转身潜逃的过程中，前苏联潜艇一直紧追不舍，费了不少周折，才让美艇侥幸逃脱。另一次事件是一艘“磨石”潜艇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乖乖地呆在岸边，等于在前苏境内关了两个小时禁闭。

“磨石”不但提供音像情报和遥测技术情报，而且还窃听前苏联在大洋底部铺设的海底电缆。这方面美国收效甚丰。前苏联军政方面由于无线电通信不安全而改用海底电缆传送的机密内容，结果还是落入美国人手中。1980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佩尔顿(化名“朗恩先生”)逃进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并立即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美国利用潜水艇从前苏联军队架设在鄂霍次克海的海底电缆上搭线窃听前苏联军事通信。佩尔顿还在地图上指出了窃听的位置。这使前苏联人大为震惊。前苏联驻美大使馆将上述情报急报莫斯科。前苏联军方果然发现了海底电缆上的搭线窃听装置，并立即予以拆除。

现在已改名为美国海军情报支援中心的当时美国海军科学和技术情报中心有专职的分析人员，利用特种精密结构的磁带录下的潜艇引擎和其他设备发出的各种噪音，区别前苏联各条潜艇。这种识别的真切程度使得美方潜艇在洋底远程跟踪时，也能正确无误地盯住具体目标。前苏联每条潜艇从下水到退役的全部动态全在这些分析人员的记录本上。

“磨石”计划也能监视海上发射战略导弹的情况。

在这项计划以前，有些前苏联从海上发射的导弹往往躲开美国的视听，进行以美国内陆为靶子的试验。这成了美国情报网上的一大漏洞。“磨石”项目指挥下的潜艇就具有潜近发射场地就近观察发射情况、提供导弹发射各个阶段的全面情况的能力。“磨石”计划在这个方面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是前苏联技术人员在发射导弹之前，在计算机上运算后取得的读出数和实际应用的信号，甚至还能够提供它们的追踪导弹飞行的具体情况和导弹着落后的各种情况，包括制导的持续过程和有关电子系统方面的情况。

在70年代初，美国海军部长的例行公事之一就是每周四早晨的情报碰头会。会上除了必谈“磨石”的收获和任务外，还要放上一段幻灯片，都是“磨石”执行任务的现场情况和实地拍得的目标照片。根据看过当时放映的幻灯片的与会者回忆，这些有关前苏联潜艇的照片，都是抵近拍摄的，极为真切。

3. 遍布海底的“苏萨斯”

以上介绍的都是在海面上主动进行的侦察作业。为了对付迅猛发展的前苏联潜艇力量，从50年代起，美国在大洋底部大作文章，研制成一种固定的阵列系统，专门监听水下潜艇的动静。

这套阵列系统的全称是音响监视系统，简称“苏萨斯”。

1950年开始研究时的代号是“凯撒”。当时海军拿出一种声纳系统的新设想，委托贝尔电话工程公司负责研制和安装。具体要求是沿着海床、海底岩石和大陆架，全面铺设长串的传感器，连成一体，成为一个完整的监听结构。

1954年，第一批阵列系统下水，安置在美国东海岸外缘的大陆架上。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1979年时曾对“苏萨斯”的情况作过如下介绍：一套“苏萨斯”设备包括一整套阵列系统，也就是数以千计的水听器。把这些水听器逐个放在水底传达声音效果最佳的部位，然后用水底电缆把它们门串连起来。从任何远处传来的水下声浪只要一进入这个阵列系统的范围，都会被水听器察觉。根据不同水听器先后察觉的顺序，还能判断声源的方向。通过测量阵列系统内的声线的分布，或者在相互连接的阵列之间进行三角测量，就可进一步计算出阵列系统和声源之间的距离。

“苏萨斯”网络日益扩大。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更先进的阵列系统。美国继东海岸之后，又把格陵兰、冰岛和联合王国三者之间的水底空隙结合部全都用阵列系统覆盖住了。这个结合部是前苏联潜艇西出大西洋驶往美国的必经之途。

到了60年代后期，阵列系统的铺设大为增多。在最初的“凯撒”基础上改进提高，出现了名为“考洛萨斯”的新系统。现在美国太平洋地区沿岸一带铺设的都是这种新阵列系统。从顶端的阿拉斯加开始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半岛。从太平洋沿岸再向外伸展，形成一圈长达2000公里的环形地带，夏威夷也圈在里面。

另外还有一套阵列系统，也是从阿拉斯加开始，由阿留申群岛一直贯通到千岛群岛西侧。这一套阵列系统全部掌握了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军基地驶出的潜艇动静和在鄂霍次克海中的潜艇的出海情况。

水听器其实是密闭储存于盒箱内的部件，每箱24个，全由电缆连接。听到的信息也由电缆传至岸上设施，加工整理成为可用的情报。

经加工整理过的材料通过陆地线路或者舰队卫星通信系统传送到主要评估中心。这里将各处送来的材料集中、印证、核实、并联，然后定出重点，追踪潜艇目标。

根据素材加工后的情报积累，逐步掌握前苏联制潜艇的声纳回声，引擎、冷却系统和螺旋推进器转动时所产生的不同噪音的特点，译析并归纳成为进一步辨认和识别的信号依据，从而做到通过声音就能很快知道对方是 A 级的进攻型潜艇，还是飓风级携有弹道导弹的潜艇，还是其他级别的潜艇。甚至还能进一步逐艇辨认这是“某某号”或是“某某号”。所以说，这些掌握了定型材料，就像通过指纹或音像可以辨别人一样，也可以据以辨别各条苏制潜艇。

总之，“苏萨斯”具有的辨别能力，能在近百公里半径范围内和远至数千公里的距离内找到要找的那条潜艇。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苏萨斯”性能的研究报告说，只要环境条件良好，即使相隔距离大到 1.5 万公里，也有可能发现那些噪音较大、比较陈旧的苏制潜艇所在，范围不出方圆 15 公里。如果把距离缩短几千公里，同时，把潜艇可能所在范围扩大到 40 公里的话，那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是一找就准。

在 1962 年前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引起的美苏冲突过程中，“苏萨斯”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当时在该地区内的每一条苏制潜艇无一不在美方掌握之中。

1978 年 4 月，两艘苏制 Y 级潜艇异乎寻常地驶近美国东部海岸，被“苏萨斯”发觉。美国防务系统产生连锁反应，好几处战略空军基地发出警报，因为那些地区正是苏制潜艇携有的弹道导弹的主要攻击目标。既然美国严阵以待，前苏联潜艇只好识趣地退避了。

前苏联对付“苏萨斯”的办法是用拖网渔船钓吊水下电缆，苏制的小型潜艇也到处转悠，专找水听器阵列系统的位置。据说前苏联方面可以在割断电缆并破坏功能后，在外观上恢复原状，一点不露破绽。就是在查出毛病时，看起来也是意外事故而非外界破坏。美国后来采取的对策是建立一支电缆修复船队，加强巡逻，及时抢修。这支船队的代号是“T-ARC”，由军事海运司令部领导。

但是，暴露弱点最充分的一次是 1980 年的事故。一艘苏制 A 级攻击型潜艇竟然躲过了大西洋北部的“苏萨斯”。如果这条潜艇始终保持静默，不打开它的无线电的话，最终可能不被发现。这表明了前苏联在潜艇消音方面的卓越成效。

美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1984 年初，又搞了一个改进“苏萨斯”功能的计划。

另一方面，前苏联潜射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SS-N-6 射程近 3000 公里，SS-N-8 达到 7800 公里，SS-N-8 超过 9000 公里。这样，为了打击美国本土，前苏联潜艇已无需扛着导弹，冒风险远涉重洋了，只要呆在家里，按动电钮，就可以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美国的“苏萨斯”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二) 间谍名机

利用飞机进行间谍活动，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间谍卫星出世之前，间谍飞机是空中间谍活动的主角；在间谍卫星广泛应用的今天，各种各样的间谍飞机仍在以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活动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同外国的和台湾的多种间谍飞机打过交道。P2V-7、RB-57D、U-2、147 系列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都遭到了人民解放军毁灭性的打击。

这里对美国研制的著名的间谍飞机 U-2、SR-71 及其后继机做些介绍。

1. 风流的“黑妞”

U-2 是 50 年代中期美国专门研制的一种高空间谍飞机，外号“黑妞”。有一段时间，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连前苏联也拿她没办法，着实“风流”过一阵子……

(1)赫氏施巧计，艾克受惊恐 1955 年 8 月的一天，前苏联在莫斯科附近的图申斯克机场进行航空表演。表演开始后的一个小时，第一批 10 架 M-3 出现在莫斯科河上空。它们呼啸着掠过人们的头顶，然后转弯，消失在天际。几分钟后，第二批 18 架 M-3 又出现了，接着是第三批。应邀观看的各国外交官们看得眼花缭乱。然而轰鸣的机群似乎没完没了……使美国空军武官查尔斯·泰勒震惊的是，前苏联的这种新式战略轰炸机要比刚刚装备美国空军的同类型飞机多 4 倍。几个小时以后，华盛顿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使馆的“特急密电”……

当时谁也不知道，1955 年 8 月，美国使馆的武官成为前苏联上层精心导演的图申斯克上空表演闹剧的牺牲品。一切极其简单，参加表演的不过是同一批飞机。第一批飞过后，在远离机场处加入另外几架组成第二批，周而复始。使泰勒震惊不已的第二批 18 架飞机，实际上几乎是前苏联远程航空兵的全部家当。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以其独有的方式，显示前苏联远程航空兵的实力，以取得与艾森豪威尔平等对话的地位。

图申斯克航空表演确实使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惊恐不安。中央情报局加紧寻找揭开“铁幕”的方式。

(2)意欲揭“铁幕”，U-2 应运生 与 U-2 飞机有关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53 年年底白宫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防止来自苏联的核进攻”。会上成立了以詹姆斯·基里安为首的专门委员会。会议对如何实施侦察感到棘手，B-29 飞机作为有效的侦察工具已经过时，间谍卫星尚未问世。委员会提出：装备有高精度大型相机的轻型高空飞机可胜任这一任务。

1954 年 12 月，美国总统批准中情局长杜勒斯造 30 架新型侦察机的计划。在这之前，洛克希德公司按照五角大楼的决定，已着手进行研制。这使艾森豪威尔规定的距首飞日期不得超过一年的期限得以完全实现。这项工作耗费了不经国会的中情局长特别基金 3500 万美元，由中情局副局长、“上升之星”理查德·比塞尔负责。

比塞尔集中了美国最好的飞机设计专家，其中包括曾设计过能飞 24000~27000 米高飞机的著名工程师克利，约翰、照相机制造专家杰尔。按照比塞尔的说法，新式飞机更像一个周围装着照相机的空中风筝靶。斜向后切的高高的垂尾飞行中阻力很小。

15 米长的机身，配上纤细修长的双翼(翼展 24.38 米)，从航空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几乎完美无缺。新型飞机很象滑翔机。正是由于这点，使它能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以最省的耗油飞行 10 小时以

图 2 U-2 飞机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飞机的结构很脆弱。据中情局估计：一旦失事，该机很容易解体，飞行员绝少有生还希望。另外，为防备万一，U-2 特别安装了可在飞行员跳伞后几秒之内引爆的自毁装置。然而，飞行员们谁也不相信中情局，不知道弹射装置和自毁装置到底谁先谁后爆炸。后来，鲍尔斯在前苏联乌拉尔上空还是决定不以自己的生命冒险，未启用自毁装置，从而给赫鲁晓夫送上一份珍贵的礼物——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

1955 年 8 月，在一次例行会议上，比塞尔急于显示飞机及其设备的性能，他向艾森豪威尔出示了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拍摄的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照片。照片是 U-2 在 16 公里的高空拍摄的。在绿色草坪的背景中，高尔夫球场清晰可见。总统信服了，并为 U-2 开了绿灯。

(3) “黑妞”露峥嵘，“白熊”无计施 1956 年 6 月 10 日，比塞尔在白宫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前苏联上空飞行的一个详细计划。最后的决定是总统在小范围内做出的。了解内情的只有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他的兄弟约翰·杜勒斯以及总统的私人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飞行被批准了，但只限于最近两周内进行。”古德帕斯特通知等在白宫接待室中的比塞尔说。

气象预报：3 天后，前苏联的欧洲部分天气晴朗。比塞尔立即下达了命令。1956 年 6 月 14 日，U-2 从联邦德国的威斯巴登起飞，航向直指莫斯科。它飞过克里姆林宫上空，然后转向列宁格勒，最后飞往波罗的海沿岸。6 月 15 日清晨，得意洋洋的比塞尔向其上司报告：“艾伦，我们成功了！”当杜勒斯获知首飞路线后有些惊慌：“第一次就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恰恰因为是第一次，它的危险性就更小。”这位有经验的副手说：“上午 10 时我接到报告——整个密报只有一个字，但它明确地告诉我，任务完成了，这是个不寻常的激动人心的时刻。”21 年后，比塞尔回忆说。

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飞行。比塞尔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批给他的两周时间。后来他甚至按不同路线同时派出了两架 U-2 飞机的这些侦察行动戏剧性地与当时美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访问前苏联的日期巧合。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间谍活动的替罪羊。赫鲁晓夫 1960 年 5 月 9 日在捷克驻苏使馆讲话中说：“他(指特文宁)离开我们的第二天，就派来了高空侦察机。该机飞到了基辅……只有畜生才会干出像特文宁那样的蠢事——在刚吃过的地方屙屎。”

在前苏联的抗议下，艾森豪威尔一度下令中止飞行计划。然而 U-2 飞行中所拍摄的照片很快又使他改变了主意。在 2 万米高空拍到的克里姆林宫停车场上小汽车清晰的图像，比先前的高尔夫球场照片更有诱惑力。于是机翼修长的 U-2，一次又一次飞临前苏联的领空。与先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每一次飞行，都要得到总统的亲自批准。

间谍飞行在继续。中情局确信高空侦察万无一失。由于当时没有与 U-2 争斗的兵器，俄国“白熊”只得忍气吞声。美国总统及其左右认定前苏联人暂时不敢公布 U-2 在其领空飞行的事实——这等于承认前苏联国土防空军的软弱无力，对克里姆林宫的国内威信无疑是个打击。

(4)美苏核竞赛,U-2立大功 1957年6月,U-2带回来一个不祥的消息:在前苏联拜克努尔靶场发现前苏联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SS-6。通过高质量的空中摄影,美国人在导弹首次发射之前(8月3日)就已相当准确地掌握了它的尺寸和基本技术特性,包括遥控数据在内的补充情报,是通过距伊斯坦布尔37公里处的跟踪站获得的。当然这仅反映了部分问题,重要的是要搞清计划生产的导弹数量和部署时间。答案只能根据建设中的发射场数量和试验强度等情报得出。

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邀进的记者们建议,忽视前苏联工艺飞跃发展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好还是去关心他所钟爱的高尔夫球,而让能保卫国家并能组织有效侦察的人来当总统。《生活》杂志直言不讳地向美国人宣布:“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那么不迟于1975年,美国将变成苏联的一部分。”然而美国当局清楚,所谓对美国的威胁是凭空臆造的。据中情局分析,前苏联在生产和部署SS-6导弹上遇到困难。U-2未发现大规模部署的明显征候。

SS-6导弹庞大而笨重,运输及安装困难。前苏联在1960年才部署了其中的5枚。

虽然美国空中侦察未获得前苏联大规模部署导弹的事实,但它的忧虑也不无原因。苏联1959~1960年一系列太空成就引人注目,精确的太空试验和强大的运载火箭(1959年9月,SS-6将重1151公斤的飞行器送上轨道)证明了前苏联火箭制造的巨大潜力。1960年前苏联又开始组建战略火箭军。U-2的工作量随着核—太空军备竞赛的速度加快而加重。

U-2的空中侦察计划在50年代未达到顶峰。“只要提前通知我,那么24小时之后,我的U-2将出现在地球上任何一点的上空。”比塞尔曾在小范围内夸耀说。他的话很大部分是事实。除了威斯巴登之外,U-2飞行中队还在土耳其的因契尔利克、挪威的博多、日本东京附近的美国基地活动……

在美中情局同意和支持下,英国空军和情报机关积极参与U-2的间谍活动。英国飞行员在美国训练后,1960年之前曾在因契尔利克飞行。大约有1/5的U-2飞行员是英国公民,不过他们只执行艾登首相亲自批准的任务。

借助于日臻完美的空中照相的判读和处理技术,美国人获得前苏联火箭技术和核武器生产的早期情报。采铀矿井、运铀矿石的列车、铀处理工厂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U-2拍摄的镜头中。通过分析矿井设备特点、车皮的数量和容量、工厂的规模,专家们可相当准确地判定核武器库的地点。

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艾伦·杜勒斯不厌其烦地历数U-2飞机的功劳:证实了前苏联虽仍在执行远程轰炸机的生产计划,但数字已有很大削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号的中程超音速轰炸机;了解到许多远程轰炸机机场、基地位置,远程轰炸机的部署和有关核武器储存场所的情况;对执行前苏联导弹系统计划的具体地面设施进行定期观察;通过拍摄到的大量照片,提高了对前苏联的透视能力,了解了前苏联配置远程弹道导弹的原则和利用这些场所训练部队的情况,还有前苏联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作战用途;提供了前苏联在原子能计划方面极有价值的情况,如裂变物质的生产,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储存场所的位置、类型和规模;拍摄了前苏联核试验场所的照片;拍摄到前苏联铀矿砂开采和铀加工设施的规模和所在,有利于估计前苏联裂变物质生产情况;找到了前苏联全国性和地区性储核场所和转运储存场所。

(5)苏联放导弹，U-2 遭厄运 与此同时，前苏联的防空也未停止不前。从 1958 年起，U-2 的危险急剧增大。前苏防空军以改型的 SA-2 导弹取代了过时的 SA-1。第一批 SA-2 防空导弹营部署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以及最重要设施周围。由于 SA-2 导弹的出现，U-2 的飞行员被告知飞行时要远离防空导弹营阵地。

华盛顿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下，艾森豪威尔开始怀疑威胁美国和前苏联关系的 U-2 计划继续实施的合理性。1959 年 9 月，鉴于赫鲁晓夫访美，U-2 的飞行暂时停止。

11 月，总统建议停止入侵前苏联领空的行动，但遭到了五角大楼、国务院和中情局一些人的反对。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劝告总统采取包括侦察方面“更积极和大胆的步骤”。

1960 年 4 月 9 日，U-2 从巴基斯坦途经乌拉尔至挪威的一次飞行结果，加速了结局的到来。空中摄影的判读，表明前苏联正在乌拉尔地区进行大规模洲际导弹部署工作。这一情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艾森豪威尔及其左右面临着困难的抉择，4 月 9 日的情报需要核实。与此同时，5 月 16 日在巴黎将举行前苏联、美、英、法四国首脑会晤。华盛顿和全世界都把这次会晤当作是前苏联与美国关系缓和的重要机会。

1960 年 4 月 14 日，白宫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先前一直积极推行 U-2 计划的比塞尔，现在，在经过 4 年未遭惩罚的间谍飞行之后，一反常态建议不要再以生命冒险。杜勒斯则坚持继续飞行。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担心会危及巴黎会晤，而巴黎会晤的成功可能会给即将结束的总统任期打上圆满的句号。会议最后做出一个妥协的决定。4 月 14 日晚，杜勒斯给比塞尔打电话：“飞行被批准了。当然为我们规定了期限，即无论如何也不能迟于距巴黎会晤前两周，就是说到 5 月 2 日之前。”杜勒斯看了一眼日历：“如果 5 月 1 日飞行怎么样？”比塞尔虽然惯于冒险，但这次他表示反对：“如果在美国国庆节这天在其国土上空飞行，美国人会说什么？”“他们的心思会全部集中在庆祝和跳舞上，没人会注意这些。难道俄国人会例外吗？”中情局长坚持说。

因契尔利克基地，分队指挥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接到挑选有经验飞行员火速完成任务的命令。弗朗西斯·鲍尔斯中选。他有 27 次成功侦察的纪录。

杜勒斯的运气不错：1960 年 5 月 1 日是个晴天。使鲍尔斯的名字载入史册的这次飞行路线为因契尔利克——白沙瓦——博多。飞行开始很顺利。在 U-2 之前，一架普通侦察机起飞以吸引前苏联防空雷达的注意力。“当我飞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鲍尔斯回忆说，“我听到一声震耳的轰隆声，这可能是防空导弹的爆炸声。我的飞机当即失去控制，失去高度。”鲍尔斯在跳伞前甚至还未来得及与基地通话。然后降落伞带着他落向那个使他扬名的不可知的地方。

当然，U-2 的间谍飞行没有就此结束。

1962 年，U-2 发现了前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1962 年 1 月至 1968 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美制 U-2 型高空侦察机多次入窜大陆上空进行侦察，被我防空导弹部队击落 5 架。1 架 U-2 飞机的残骸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那副尊容可笑又可悲。“黑妞”再也“风流”不起来了。

2. 打不掉的“黑鸟”

当 U-2 型飞机还目空一切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着手开发它的后代飞机了。艾森豪威尔早在 1958 年就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副手理查德·比塞尔关于制造新型间谍飞机的计划。

SR-71 型飞机的设想就是在那一年形成的。

新型间谍飞机由洛克希德公司负责研制。要求飞行高度达 28200 米，时速 3800 公里，也就是 3.6 马赫。经过两年多的修修改改，其后才告定型的，就是 SR-71A。

SR-71A 于 1964 年 12 月 22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戴尔进行了首次试飞。又隔了一年多，1966 年 1 月 7 日 SR-71A 才正式加入了美国战略空军的战斗序列。以后日见重用，到 1968 年 6 月份以后，SR-71A 承担起了全部周边飞行的侦察任务。

(1) “黑鸟”不黑，“牛车”不慢 SR-71A 的绰号叫做“黑鸟”，得自它外形的颜色。因为它表面涂层环氧树脂呈黑色。它的正式名称是“牛车”。其实，这个绰号和名称都名不符实，真的顾名思义的话，就上当受骗了。拿绰号来说，涂黑色涂料是为了防止飞行中发生的散热现象。可是在高速飞行时，温度骤然增高，黑色也就变成了绿色。所以在空中根本找不到“黑色”的“鸟”。SR-71A 的飞行速度超过了 3 倍音速，是当时飞得最快的飞机，当然也不是老牛破

图 3 SR-71 三面图

SR-71A 的外形十分特殊，不可能与任何别的飞机相混。机身长 32.74 米，翼展 16.95 米，机高 5.64 米。是“一架从三面看过去都不相称的飞机”，具体说来一个侧面看过去像支箭，而另面看则像只飞碟，第三个侧面则犹如蝙蝠。SR-71 的外壳几乎全部用钛合金制成，其厚度不超过易拉罐。

U-2 飞机唯一的防御本领就是 21000 米的飞行高度，速度很低，只有 0.8 马赫。而 SR-71 最大速度可达 3.3 马赫，可在 24000 米的超高空飞行，一般认为，要击落它，无法使用战斗机，就是用导弹也相当困难。

在实战中，关于 SR-71A 的确实限高和限速从来是众说不一。事实是 1976 年 7 月 27 日罗伯特·霍尔特上尉和拉里·埃利奥特少校在一次直线飞行中曾经爬高到 26000 米，时速达 3530 公里。这虽说是一次高纪录，但根据设计要求，应该还可以飞得更快更高。保密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往往有一定的保留。说是可飞 3 马赫，也许极限是 4 马赫。洛克希德公司负责高级发展项目的凯利·约翰逊曾经说它的高度可以飞到 3 万米以上。

(2) 先进的设备，高超的技能 究竟可飞多高多快，暂且勿论。就按已经飞过的高度和速度来说，它已经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拍摄 25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了。

由于高速、高空、高效的缘故，任何技术高超的飞行员的熟练操作都难以保证传感器有效工作所需的精确度，所以这种飞机不用人力操纵。它的自航(惯性)系统完全能起驾驶的作用。

听听凯利·约翰逊在这方面的介绍吧。他说，这类飞机“具有极为优良的自航系统。起飞时，只需将不同的 16 个检验钮插上，飞机就会按安排好的高度、速度和方向，自动飞行了”。

位于 SR-71A 机鼻底下或腹下的传感器是指挥飞机执行各类任务的中枢。机上安装有各种类型的图像和信号情报设备，甚至还能安装上技术目标

分幅摄影机，专门用来拍摄正中下方的地球地形和机身两侧通道下面的地形的高清晰度图像。这类摄影机通常也是自动拍摄。在飞机飞行过程中，摄影机接受机内航行系统的指令，摄取事先选定的地理坐标，而且还可以在机鼻前端安装光条信号摄影机(OBC)来摄取机身正中下方和机身两侧通道下方的地形的图像。它从240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上，汽车牌照的号码清晰可辨。

第三类可供选配的装置是高分辨率的雷达系统。这种装置能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全天候)，提供可设想的白昼或黑夜的环境条件。只是这个系统同摄影机系统相比，分辨率较低，所以往往是在浮云成堆或者黑暗一片，致使机上其他系统的效能受到影响时，才启用作为辅助补充的力量。

最后还有一个“伊林特”系统，就是电子情报系统，也可以配置选用。这个系统的作用半径有几百公里。它截收到的信号都传送给下列三处加以分析处理：日本的嘉手纳空军基地、英国的密尔登霍尔的流动处理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的中央处理中心。

在英阿马岛战争中，SR-71A飞机曾经从比尔起飞为英国搜集情报。在起威慑作用方面，SR-71A飞机也曾飞临尼加拉瓜上空，不断制造声爆，表示美国政府对桑地诺政权的警告。嘉手纳起飞的SR-71A飞机也曾经飞入中国境内，而且拍摄到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全过程。对美国在亚洲地区较为重视的目标地区，如朝鲜、越南和老挝，美国都曾派出SR-71A飞机去侦察过。为袭击越南的西山战俘营抢救美军战俘，SR-71A也去拍摄过照片。只可惜它未能查明越南已将美军战俘转移，使美军扑了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回答国会议员的质问时辩解说：我们还没有发明一种能透过屋顶和墙壁看到屋内情况的摄像机。

在冷战时期，SR-71A只限于绕界飞行，活动范围在前苏联的远东部分和欧洲部分，进行一般性的“伊林特”电子情报和图像情报的搜集活动。

从英国密尔登霍尔和冲绳嘉手纳起飞的SR-71A飞机有一系列不同的飞行航线：挪威北部/科拉半岛，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日本海/堪察加等等。

以波罗的海航线为例，出发地点是密尔登霍尔，经丹麦，过波罗的海，沿东德、波兰和前苏联的边界作平行飞行，直抵芬兰的最南端，然后循原路折回来。

SR-71A在绕界飞行、对前苏联沿岸进行侦察时，能把飞机场、港口、海军基地、雷达设备等都拍摄进照片里。尤其因为它装有高分辨率的雷达，还可以拍摄到前苏联潜艇基地设施的画面。

SR-71A在进行电子侦察活动时，虽说处在境外，但还是“能够定点精确，找得到而且抓得住对方最强大的信号发射源位置和信号的特点”。

SR-71A的另一项任务是诱使前苏联空防部队打开最为关键的雷达系统。

(3)“鬼怪”跟不上，“萨姆”打不着 SR-71A型飞机为了躲开对方的侦察手段和保护自己不生意外，安装了比较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可以轻易地摆脱敌方导弹的打击。这些设备说来似有神奇功能：一是能测知有否威胁自己的危险存在，二是能了解跟踪自己的威胁的密集程度，三是在“萨姆”导弹向自己飞来时，雷达侦听器 and 红外线传感器相互连接、密切配合，在导弹的热轨迹刚进入雷达范围时，就将其捕获。

雷达侦听器和红外线传感器两系统合作配合使飞机能察觉远在150公里外正向自己飞来的飞机或导弹。1973年，SR-71A从佛罗里达州的基地起飞，

完成了飞越以色列上空的不着陆往返飞行，所拍照片证实以色列有紧急使用核武器的能力。以色列虽起飞 F-4 进行追踪，但由于飞得太慢，也奈何它不得。

1981 年 8 月 26 日，朝鲜向一架 SR-71A 飞机发射过一枚“萨姆”导弹。刚一发射，侦听器就向驾驶员告警。这一枚导弹是曾经射向 SR-71A 上百枚导弹中的一枚，结果也未射中。

除了这两个系统外，SR-71A 还有几种更为神奇的保护自己的反措施。其中如强有力的雷达干扰器和在一定范围内“守住大门”的系统。这个系统使 SR-71A 能在察觉对方雷达活动时，通过电子功能把自己的整个身形投射到数公里以外的空中，从而让雷达认错目标，导弹转向。

SR-71A 还有潜行的本领。定型时就考虑了如何使雷达不能抓住它或只能抓住它最小截面的问题。它全身涂着环氧树脂，这类油漆既能吸收对方雷达的发射线，也能防止自身的热辐射，以免被对方的红外线追踪系统捡去。像这样的隐身潜行效果在飞行史上是第一次出现。

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美国空军的 SR-71 间谍飞讯已经退出现役，进了博物馆。

美国空军用以代替 SR-71 的隐身超音速高空侦察机已经开始服役。这种飞机造价昂贵，每架达 10 亿美元。它的性能十分优越。这种新型的间谍飞机，有人说是 TR-3A，有人说它叫“极光”。

3. 神秘的“极光”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 SR-71 退出现役的时候，有人回忆说，一年前(1989 年)，曾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的上空，看到过一种样子十分奇怪的飞行器，它的速度相当快，它的外形呈三角形，并猜测说，这是否就是 SR-71 的后继机？

回忆终归是回忆，有时候回忆也并不可靠。猜测终归是猜测，并没有人出来证实。

(1)TR-3A 初露锋芒 到了 1991 年的夏天，美国一个研究不明飞行物(UFO)的组织，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地方，用地动仪和特殊的录音装置，记录下了一些奇怪的数据，数据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特殊的飞行器活动，这种飞行器不同于现有的飞机，它的速度极快，是音速的 5~6 倍。

紧接着美国的另一家科技周刊，报道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曾秘密派遣了几架处于极端保密状态的侦察机飞赴海湾，参加了“沙漠风暴”行动。这种侦察机编号为 TR-3A，是一种隐身高空侦察机。在海湾战争中，它仅与 F-117A 隐身战斗轰炸机配合作战，为其提供实时侦察图像数据。

美国的另一家杂志，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这家杂志称这种高空侦察机为“极光”。该杂志说，“极光”计划很可能是 1986 年开始执行的计划之一，最初预算了 8 亿美元，翌年(1987 年)预算增加了 2.2 亿美元。美国国会有的议员对这项预算提出了疑问，美国空军回答说，这是用作研究和建造隐身飞机的经费。可是后来知道 B-2 隐身轰炸机的经费是“ATB 计划”所提供的。于是“极光计划”被暴露出来，这个计划是隐身高空侦察机研制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新一代高空侦察机能够隐身，速度在 5~6 马赫之间。1989 年“极光”侦察机开始试飞，从美国西部起飞，经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在该

岛上空进行空中加油，再飞往英国苏格兰的马克里哈尼什空军基地，然后利用夜间，返回美国的帕尔姆戴尔空军基地。

(2)TR-3A 等于“极光”吗？也许有人要问：TR-3A 和“极光”是一种飞机吗？

美国的军用飞机发展采用与两家公司分别签定研制合同，共同研究发展样机，然后在几种样机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决定取舍。研制高空隐身侦察机也可能采用这种办法。于是有人猜测说：美空军与诺思罗普公司签订了 TR-3A 隐身高空侦察机的合同，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极光”隐身高空侦察机的合同。

1982 年，美国空军与诺思罗普公司签订了研制隐身高空战术侦察机的合同。诺思罗普公司在 THAP 方案即战术高空突防飞机方案的基础上，开始研制新一代隐身高空战术侦察机。经过 7 年的研制、试飞、定型，1989 年开始进行夜间训练。据称，有人曾看见过这种三角形的飞机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与 F-117A 隐身战斗轰炸机共同飞行过。后来，这种隐身高空战术侦察机又参加了海湾战争。

TR-3A 的设计和 B-2 隐身轰炸机的设计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发动机的进气口与排气口都在机身的上表面上，双发无加力式涡扇发动机埋装在靠近翼根的机翼内。TR-3A 的隐身特性，除了通过隐身气动外形设计外，主要是通过大量采用雷达吸波材料，机身表面圆滑，翼身融合。机长 12.80 米，机高 4.3 米，翼展为 18~20 米。

我们再来看看“极光”侦察机。

“极光”隐身高空侦察机是美空军与研制 F-117 战斗机的洛克希德公司签约研制的。有关“极光”侦察机的研制情况，新闻媒介很少报道。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有关“极光”的一些情况终于透露出来。据分析，“极光”的机长为 35 米，翼展 20 米。在它的性能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飞行速度，为 5~6 马赫。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可在 3 小时内到达地球上任何地点。它的机组成员为 2 人，动力装置为两台再生式涡轮冲压喷气发动机，采用液态甲烷作燃料。机上装有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它的数据传输系统可与侦察卫星直接联网。

这样看来，TR-3A 并不等于“极光”。

那么，这会不会是一个计划中的两种不同型号的侦察机呢？从外形尺寸上看也不像。当然，这个结论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因为美国的隐身高空战术侦察机的研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外界知之甚少。

但是，无论人们怎样猜测，在 SR-71A 身后，性能更先进的间谍飞机已经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三) 太空谍影

为了有效地防御来袭的洲际核导弹，美国和前苏联都投入大量人财物力研究和试验各种先进战略防御技术，其中也包括科幻小说作家笔下的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对于前苏联这类奇特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状况，在很长的时间里，外界知之甚少。是法国的“斯波特”遥感卫星揭开了前苏联反导试验场神秘的面纱。“斯波特-1”卫星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了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畔萨雷沙甘导弹试验中心的前苏联主要反导研究试验设施的全貌。这里不仅安装有大型激光和粒子束定向能反导武器试验装置，而且从图像上还可看到一部雷达及其周围的反导导弹发射试验区。

“斯波特”卫星还曾详细拍照了前苏联北方舰队(现属俄罗斯)总部所在地北莫尔斯克和与其相距不到 20 公里的摩尔曼斯克的海军设施、机场以及导弹核武器储存区。在“斯波特”拍摄的图像上，各种目标历历在目，北方舰队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清晰可辨。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赞叹法国间谍卫星身手不凡。但是，真正的太空间谍大国是前苏联(现俄罗斯)和美国。

1957 年 10 月 4 日，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太空间谍战的序幕。迄今，世界各国已发射军用卫星 2000 多颗(大部分用于侦察)，其中多数是前苏联(现俄罗斯)和美国发射的。

卫星侦察有很多特殊的优点。一是侦察范围广。卫星拍摄一张照片相当于几千架飞机的侦察效能。而一颗同步轨道侦察卫星，一眼便能横扫太平洋两岸。多颗卫星组网，整个地球便一览无余了。二是获取情报快。低轨道侦察卫星，一天就绕地球 16 圈，其速度是 U-2 飞机的 35 倍。先进的侦察卫星能将所获情报实时发回地面。三是不受国界、地形限制，风雨无阻，安全可靠。

侦察卫星是不折不扣的“超级间谍”，卫星侦察是超级大国军事情报的主要来源。

1. 间谍卫星的种类

先进的技术使得间谍卫星可以从几千公里或更高的太空拍摄到地面上像柚子般大小的目标，能侦察发现军事航天器的加力燃烧室产生的热量。

美国最新式的极其敏感的太空间谍卫星，即使当地球处在黑夜之中或者被云雾笼罩着，也能准确、清晰地给情报人员提供所拍摄的图片。据估计，到 90 年代中期，这种能拍照的大型卫星数量将增加 3 倍达 12 颗。这种具有全天候侦察能力的卫星，不愧为核实军备控制协议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

美国目前用于搜集情报的间谍卫星主要有 4 种。第一种是光学成像卫星，它装有对红外线超常敏感的电视摄象机的传感器，上面配备功率强大的望远镜。用它能探测出导弹发射的有关情报、拍摄武器和其他军事活动的详细图像。

第二种是“信号情报”卫星。第三种是“电子侦察”卫星。这两种卫星实际上是超精密无线电接收器，截取外国的无线电和微波通信信号。

第四种是“中继卫星”，它把间谍卫星的数据传送给美国的地面站，以便加速全球通信的速度。地面上的高速计算机在处理潮水般涌来的数据情报方面起关键作用。但是，随着“陆地”号卫星和哈勃太空望远镜发射上天，

科学任务增加，“中继卫星”由于随时处理数据能力有限，在时效方面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挑战。

2. 神通广大的“锁眼”

航天谍报始于 1960 年夏季，那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发现者”号卫星拍摄前苏联的照片。“发现者”号卫星与随后问世的照相情报判读卫星相似。由于它们大致绕着地极轨道运行，大陆就如同在照相机底下旋转。随后它发射火箭航天器使之脱离轨道，在夏威夷的西北部上空降落，由处于半空中的空军运输机截取。底片在夏威夷加工处理后，信使快速把图片送到华盛顿总部供分析之用。

不久，摄影间谍卫星在一个代号叫“锁眼”(KEYHOLE)的计划中出现，官方简称 KH。在报刊中出现的有 KH-8、KH-9、KH-11 和 KH-12 等型号。大多数“锁眼”卫星或用于拍摄大范围的照片供日常监督和追踪武器目标，或用于在低于 120 公里的高空对特别有兴趣的目标拍特写照片。

1971 年发射的 KH-9 卫星，又称“大鸟”号间谍卫星，重 13600 公斤，有猎狗式装甲车那么大。它能在高空拍摄大范围景观，像电视信号一样把图像传送到地面。至于特写照片，则用 6 个分离舱把它们送到地面。这种卫星用一架特制的柯达照相机，快速拍摄大范围侦察图像。

1976 年首次发射的 KH-11 卫星的优点在于，从太空拍摄目标的阴影可以帮助情报人员确定目标的大小和运动情况。KH-11 的发射成功对卫星谍报活动来说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因为只要目标一出现，它就能提供详细的高质量的照片。KH-11 卫星重约 14 吨，长 15 米左右，直径约 3 米。它在太空能够呆两年，对地面上的活动进行摄影和电子监听，还能截获和传递太空中的电子信息。它携带的摄影机既能大范围拍照，也能对准一个特定的地点摄影。所摄制的照片由一只微型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回地球，中途可以由空军飞机收回，也可以落到海洋里由海军取回。

图 4 大鸟卫星工作示意

把先进的光学望远镜及电视摄像机配上图像增强技术，应用在最新式的 KH-11 间谍卫星上，能在太空中迅速移动发现柚子般大小的目标。侦察专家用计算机增强技术，能读出汽车牌照或书的题目。KH-11 型卫星有活动的望远镜镜片，可补偿大气层使图像产生的畸变，而且它的飞行高度能迅速变化。

这种最先进的 KH-11 卫星可用各种不同的波长拍摄图像，把用各种不同波长拍摄的物体图像进行比较，能有助于分析家们确定这些物体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1984 年 7 月，一颗 KH-11 卫星拍摄到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正在建造的前苏联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 3 幅照片。经过计算机增强处理，可以看到那艘 75000 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正在分两段制造：前段长 264 米，后段长 7 米。

KH-11 卫星以略优于 1 米的分辨率所拍的这些照片在清晰程度上与 U-2 间谍飞机的侦察照片不相上下，因此航空母舰的许多细节清晰可辨。

KH-11 卫星上一项关键的技术是它使用了固体成像传感器，一种电荷耦合装置。它类似于半导体传感器，现已用于电视摄像领域。

这项技术是贝尔实验室 1969 年开发出来的，它给卫星技术人员提供了轻

便的、小功率的、相当敏感的图像传感器。固体成像传感器的表面装上了一排排微型光敏元件。80年代初期，在太空望远镜上，一个如同邮票那么大的固体成像传感器芯片，排列了800X800个元件，它能产生64万个像素。当光照射到每个传感器上时，它产生的电荷与光的亮度成正比。

当然固体成像传感器并不是唯一一种已应用的传感器。在另一种光学成像卫星里，亦称DSP型系列卫星，配上了灵敏的红外探测器。在同步轨道上的DSP卫星，可根据捕捉导弹发出的一丝烟雾的迹象来报告从陆地或从海上发射导弹的情报。一旦导弹被发现，其他卫星都瞄准发射场，极迅速地提供详细情报。美国太空政策专家约翰·派克透露，1989年6月中旬，大力神4号火箭推进器把一颗最新式的DSP红外卫星送入轨道。据卫星制造商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说，这颗第三代卫星重2360公斤，有1274瓦动力，是第一、二代这种卫星动力的2倍，它上面装有6000个红外探测器。

KH-12卫星的热图像功能有突出的改进。这个改进其实是对付苏联进行夜晚作业和在晚间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的反措施。KH-12还增加了燃料储备量。总额高达4500~6800公斤之多。正常运行轨道离地240公里。既能拍摄小面积范围的目标地区，而且图像分辨率极高，又能拍摄大面积地区的低分辨率图像。KH-12卫星质地坚固，足以抵御核攻击，还有保护装置专门对付激光武器，所以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KH-12卫星在燃料不足或本身需要调整维修时，可以仰仗航天飞机回收，待燃料补足，整修完毕后，再由航天飞机送回原轨道。因此KH-12卫星的寿命预期可长达8年。

美国光学成像卫星系统如KH-11卫星在晴朗的白天里，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KH-12卫星则进一步能在晴朗的黑夜里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两者都有一怕，只要出现了浮云，就等于遇到了克星。

3. 穿云破雾的“曲棍球”

尽管有敏感的间谍卫星在轨道上运行，长朗以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面临着—个很大的困难。在深秋、冬季或早春的70%时间里，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许多地区上空被云雾笼罩着。

1988年12月，“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时，云雾遮挡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宇航员迈克·马莱恩在440公里高的轨道上，从机舱施放了一颗价值5亿美元的“曲棍球”号卫星，并把这颗卫星用火箭发射到更高的轨道上。这颗卫星上装有一种图像探测器，它是个雷达发射和接收装置，由大型太阳能聚能板来提供能源。光学成像卫星是被动地从地面上捕捉光线，而“曲棍球”号卫星则是主动的，它发射微波信号到地面，然后，回收并识别出反射到太空的信号。这种新一代的间谍卫星能透过云雾和黑夜看清地面上的目标。

据报道，“曲棍球”号卫星的矩型天线约有14.6米长，3.6米宽。天线上布满了一排排发射和接收电波的元件。

“曲棍球”号卫星捕获图像时与其他雷达有些差别，当信号目标返回时，大多数雷达能同时显示出来，它提供的是连续的图像。而“曲棍球”号卫星则不同，当它掠过地球时，拍下的是一张张的快照。由于多普勒效应的影响，每次快拍时信号从目标返回，都会发生微略的失真。为了获得图片，信号必须送回地面站。然后，计算机把这种快照的数据与清晰的图像结合在一起，

这种技术被称为合成孔径雷达技术。它具有更高的图像分辨力，用来接收雷达搜索到的目标的全部图像。

4. 万里太空“偷听者”

电子侦察和信号情报卫星通过截收无线电信号，提供情报，告诉情报分析员哪些重要事件会发生。这些窃取的密码信号在马里兰州的国家安全机构分析和破译。截收各种密码的信号情报卫星不停地在 36000 公里的太空轨道上漂游，它的巨大的伞形天线能够窃取从前苏联发出的各种微波电话信号和其他无线电信号，以及世界上其他美国人想偷听的地方的信号。

“流纹岩”号是一颗早期的通信情报卫星，在 70 年代整整运行了 10 年。它每天除了完成它的日常任务外，还能够同时监听 11000 次电话和步话机的通话，并能探测前苏联和中国导弹试验飞行的遥测信号。

“旋涡”、“大酒瓶”（即“搜索者”）也都是电子监听卫星，即美国军人所说的“偷听者”。各种无线电通话、雷达的发射波、导弹点火推进装置以及导弹配备的雷达导向系统都无法逃脱它们的监听。“大酒瓶”不仅能记录电子信号，而且还能查明信号特征并确定其来源。甚至能对收到的情报进行挑选，只向地面传送与预先确定的标准相符的情报。

5. 太空侦察新课题

高成本的计算机对间谍卫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由于传送到地面站的都是数据，把数据转换成图像也只能靠计算机来完成。今天最大的技术难点是如何为高速计算机编制程序，让它从大量的数据库中提取有用的信息。过去这个问题与识别数据联在一起，今天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过滤并翻译这些数据。挑选数据是复杂的，要根据地理条件和所感兴趣的的目标的资料来选择。人脑和翻译器一同完成这项工作。现在科学家们试图把这个过程自动化。

前国家侦察局负责人小爱德华·爱德里奇说，如何在数据库里发现目标，也是一个难题，专家们认为关键在于自动图像翻译器的开发。从理论上讲，高速计算机能够分析谍报图像数据和发现前苏联武器的蛛丝马迹，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实现自动地从数据库中发现目标，再发出警报这一步，还需 5 年的时间。

未来的 10 年，间谍卫星不仅侦察能力将大大提高，而且寿命也将延长。

在空间面对战时反卫星武器和核爆炸的威胁，有必要加固所有军事卫星，使之免遭辐射和其他武器的破坏。届时抗辐射集成电路将会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秘密技术如抗雷达反射表面、环氧树脂吸收雷达波以及低热灵敏推进器等将会得到应用。

一种比足球场还大、比薄纸板还薄的大型天线预计会使用，它们能在 1600 公里或更高的轨道上运行。另外，巨大的矩形红外探测器也会投入使用。它可以搜查整个地球，而不同于现在的扫描搜索。这种探测器有可能探测出任何有热量放出的重要目标，如导弹、航天器和核试验等。

但是，越来越多的便携式战术导弹是难以从空间发现的，加之亚洲、中东、南美一些国家已具备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间谍卫星的能力仍须进一步提高。

6. 民用卫星的间谍使命

间谍卫星有时也要乔装打扮一番，以一个较为体面的身分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用于间谍侦察目的的内容一般都是附在一项试验性的空间计划里。从另一个角度说，用于和平目的的卫星，同样可以为情报部门服务，发挥太空间谍的作用。

拿美国的资源卫星来说，它好像是个“光明正大”的角色。表面上，资源卫星的目的是向美国科学家提供地球资源、环境变化和地面杂乱情况的可靠情报。当资源卫星飞越一个湖泊时，它的传感器能告诉你湖水污染了没有，如果污染了，还能显示出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它能毫无偏见地从太空观测地上的庄稼，在稻子和小麦收割之前就向分析家提供收获量。它能盘旋飞越大洋上空，测定鱼群的位置。它能精确测定地下发出的射线，从而查明地下的矿藏。不错，这都是资源卫星的任务。但是，资源卫星同时还在干着它的主人想掩盖而又掩盖不了的勾当，发挥着另外一些作用。它除了确定鱼群的位置，还能发现潜艇的所在；除了侦查地下的矿藏外，还能发现并精确测定地下储藏核弹头的设备。

美国的大型气象试验卫星和电视红外线观察卫星也赋有间谍侦察任务。这些卫星均装有美国无线电公司制造的非常先进的电视摄像机，其体积略大于人的拳头。情报人员接收它们的电视播送，时常从中获得大量有用的情报。

(四) 苏美使馆窃听战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在搞窃听？恐怕很难说得清楚。窃听的方式和手段千奇百怪，也难以尽述。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些前苏联和美国使馆窃听战的情况，当然还得从那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讲起。

1. 克格勃的礼物

有一种外貌美丽、性情凶猛的巨禽，学名白头海雕，俗名秃鹰，1872年美国国会把它定为国鸟。美国国徽的主体就是一只白头海雕。它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

1960年5月，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拿出了一枚美国鹰形国徽让大家欣赏，并讲述了这枚国徽的不寻常来历。原来，在50年代初，哈弗里尔·哈里曼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时，前苏联政府把这枚国徽当做礼物送给了他。它做工精细，别致新颖，哈里曼大使珍爱地把它挂在自己的书房里。然而自从这枚象征着“友谊”和“尊严”的国徽挂进了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里以后，房间里的任何一句话就都原原本本地传到前苏联克格勃那里。原来，这枚被当成礼物的国徽是一件独出心裁的伪装品，被克格勃暗做了手脚。木雕的国徽中央已被掏空，里面放着一个U形的金属支架，上面安着一个用弹簧钢做的、极其灵敏的共鸣器，大使书房里的任何声波都能引起它的振动。

克格勃在大使馆对面的一座建筑里安了一个雷达，雷达按照一个等幅波长工作。它的灵敏度极高，并且直接对准哈里曼书房里美国国徽里的共鸣器。它能侦查、录制和译出最细微的声音，并能逐字逐句地译出谈话来。

由于前苏联对美国大使馆的情况总是了如指掌，才使得大使馆最后决定进行一番检查，揭开了老鹰肚子上的秘密。这时它已忠实地为克格勃效力达7年之久。

这还不算，前苏联还在美国大使馆里安装有更庞大的窃听系统，这个系统中有一根功率很强的天线，它经过一条隐蔽的隧道，一直通到录音室，而且很多装置都可以通过这个隧道定期进行继修。美国反窃听侦听检查也没有发现这个窃听系统。直到1978年一场大火烧了大使馆的顶层之后，这个窃听系统才被发现。

2. 长长的电子触须

1964年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发现的窃听活动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例子。使馆的情报人员开始认为，在使馆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名克格勃特务，后来却发现使馆内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克格勃的窃听系统。

当时，克格勃对美国大使馆里讨论的问题几乎都了如指掌。于是，美国的一个破坏小组来到了柴可夫斯基大街上这座大使馆里，开始一点一点地扒开墙壁、地板和天花板。

原来，当初大使馆搬到柴可夫斯基大街的大楼去的时候，由于过于拥挤（当时只有7层），便在1953年加了3层。1964年，破坏小组扒完墙壁、地板和天花板后，竟发现整个大楼里（当然主要是后加上去的3层），每个房间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都有互相连接的传声器。这些传声器不少于50个，都用一个复杂的线路连接起来，它使得每个声音都能直接传到克格勃的办公室

里。

这种传声器是从一种“挂钩话筒”演变而来的。这种挂钩话筒在莫斯科的美国使馆使用之前就已相当普遍了。前苏联所使用的是把传声器都同一个长长的木头钩子或钉子连接起来的挂钩话筒。这些钉子或钩子的木质部分安装在墙壁里，离灰墙或嵌有木板的墙的表面只有几厘米。

普通的挂钩话筒是由一个固定在金属钉子上的传声器做成的，它能毫不费力地被钉入墙壁或地面，这样掩盖起来后，就能秘密地进行工作。这种东西，搞监视和监听的情报组织使用得尤其普遍。一个特工人员为了窃得某个房间的情况，就把隔壁的一间屋子租下来，把挂钩话筒钉入墙里、地板里或天花板里。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用来作为导体或共鸣板。传声器通过金属钉子收到了声音的振动，然后再像通常那样传给耳机或录音机。

前苏联使用的这种传声器有个显著优点。由于传声器相当小，又由于这些传声器是用木钩而不是用铁钩保护的，因此如果使用常规的手提小型探测器或金属探测器来进行检查，很难发现。

1953~1964年，克格勃的监听器就积累了成吨的磁带。但是，那些日常的安全检查不会总是失败的。因为大多数金属探测器的灵敏度不但足以发现钉子、导管和普通电线，而且也能发现木头保护的小传声器，只要通过对形状、大小和共鸣反应的测定，就能知道传声器在哪儿了。

后来，美国专家又检查了华沙的美国大使馆，也发现了大批秘密的窃听装置。1949年以来，美国的纳税人每年差不多要花上百万美元，用来拆掉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换掉安装有窃听器的家具陈设，拆除其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和军事设施里别人安装的窃听装置。应该说，这些秘密的窃听装置也不都是前苏联和东方集团国家安放的。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为了提前知道一些情况，安装这种装置也被认为是值得一做的。

3. 第三只耳朵伸向白宫

更使美国感到愠怒的是70年代前苏联通过设在驻美国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特殊装置，来截取美国的微波电话和大部分国际电话，并且通过电子计算机从大量通话中筛选出所需要的情报，其中有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粮食交易等重要情报，甚至连国会、白宫等核心机关的电话也被窃听。在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还有在华盛顿城内和周围的一些附属机构，克格勃情报网已经建立了许多电子窃听站，其目的就是要监听和录制美国政府中一些最敏感部门的所有谈话，这些部门的电话逐日被录制了下来。华盛顿白宫电话号码的前3位数大多开始于“456”。前苏联专门研制了一种窃听装置，用来收录这种以“456”开头的电话号码进行的电话通话。为此，白宫召集了全国11家电话公司和27家有关公司的经理到华盛顿举行紧急会议，商议如何防止前苏联对美国国内电话的窃听。卡特总统命令联邦调查局对前苏联这种大规模的窃听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对话音信号加密，把拨号盘信号和通话信号用不同的线路分开，以及采用通话线路地下电缆化等等。尽管如此，在美国还将有1/3与保密有关的电话无法保护，只好听任前苏联去窃听。

4. 美国人也闲不着

美国对前苏联的这种猖獗的窃听活动，并没有提出公开的抗议，这是因

为美国对前苏联也在搞大规模的窃听活动。据说，美国在它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楼顶安装了灵敏度极高的通信电子装置。这种电子装置，甚至能够窃听到克里姆林官首脑人物汽车里的电话。前苏联为了干扰这种电子窃听装置，就不断地向美国大使馆的楼顶办公室和机要室方向发射大功率的微波。这种微波不仅可以干扰美国大使馆楼顶上的电子窃听装置，还可以通过偷放在大使馆里的窃听装置窃听大使馆里的秘密。

1983年，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哈特曼公开对报界发表讲话，他证实，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8时至下午6时，有两束来自不同方向的微波射线，辐射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派反窃听专家到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勘察现场，最后在大使馆安装了能挡回微波辐射的铅制挡板，以防止克格勃的窃听。

5. 美、苏大使馆内无“净土”

1976年冬天刚刚来临，工人就开始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窗户上安装金属网罩。尽管当时大地冰封，这些双层玻璃窗外面大部分还是安装了一般只在夏天才安装的窗户附属物。

无论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还是国务院对此都没作正式的评论。不过，在这以前的几个月，据一个不很确切的报告，大使馆遭到了微波辐射的侵袭。

一些报告说，当时盛传美国的安全人员正在对秘密的窃听装置进行定期的检查。前苏联可能对这一谣言作出了反应，就从美国大使馆外面的某个地方搞起了微波辐射。其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一检查。

另一个传言说，微波辐射是用来起动新近安装的、相当尖端的秘密窃听器或传声器的。

这些看不见的射束除了使用于间谍活动的目的外，还使人怀疑到对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

在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它说：“一种稍有不同秘密窃听方法据说已有可能实现。由于人们在一间屋子里说话会引起周围窗户的振动，而这种振动只要利用激光光束就能测得。”

实际情况是，因为在2月份采取反窃听措施之前，大使馆用于侦查的传感器（共鸣器）测到了变化不定的，或者是相当高的辐射读数。事实上，在1976年2月6日，美国大使小斯托塞尔就向在使馆大楼最上面3层工作的人员发出了第一次正式的警告，要他们注意这一情况。因为大部分外交决策就是在这儿作出的，并且也是在这儿向60个左右的美国人解释如何根据决策进行行动的。

美国反窃听人员迅速进行了分析，并且发现了秘密所在：一个放在离美国大使馆不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对准使馆最上面3层玻璃窗、用一块颜色庄重的黑绸布包着的雷达形状的大凹碟子。

这个凹碟是先进的微波窃听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窃听系统利用当时效果最佳的共振器来捡取大使馆玻璃窗传来的每一次振动。这些共振器对于所有的振动都是很灵敏的。它也不需要能源。人们的说话声引起的振动对玻璃窗和金属造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因压力而出现的变化都能够被测得。一个金属电灯插座、一个玻璃杯或者最令人欣赏的能藏在墙里的金属片——所有这些东西产生的任何振动都能被微波射束所捡取，并能被送回到发出射束的地点供录制、翻译和分析。

通过新密码电子翻译器把振动变成普通声音（即人们说的话），这种处理

微波传送的方法，多年来一直是情报机关使用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不过在1976年初对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采用的方法是一种改进了的系统。

美国使馆的反窃听小组除了安上金属网来阻挡微波窃听外，还采用了另外一些有效的防护措施来进一步挫败克格勃的窃听活动。但是，这样就能“平安无事了”吗？

数据在输入电子计算机终端设备时产生射频波，使用先进的接收设备可以调收到这些电波，几小时内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大楼里正在进行的工作，即不必接通计算机系统就能窃得秘密。因此美国政府曾要求国会拨款20亿英镑来保护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北约也不得不花费千百万英镑来防止新一代的电子间谍盗窃其秘密。为了防止克洛勃截收，8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院曾下令关闭了美国驻前苏联使馆的全部电子通信设备。美国各驻外使团发往莫斯科使馆的电报都改发到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然后派特别信使送到莫斯科的美国使馆。美国大使馆内禁止使用包括电子打字机、文字处理机、复印机等能发出电子信号的机器。1987年4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莫斯科时，为了防止他的活动被前苏联窃听，美国采取了特别的保安措施。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莱克·卡卢奇透露，特为舒尔茨在美国大使馆内设立了一间保险的房间和一间拖车式的活动房屋，以便于随时同华盛顿进行联络。

6. 建馆风波

1987年4月8日，里根总统谴责前苏联在新建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安装大量窃听器。他强调，如果新使馆的安全得不到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新使馆，甚至可能要拆毁这一建筑。4月10日，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对前苏联驻华盛顿使馆搞窃听。

1972年美苏矛盾缓和时期，美国和前苏联签订的条约，允许双方在各自国家为对方建造新馆舍。前苏联人在华盛顿西北面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附近选定了新址。许多安全专家警告说，这块地方在截听全市的微波通信方面可能是个理想的地点。而美国把使馆新址选在莫斯科河附近一块洼地上，新馆被前苏联的高层大楼四面包围着。施工中不断发生问题，没完没了。一些人批评说，前苏联的窃听活动如此严重，最好是把使馆大楼拆掉重建。白宫的一位官员抱怨说，“真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在战术上不利自己的事来。”

了解情况的官员对发生的差错有许多解释。一种说法是，国务院对间谍活动和使馆的安全问题总是不当一回事，政府内外的保守人士持这种说法的很多。另一种说法是，安全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国会连续不断削减建馆经费造成的，至少部分原因是这样。但是看来大家都同意，1972年的美国和前苏联条约有一严重缺陷，即规定两国政府使用当地的承包商来承建他们的新楼。一位白宫官员苦恼他说：“是基辛格领导下的白宫强迫我们这样做的”。大多数观察家同意，这种简单的规定，为克格勃的渗入提供了机会。

新馆的建设始于1979年。前苏联承包商坚持要在工地外预制大部分混凝土构件。在前苏联都是这样做的。消息来源说，尽管美方专家每天都亲临现场，安全监督方面并没有很好的协调。美国的反间谍人员对浇灌混凝土的梁柱和模板的车间没有进行检查。到1983年，美国检查小组才迟迟开始用X光检查混凝土构件中存在的毛病和是否藏有窃听器。前苏联工人撂下活计不干，表示抗议，说这样做有害于工人的健康。大楼的结构工程到1985年才完

工。这时，华盛顿又派出一反窃听组去检查，在混凝土构件中查出了一大堆麦克风。这幢 8 层大楼的许多敏感部位都装有窃听装置。尽管这些窃听技术工程并不算先进，但美国专家对这些窃听装置的规模和巧妙感到吃惊，很清楚，新楼的大部分都无法使用。

前苏联官员在华盛顿则没有犯美国这种错误。他们坚持混凝土块料都要实心的，而不要空心的，对不是现场浇灌的混凝土板块拒不接受。他们为了把窗户和窗框拆下来进行检查宁愿多花 18 万美元。为了在安装前的晚上对钢架结构一件件进行检查，多花了 5 万美元。了解情况的人说，1979 年美国情报机关想在苏联新馆的房间内安放窃听装置。当年参与设计前苏联驻美新使馆大楼的工程师约翰·卡尔沃内克透露，美方不惜花费 6500 万美元的代价，安装了“复杂的装置”，迫使前苏联人不得不拆卸下新馆的钢架，用 X 光仔细检查。1980 年，他们找出了几个窃听器，向国务院提出了正式抗议。随着使馆的间谍战升级，前苏联官员召开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次在莫斯科，一次在华盛顿，把他们所说的、从他们在美国的外交人员驻地发现的窃听装置拿出来公开展览。在华盛顿，前苏联官员带着新闻记者绕着使馆新址走了一圈，告诉他们窃听装置是在哪里挖出来的。前苏联使馆的安全官博罗维柯夫，为了让人拍照，爬上了脚手架，拿出一个人们看不懂黑色管状物，说是窃听装置用的电池。

相比之下，美国看来不像前苏联那样，把发现的窃听装置都拿出来亮相，可能是美国情报人员不想让前苏联人知道他们的反窃听技术高明的程度。

7. 窃听战结束了吗？

1991 年 12 月 15 日，前苏联跨共和国安全局局长巴卡京将美国大使斯特劳斯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亲手将美国大使馆窃听器分布图和技术说明书交给他。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巴卡京事后说，他这样做曾得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同意。

写到这里，可以放心地为前苏联和美国窃听战划一个句号了，因为再过 10 天，1991 年 12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顶上就换上了俄国的三色旗。但这个句号只属于前苏联，不属于美国，也不属于俄国。

(五) 电脑间谍战

随着电脑的普及，工业国家对电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电脑不仅是存储大量信息数据的资料库，而且也是多种现代化系统，如国防、尖端科技自动化体系等的运转中枢。电脑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高度机密的数据都储存在电脑中，并且正在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来控制飞机、舰船、导弹和战区的部署。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电脑领域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

1. “窃取”与“破坏”

通过电脑进行间谍活动，从目前来看，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电脑窃取对方的秘密情报资料，称为“窃取”；另一种是，利用电脑“病毒”破坏对方的电脑指令中枢，使之瘫痪，称为“破坏”。

“窃取”又分为外部窃取与内部窃取。外部窃取是指利用对方电脑的电缆通道(主要针对独立的电脑系统)，或环球通信网络，破译对方重要电脑的指令密码，提取电脑储存的机密资料。1981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华盛顿郊外一情报设施工作时，发现有人通过与它相联的电缆窃取了相当多的机密情报。

内部窃取是指内部电脑工作人员为对方窃取情报。他们有权接近未接入电脑网络的军用电脑，并且知道控制指令密码，因而更为危险。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犯罪与电脑间谍案记录显示，这些案件中有90%是公司或政府内部人员干的。1981年该局的研究表明，每1.5万名军用电脑操作员中，即有1人在过去20年中曾出卖或泄露机密资料，而美国军方在任何时候的电脑操作员都超过10万人。

“破坏”这种形式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实验过”，在电脑犯罪中已经有了先例。这就是利用电脑“病毒”破坏程序来扰乱对方重要的电脑中枢系统。据美国安全官员分析，“破坏”可能会是这样进行的：

五角大楼的一名敌方情报人员把电脑“病毒”输入环球军事指挥及控制系统。美国指挥官们战时要依赖这个系统获得资料进行协调。战争一开始，这名情报人员发出指令启动“病毒”，把该系统的资料消除干净。

另一种电脑“病毒”被引入北约后勤电脑系统，一旦“病毒”被启动，就会使电脑发出错误信息，导致北约后勤供给发生混乱。

利用电脑进行间谍活动，同一般的间谍活动相比，具有隐蔽性好，不易暴露；渠道多，难以防范；效率高，威胁大等特点。

无论是“窃取”还是“破坏”，都只同电脑打交道，窃取情报、施放“病毒”几乎不留任何“痕迹”。从目前破获的电脑间谍案来看，一般都是偶而发觉，再通过电脑长期寻找跟踪，才能破获。而没有发现的电脑间谍活动则更多。美国政府一位电脑专家就曾说过：“外同情报单位利用遥控取得美国电脑里的机密资料。我们的情报单位也对外国这样做。”

电脑间谍活动的渠道多，因而难以防范。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形成了电脑网络，并且国与国之间也相互沟通，这就使得电脑间谍活动更为方便，在电脑网络的任何一个地方部可以获得其他地方电脑里的情报。据美国电脑保安专家说，一名联邦德国公民利用环球通信网络。暗中同属于美国军方与军事承包的30多家电脑建立联系，前后达两年之久。因为只要能破译电脑密码，就可进入该电脑。美国许多官员都指出，美国情报单位在渗透前苏联和其他

国家的机密军事计算机系统方面，成果辉煌。一名专家解释说，“任何国家的敏感通信，只要我们能够解读，就可以侵入他们的电脑”。而密码的解读也不难做到。据报道，一名19岁的联邦德国学生就曾破解美国跳字器材公司的Vas电脑系统密码，该系统可以用来控制卫星。

电脑资料库存储量大，又不会提供假情报。一旦对方电脑间谍接通重要电脑系统，就可获得大量机密情报。尤为严重的是，受到侵入的一方对自己的损失程度并不清楚，难以来取补救方案。至于电脑“病毒”则更是危险，西方专家们认为，它不亚于原子武器的威力。

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电脑间谍活动，各国都在加紧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但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十分安全的方案。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为对付外部窃取者和可能的“破坏”者，改进了与其他系统连接的敏感电脑的译码程序。但专家们认为，这只能防范业余电脑间谍的侵入。

为对付内部的窃取者，美国电脑专家正努力开发一种“信任系统”，以确保使用人员只能取得他们有权看到的资料，只能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但这是否有效，还有待检验。

要具体了解电脑间谍是怎样活动的，请看——

2. 一起电脑间谍案

1988年9月5日，汉堡火车站检查员在按惯例检查小件寄存箱的时候，发现370号箱内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在一个口袋里装着4盒录像带；在另一个文件袋内装有近80份巴伐利亚州刑事厅的电传资料，还有一些神秘的计算机暗语和一个代号为“哈克”的组织的某成员的窃密操作记录。审查这批猎物的警察和安全人员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自称已打入某核能工厂主计算机网络的“哈克”成员；还看到一盘某“哈克”成员描述如何通过家用计算机测定美国核潜艇位置的录像带。于是，该小件寄存箱被严密地监护起来。几天后抓获了一个来询问此小件寄存箱的电台临时工。刑警搜查了他的住房，又发现了更多的窃自计算机的数据材料。汉堡宪法保卫人员同汉诺威和西柏林的同事们进行了联系，方知他们早在两个月前就已获知关于“哈克”的线索。

7月5日，一个名叫乌米·克尔纳的青年在向警方投案时供称：“我是为苏联克格勃提供情报的‘哈克’组织成员。”两星期后，又一个“哈克”成员自首。这两个自首者还主动告发了他们的5个同伙。根据这些线索，联邦刑事警察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进行了大约半年的追踪和调查，终于破获了一起利用计算机窃密的国际间谍案，3个青年计算机专家被捕。

据调查，“哈克”小组系专以侵入军事、经济和科研部门的计算机为主要目标的国际间谍组织。想象力丰富的“哈克”们凭借他们的计算机技术，利用家用计算机和电话，并通过价值才300马克的音响耦合器接通联邦邮局的电话数据导线，便可闯入其他重要的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窃取各种机密。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哈克”小组已窃取到美、日、英、法、意、瑞士及联邦德国等国的重要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的密码、暗语和程序。欧美国家重要的核能研究中心、航空和宇航局数据库、生物实验室、数学和数据处理公司以及军事方面的“兵器研究”计算机网络、空军基地和五角大楼数据库等均是该小组的猎获对象。

“ 哈克 ” 成员是 1985 年春天在汉诺威被克格勃招募的，他们接受一个名叫泽尔热伊的俄国人的指示。泽尔热伊的公开身份是前苏联驻民主德国商务处官员，他常在东柏林莱比锡大街 60 号的办公室内与“ 哈克 ” 成员单独会面。“ 哈克 ” 们窃到的所有机密情报都经由东柏林转交克格勃，而他们从泽尔热伊那里则获得丰厚的报酬。据联邦刑事警察局估计，“ 哈克 ” 成员每寄一个包裹，就可以得到约 3 万马克。据说，泽尔热伊用于收买情报的经费高达 200 万马克。这个克格勃间谍还不断提出“ 定单 ”，用高酬劳诱惑年轻的计算机迷去窃取克格勃感兴趣的情报。

这起骇人听闻的计算机间谍案虽然已经败露，但它给西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据专家说，前苏联情报机关获得的这些计算机合理取数和内部程序等机密资料将来仍可发挥作用，并仍可用来再次打入西方情报技术系统。还无人能保证已造成的损失不再继续扩大。因为这是一件比纪尧姆事件更为棘手的案件，连安全专家都无法知晓这些“ 哈克 ” 们具体出卖了些什么。

二、无所不偷的“三只手”

(一)莫萨德两次偷得“米格”机

1. 机巧初运，偷得米格-21

在1968年5月以色列独立日的阅兵式上，当法国制造的幻影式歼击机在观看阅兵式的人们头上隆隆飞过，最后消失在天际时，一架涂有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的飞机出现在人们头上。与众不同，这架超音速的歼击机上漆有用两道红边框起的“007”字样。

这架与众不同的飞机使人们感到疑惑不解。因为这不是一架幻影式飞机，而是一架前苏联制造的米格-21。这种飞机当时是前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它怎么会出现在那路撒冷上空呢？

当时，前苏联军队中只有那些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有资格配备这种飞机。就连华沙条约国中的其他国家的空军都被认为不够资格使用它。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把米格-21飞机提供给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以扩大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并企图确保阿拉伯人对以色列人的空中优势。

在观看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知道“007”飞机的底细，并且知道是自己的好友丹尼·夏皮纳——以色列的一名飞行员坐在这架飞机的操纵杆前。这个人就是前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穆尼尔以行家的眼光欣赏着这架前苏联造的、现在属于以色列空军的米格-21歼击机在蓝天里表演的一连串的惊险特技动作。接着，飞机摆动了一下翅膀向观众告别，向它的基地内格夫沙漠的一个秘密空军机场飞去。

正是这个穆尼尔教会了那位以色列人驾驶米格飞机。他把前苏联教官手把手教给他的有关米格飞机的一切知识，以及训练前苏联飞行员和阿拉伯飞行员最大限度地运用米格飞机的优越性时所采用的训练方法，都一一传授给了以色列人。此外，他还把米格飞机的所有缺陷告诉了丹尼·夏皮纳。

1966年8月，穆尼尔驾驶着这架米格-21飞机飞出了伊拉克，降落到了以色列的一个秘密机场上。事情发生后几小时，美国、英国、法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暗中向特拉维夫施加压力，都想看一看米格-21飞机。要知道，这可是落入西方国家手中的第一架米格-21歼击机啊。

图5 米格-21飞机

不用说，前苏联人这回可是气急败坏了。前苏联安全部门的头目们曾向克里姆林宫打了保票，向阿拉伯世界提供的任何一架米格飞机都时刻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但这次事件大大损害了他们的信誉。同时，这次事件在军事上也将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几个月内，随着西方国家的飞行员对米格-21飞机的精确性能的逐步掌握，前苏联空军的威力将大大削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以色列政府受到了来自前苏联大使馆的严厉恫吓。前苏联人要求立刻收回米格-21飞机。

狡猾的以色列人则极力缩小事态。说什么驾驶员和飞机是突然从天而降，连当局也感到无比惊讶，十分为难。人们告知前苏联大使，前苏联的要求已得到“考虑”，甚至还闪烁其辞地放出风声，说驾驶员只不过是迷了路。接着，人们又精心地导演了几次“泄密”，说伊拉克飞行员事先曾写信给以色列当局，表示他希望离开自己的祖国。发生米格机事件以后的几个月里，

为了独占这份“礼物”，并平息前苏联人的愤怒，一切旨在研究米格飞机的要求都被严辞拒绝了。西方国家甚至美国都吃了闭门羹。因此，以色列当局遭到了激烈的抨击。

巴格达把穆尼尔·雷迪法视为叛徒，这是可想而知的。

前苏联顾问和伊拉克军事曹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明白飞行员究竟是怎样策划这次叛逃事件的。伊拉克当局准确地认识到，这决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士兵的一时冲动，而是一次组织严密、准备精细、执行准确的间谍行动，可谓间谍老手的杰作。

在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穆尼尔家的全部成员都以这种或那种极其令人信服的理由先后到了国外多他的银行存款也全部提尽，而克格勃特务竟然未能在穆尼尔身上发现丝毫破绽。还有其他一些蛛丝马迹也说明这是一次有顶谋的行动。很明显，以色列事先已知道飞机的起飞及其到达的准确时间。在正常情况下，一架外国飞机闯入以色列领空，总会引起以色列空军的迅速反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贸然入侵者难逃厄运。可是这次情况却完全不同。

在巴格达，当收音机传出消息说穆尼尔·雷迪法并非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后，人们就更加怒不可遏了。实际上，穆尼尔是伊拉克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是经过了前苏联安全部门和伊拉克安全部门的精心挑选和严密考察之后，才跃入伊拉克军界特权阶层的。早先，穆尼尔曾被选送到美国接受美国空军的训练。后来，他又被派往前苏联学习高超的驾驶技术，最后才得到信任去驾驶米格-21飞机。在叛逃前，他已担任了空军大队长。

前苏联人的怀疑理所当然地落在以色列中央情报保安局莫萨德的身上。实际上，穆尼尔的叛逃正是由莫萨德一手策划的。将一架米格机如此完好无损地弄到手，这是以色列特工部门迄今最漂亮的行动之一。而莫斯科只是在若干年后才搜集到足够的细节情况，把这个复杂的谜理出点头绪来。

天赐良机，巧妙安排，是这次行动得以成功的原因之所在。所谓天赐良机，那要从一位年轻的犹太女间谍讲起。她出生于纽约，被莫萨德的上司派往巴格达搜集情报。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首脑参加的招待会上，她结识了英俊、结实的穆尼尔·雷迪法。她的姓名和身份至今仍然是秘密，因为她是属于那些和自己的秘密共存亡的间谍。飞行员无力抵御女间谍迷人的魅力，这实在是这位年轻的女间谍和莫萨德的运气，而克格勃和伊拉克却倒透了霉。

很快地，穆尼尔就堕入了情网。虽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穆尼尔出自对伊拉克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的同情而忌恨伊拉克人这种感情而叛逃。

但在情网中挣扎的穆尼尔毕竟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投向了敌人。女间谍虏获了穆尼尔。有一次，她欣然接受了穆尼尔约她吃饭的邀请。就在这天晚上，在穆尼尔的房间里，当穆尼尔将她从怀中放开时，她巧妙地故意让穆尼尔看见了自己的真正的护照——美国护照。

穆尼尔越陷越深。年轻的姑娘提议他们一起去欧洲度假，反正飞行员是可以请例假的，穆尼尔欣然接受。

于是，在某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女间谍向穆尼尔倾诉了衷曲，直截了当地要求他陪她到特拉维夫去。她保证他们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去以色列。飞机票不用他们掏钱。伊拉克飞行员同意了。

穆尼尔·雷迪法拿着一张他的女伴极其偶然地放在箱里的新护照，顶着别人的姓名开始旅行了。他来到内格夫的某个军事基地，受到了大人物般的礼遇。

以色列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您愿意重返巴格达带着您的飞机再来以色列吗？”

“您会得到报偿的。我们绝对保证您的安全，保证给您和您的全家享有以色列公民权，保证为你们提供一套住宅和终身的工作。”

以小名“莫蒂”闻名的以色列空军司令莫德凯·霍德将军亲自会见了伊拉克客人，和他共同拟定了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他们精心制定了一条曲折复杂的路线，以便尽可能地避开伊拉克和约旦的雷达站和空军基地。

按照这个计划，穆尼尔必须想方设法找到一条理由在他的飞机上装个副油箱，以保证飞往以色列时有足够的油料，同时又必须不引起他们基地的前苏联顾问的怀疑。他和以色列人都完全明白，叛逃一经发觉，前苏联顾问会调动一切力量击落这架歼击机。

事情按照事先拟定的时刻表进行，并将在事先决定的几个日期中选定一天，作为行动的日子。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必须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明白该在什么时候迎接这架珍贵的米格-21飞机。

穆尼尔·雷迪法又回到了欧洲。那个姑娘一直陪伴着他。她很担心伊拉克飞行员一回到巴格达就背叛她。但穆尼尔说话是守信用的。

他们等了好几个星期，良机终于来到了。

在一天早晨，穆尼尔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加满油。当机械师执行命令时，穆尼尔密切地注视着他们。

机械师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前苏联顾问曾三令五申，要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最低数量之内。这是一项所谓的“安全措施”。但伊拉克人都明白，这是不信任伊拉克飞行员。他们为这种不信任而感到苦恼和羞耻。

穆尼尔多年来单独执行巡逻任务时总是“循规蹈矩”，这一点帮了他的忙。而且，此时此刻，俄国人正聚在一起吃早饭，无心干涉伊拉克人的事。

机械师们服从了穆尼尔的命令。首先，这是因为穆尼尔是一位上级军官。其次，谁不恨那些傲慢的俄国佬呢。

此外，这天早晨，机械师也不会怀疑在遥远的特拉维夫已制定了叛逃计划。

穆尼尔·雷迪法的动作没有露出丝毫的匆忙，他从容不迫地起飞了，方向是巴格达。一飞出基地视野之外，他突然向南转，接着又对准西方；直飞以色列。他极其准确地按莫德凯·霍德将军为他详细布置的900公里的航程飞机。随后，他又降低了高度，为避开雷达的监视而作低空飞行。当他到达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人还没有发现出了事呢。

以色列的雷达确定了这架以商定的高度和速度飞到它们上空的单机的身份，一中队幻影式飞机立即起飞，为约旦河西岸上空飞行的叛逃者护航，因为此时的约旦河西岸还处于侯赛因国王的控制之下。

为了使自己的身份不受到任何怀疑，穆尼尔做了一连串事先约定好的动作。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被准许越过死海。降落在内格夫沙漠一个军事基地上。当他把米格-21飞机交给霍德将军时，他得到了事先许诺的以硬通货支付的报酬。后来他获得了以色列国籍，在一个秘密处所过着安宁的生活。穆尼尔没有同他的“美国女友”结婚，浪漫之花没有结出理想的果实。

为策划这次事件并成功地得到米格-21飞机，以色列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不管怎样，这是一宗一本万利的交易。

在以后的日子里，伊拉克人穆尼尔非常乐意地同丹厄·夏皮纳及其他以

色列飞行员合作。他把他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以色列人，还提供了有关前苏联空军袭击和防御技术的重要情报。最后，他还把前苏联人对阿拉伯飞行员进行战术训练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霍德将军。

这架米格-21飞机被重新装饰了一番，还在机身上喷上了“007”三个特别醒目的数字，以防某个过于主动的以色列飞行员击落它。在丹尼·夏皮纳和穆尼尔·雷迪法的驾驶下，它飞行了数万公里，在以色列上空进行了几百次模拟战斗。他们通过电子计算机处理的无数个数据，分析了俄国歼击机的每一个优点和每一个缺点。

以色列人发现，尽管米格机的外形并不怎么样，但其性能确实是第一流的。特别是在高空，那真是杰出的歼击机。以色列人还得到了极为先进的、以红外线制导的环礁式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装在米格机上，成了令人生畏的“杀手锏”。到后来当美国人也获取这个信息时，他们也感到不安。经过几个星期的模拟战斗试验后，米格飞机暴露了两个弱点。幻影式飞机的水平视野为360°，而米格机却出现了相当多的死角。在后来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使前苏制飞机吃了很大的苦头。为了使发动机具有更大的推力，这架前苏联飞机使用的是普通汽油。汽油的高度易燃性使得飞机的油箱部分极易受到损害。这一点在“六天战争”中得到证实，往往只空战几分钟，命中一炮就足以使米格机顷刻间化为火球，让那些阿拉伯飞行员连使用弹射座椅都来不及。

当1967年6月“六天战争”爆发时，以色列飞行员已完全掌握了俄国飞机的性能和特点，并且熟悉了在前苏联受训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将会采用的战术。这一切对以色列人在战争中完全掌握主动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400架前苏联制造的图波列夫式、伊柳辛式轰炸机以及米格-17；米格-19、米格-21战斗机在进攻一开始就在跑道上被打得个稀巴烂。在空战中，幻影式飞机把米格飞机一架一架击落了，而以色列人却无一伤亡。

制空权一经掌握在手，达扬的步兵师、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就取得了叙利亚和埃及部队的决定性优势。毫无疑问，阿拉伯空军的被歼是因为以色列飞行员掌握着高超的技术，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占有另一个优势：在穆尼尔·雷迪法的帮助下，他们熟谙苏制米格飞机。

2. 故技重演，又获米格-23

一天中午，两架叙利亚苏制米格-23LM战斗机从距大马士革30公里远的一个空军基地轰鸣而起，前往毗邻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作正常训练飞行。突然，两架叙机中的一架偏离正常航向，掉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来。它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后从雷达荧屏上消失，降落在以色列“麻旧都”基地。飞机刚刚停稳，以色列安个情报人员迎了上去。

图6 米格-23飞机

第二天，叙利亚官方对飞行员叛逃事件作出正式反应。新闻局长向外国记者宣布：叙利亚一架飞机因发动机起火，飞行员被迫驾机降落以色列。

几天后，靠近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基地内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唱主角的正是叛逃的叙利亚飞行员。他自称是领航员，名叫穆罕默德·巴西姆·阿迪勒，33岁，未婚。当他被问及叛逃过程中有何感想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迷津中的行者。”

他的确游离在迷津之中，而且已经好几年了。几年前，以色列情报机关莫萨德成功地招募了一名黎巴嫩德鲁兹姑娘。当时，这位姑娘日子过得很惨。一个偶然的机，她在黎巴嫩南部邂逅了一名莫萨德官员。这个以色列情报官员拉她入伙，并带她晋见了莫萨德总部人员。她向莫萨德官员流露出到以色列生活的愿望。以色列的条件是要她为以搜集叙利亚空防情报。叙利亚曾要求前苏联向其提供米格-31 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以色列迫切希望能证实叙利亚是否已得到比米格-23 更先进的前苏制飞机。于是这位姑娘前往大马士革。在那里，她结识了飞行员阿迪勒，并设法赢得了他的欢心。阿迪勒渐渐对她深信不疑，把自己知道的军事机密和盘托出，这位姑娘则不失时机地将情报转交给莫萨德。以色列想搞到一架米格-23 来了解飞机制造技术发展的程度。于是，莫萨德又交给她一项任务：策反那名叙利亚飞行员，令其驾机飞往以色列。这位姑娘用几年的时间大胆地一步步地付诸行动，用她的以色列朋友所过的“民主生活”来打动阿迪勒。他慢慢被驯化了。阿迪勒的言行引起了叙利亚情报机关的注意，对他进行了审问和调查，但除了他占用分给同伴的一套住房外，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一年后，莫萨德官员同阿迪勒在黎巴嫩南部频频接触。莫萨德要求阿迪勒驾机飞往以色列，阿迪勒提出了两个条件：允许他娶那位德鲁兹姑娘；在飞机平安抵达以色列后马上向他支付 1000 万美金。

阿迪勒叛逃成功，莫萨德如愿以偿。

(二)克格勃偷“机”不成蚀把米

1. 三百万的大买卖

贝鲁特的黑夜，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地中海吹来的海风，温暖而柔和。一辆蓝色的跑车驶过市街，沿着海边的马路飞驰。

驾车的人是黎巴嫩空军中尉穆罕默德·马特，他把跑车转入一条两旁种满了柏树的小路，驶到一间小别墅门前。这间小别墅座落在贝鲁特幽静的住宅区，面对着地中海，这是马特以前的教官哈桑·巴达维的住宅。

巴达维原是黎巴嫩空军的飞行教官，后来因为涉嫌走私贩毒，以及道德败坏而被空军革职。他离开空军后，混进中东航空公司，当了一名机长。他手头经常都很阔绰，特别是每次从印度飞回来之后，总是有大把大把钞票。这些钱的来历，那就别问了。

这一晚，巴达维把马特请到他家去，单刀直入地问道：“老弟，你想发一笔大财吗？”

马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巴达维，他对

巴达维的老底相当清楚，于是他耸耸肩头，说：“谁不想发财？不过问题总是一句话，怎样去发？”他长得很英俊，也很年轻，皮肤微显棕黑，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巴达维知道他已有妻儿，很需要钱花。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你是完全可以给他们弄到手的。”

“什么货色？”马特以为他讲的又是什么私货，“可是我在空军没有你在民航那样便当的。”

“不，相反，正因为你在空军，才有办法。他们想要一架幻影 -E 式的战斗轰炸机。”

马特惊讶地扬起眉毛，瞪着巴达维，说道：“你疯了？那是我们空军的飞机啊！”但是巴达维继续讲的一番话，使他背后一阵发凉，虽然中东 8 月的天气是闷热的，但他还是浑身冒出冷汗来。

巴达维说：“只要能把一架幻影式飞机弄到手，你可以捞到 300 万美元，保证你一辈子也享用不完，至于你怎样去花这笔钱，谁也管不了你，你可以离开黎巴嫩，周游世界，过公子王孙的生活。”

马特问：“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那无关紧要，只要你肯干，那就成了，管他们是谁？有奶便是娘，谁给我钱谁就是上帝，你肯吗？”

马特把杯往桌上一搁，犹豫他说：“钱这东西，谁能拒绝呢？不过，偷飞机可是件大事，这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道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我需要好好地考虑一番，我不想贸然答应你，我得有个时间想一想。”

“对，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过可以向你保证，事先会有人为你做周密的安排，不会出差错的，你放心好了。过几天我们再碰碰头，你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吧。”

马特点点头，巴达维拍拍他结实的肩膀说：“老弟，我介绍你这宗买卖，是一本万利，绝对保险的。”马特显出一种动容的微笑，一边点头，一边向自己的跑车走去。

当蓝色的跑车以飞快的速度，在林荫道消失之后，巴达维满有把握地微笑起来，他信得过这小子，马特的飞行技术是一流的，他以前当马特的教官时，两人的关系就十分亲密，巴达维相信他一定会答应的。

2. 谁对“幻影”发生了兴趣？

幻影式飞机，是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亲自关怀下设计制造成功的世界一流的超音速喷气战斗轰炸机，被认为是“法国的光荣”，在当时(60年代后期)堪称是性能最佳的战斗机。很多国家都向法国购买了这种飞机。仅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就有250~300架幻影式飞机，保卫着西欧的天空。在1967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中，幻影式飞机又大显身手，在空战中将最新式的苏制米格式飞机击落。幻影式飞机全长14.15米，翼展8.22米，机高4.274米，空重6.35吨，相当于美国F-104型的轻型战斗机，它具有2马赫的高速连续作战两小时的能力，最高的实际飞行高度为29500米，续航里程为3000公里，机上配备30毫米机关炮两门、“马托拉”空对空导弹两枚，还可以携带炸弹和导弹，它不只外型美观，而且性能卓越。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配备的是苏制米格式飞机，在战斗中就相形见绌，纷纷被以色列的幻影飞机击落在中东的沙漠上。

前苏联情报机关久欲探知幻影式飞机的秘密，因为幻影式飞机装备有特别的电子仪器，可以轻而易举突破前苏联空防，发射核武器。早在1966年克格勃特务曾设法在法国偷取了一些这种飞机设计的计划，但是未能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功能，如要有效地对它进行作战，还必需取得一架实物，以进行实际研究，制订战术。米格机连续失利，使前苏联人十分着急，克格勃经过研究，选定在黎巴嫩下手偷飞机。

为什么克格勃选定在这个地中海边上的小国进行偷机行动呢？他们认为，首先是这个国家弱小，不会也不敢跟前苏联对抗，而巨这个国家人口只有250万，军队大约只有1.5万人，克格勃认为这个国家的反间谍机关是低能的，政府的腰杆子也不硬，是无法阻止克格勃一次坚决的行动的。同时，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是些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的人，不会有人拒绝贿赂和收买，况且偷飞机的报酬是个不小的数目，谁会拒绝合作呢？

巴达维在8天之后，打了个电话给马特：“老弟，我的那些朋友义问起你了，你作出决定没有？”

“决定了，”马特答道，“我同意你提出的条件，我干。”

“好！”巴达维听了很高兴。

两天之后，又是在黑夜里，马特的蓝色跑车驶进了林荫道，到巴达维家赴约。

这晚，在巴达维家中，还有另一个客人，这是一个蛇头鼠眼的家伙，经巴达维介绍，马特才知道他是前苏联在贝鲁特的贸易代表团的代表华西列夫。

华西列夫十分谨慎而且正式地对马特提出一系列问题，查询他的个人出身、家庭背景、历史、在军队中的纪录，以至飞行经验。最后他显然满意了，说道：

“我们的计划说起来十分简单，你只要在常规训练飞行时正常地起飞，飞到海上去，然后报告说你的飞机出了机械故障，过一分钟左右，发出求救信号，跟着你就俯冲到海面，贴着海面飞行，避开雷达网的侦察，改变航线，飞往巴库，他们准以为你已失事跌进海里去了。”

“你们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交付那300万美元的报酬呢？”马特问。

“300万！”华西列夫叫起来，“不！不！谁说300万美元？我们只出

100 万美元啊！”

“什么？讲好了 300 万，怎么又赖了？那不行，我才不会为了区区 100 万去冒这个险呢！”

“我没有答应过给 300 万呀！”

马特不满地转过头，问巴达维道：“你怎么搞的？你不是讲好他们出 300 万美元的？”

巴达维脸胀得通红，支吾以对，因为他为了要引诱马特合作，夸大了数目，而俄国人事先只讲出大约数目，没说明是 300 万还是 100 万，现在事情就因这数目僵住了。马特坚持 300 万才肯干，而华西列夫只答应出 100 万，于是争吵不已。巴达维没有办法，一方面劝华西列夫加价，一方面劝马特减价，最后马特很不情愿地答应减至 200 万，不过要先付 60 万。这事令华西列夫很为难，他犹豫了好一阵，然后说：“这事我个人作不了主，我得和别人商量一下，才能决定，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华西列夫走后，马特满脸不高兴，巴达维反而埋怨他：“老弟，你怎么不坚持 300 万呢？俄国佬正急于要一架幻影飞机，别说 300 万，400 万他们也肯出的，你白白给他减掉 100 万，太不上算了。”

马特真火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讲清楚呢？那俄国佬看来真不敢决定数目呢。”

“他会回去请示，一定答应的，老弟，跟俄国佬打交道我比你有经验，别看他们嘴硬，到头来还得靠我们。为了得到一样对他们战略有用的秘密，他们从来是不惜工本的，他们使的是国家的钱，不会吝惜的。”

3. 最高当局拍板定案

事实上，华西列夫这个前苏军情报局的特工确是自己作不了主的，他得请示上级。他的上级是前苏联驻贝鲁特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亚历山大·科米亚科夫。科米亚科夫是克格勃的间谍网头子。当华西列夫向他报告之后，科米亚科夫也皱起眉头来了，凭着他过去的经验，认为这笔交易并不简单，过去他曾在中东进行过多年的秘密活动，自信对于阿拉伯人是十分了解的。他曾断断续续在土耳其做过 9 年间谍工作，甚至还计划主持过一次劫狱，救出被捕的前苏联特工。科米亚科夫年约 45 岁，是一个高大肥胖的男子，有一个相当好看、红润光泽的面孔，已两鬓如霜，他是个粗野而蛮横的人，黎巴嫩人都叫他“冲进瓷器店的俄国蛮牛”。9 月 9 日，科米亚科夫带了华西列夫乘前苏联航机飞返莫斯科，向克格勃中央请示。

克格勃总部听完了他们的汇报后，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订出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连同活动经费预算，送交最高当局审核通过。

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要求克格勃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务必弄一架幻影式飞机回来。并下令要科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立即返回贝鲁特执行。同时，还讲明无论如何要把飞机弄回来。科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立即飞返贝鲁特，他们还带了一系列详尽细致的指示。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写成的，以保证他们和马特都能了解得完全正确，不会有任何误解，导致行动上的差错。

9 月中，他们回到贝鲁特之后，华西列夫把马特约到他那间在离前苏联大使馆三个街口远的外贸团的公寓七楼的住所去见面。马特应约前来，华西列夫将他迎入客厅，客厅里还有一个俄国人，那是科米亚科夫。

科米亚科夫讲明：“我们已同意了您提出的 200 万美元的要求，不过，

讲到预支，按做买卖的常规，支 60 万未免太过了点，还是按 10% 预支吧，那已是 20 万了，足够你安家的了。”

马特听他这么说，扮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勉强点头答应下来。

“那么，你什么时候行动？”科米亚科夫问道。

马特说：“我 10 月 3 日预定是要作一次训练飞行的。”

“好极了，”科米亚科夫说：“到时我们会做好一切准备接你的。”

科米亚科夫向马特嘱咐道：“为了你妻子儿女的安全，最好是在这几天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搭飞往柏林的班机，转往赫尔辛基，然后到莫斯科，你们今后就可以在苏联过着高枕无忧的豪华生活了。”

马特摇摇头说：“不，我妻子不会到苏联去的。我讲老实话吧，我并不信仰你们的制度，我答应偷飞机只是看在钱的份上。我已同妻子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在瑞士度过下半生。”

科米亚科夫对马特断然拒绝在前苏联生活并不感到受窘，他早就料到这一点的，他对阿拉伯人太了解了，阿拉伯人不喜欢他们，但有些人贪钱，为了钱是什么都肯干的。于是，他答道：

“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儿去随你的便，你为我们干好这工作就行了。我们会关照你下半辈子的。要是你欺骗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关照你下半辈子，要你的命的。”

马特冷冰冰地答道：“我会做我的工作，不过在我起飞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 20 万。”

“行，行，你会得到它们的，放心！”科米亚科夫不耐烦他说，他打心里眼里就瞧不起这个为了钱出卖国家的阿拉伯人。

马特说：“先讲明了，我可不要现钞，拿一大笔外币招摇过市是容易引人怀疑的，我要一张支票，写我父亲的名字就行了。”

“支票？不要现钞？”科米亚科夫怀疑地问。

“我不会分辨伪钞，谁知道你给我的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马特冷笑道。

科米亚科夫咧嘴笑了，也许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赞许吧，这个飞行员倒还有头脑呢！他从口袋掏出 2000 元黎巴嫩币，交给马特，说：“这是真的钞票，你拿去花，足够你把家人送到欧洲去的了。”

马特高高兴兴地接过那 2000 元，放进口袋，问道：“那支票呢？开给我吗？”

科米亚科夫拍拍他的肩头，说：“9 月 30 日的晚上，我们在这儿再碰一次头，到时我们对飞行计划作最后的讨论，我那时会给你准备好支票的。”

到底前苏联驻黎巴嫩的大使萨瓦尔·阿兹摩夫是什么时候获悉这次偷机行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在 9 月 30 日他是极端为此担心了。当天傍晚，前苏联使馆二等秘书打了个电话给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说取消了阿兹摩夫原定在 10 月 1 日与美国大使的会见，他只解释取消的理由是不适，当美国官员再问什么时候可以会见美国大使造访，回答是“过了 10 月 3 日再说”。

4. 公寓喋血间谍就擒

9 月 30 日晚，马特空军中尉显得稍为紧张地走进了华西列夫的寓所。为了使她安心，科米亚科夫交给他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是 1969 年 9 月 29 日由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的，写明支付给马特的父亲。科米亚科夫同时还给

了马特两张 500 元的钞票，是给他大大在欧洲生活的费用。他说：“你看，我们说到做到。”

华西列夫对航空方面比较熟悉，将指示的法文本慢慢读给马特听，讲清楚这次飞行的准确高度和航线：“在飞到 3000 米高度时，向贝鲁特机场塔台报告，说发动机出了毛病，操纵舵失灵，然后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在这之后，将无线电通话完全切断……你将飞机急剧俯冲，在接近海面时贴着海面平飞，避开雷达侦察网，然后向苏联飞专，在你越过苏联国境四分钟之后，就会有三架歼击机飞来同你会合，为你导航飞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如果会合不上，那时你就用 322 兆赫的频率，同我们的基地联络……”

当他们三个正在研究这次飞行的具体纲节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华西列夫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微微打开往外看是谁，在走廊上有十几个穿着军装的黎巴嫩人，正拔出手枪指着这个门口。

“有宪兵！”华西列夫狂叫一声，拼命想把门关上，但已经太迟了，一个黎巴嫩士兵已将皮靴插在门缝，正用力将门撞开。那俄国佬捡起一个哑铃，发狂地挥舞，砸向那士兵的脚。科米亚科夫在这当儿，脸上显出恐怖和愤怒的表情，马特飞身向华西列夫扑去，抱住他，两个人纠缠倒在地上。科米亚科夫已拔出手枪开火了，头三枪射中了黎巴嫩的宪兵队长亚巴斯·哈姆丹的腹部和腿部，华西列夫这时也挣扎起来，向一个黎巴嫩宪兵胸部开了一枪。黎巴嫩宪兵立即开枪还击，一时子弹乱飞，华西列夫被一枪打倒，黎巴嫩人立即扑上去把他制服。科米亚科夫这时已身中四弹，仍负隅顽抗，他闪身走进另一间房间，重新装子弹射击，这时第五粒子弹又击中了他的手臂，他已满身是血，跌跌撞撞冲向窗台，把窗户推开。这时他已明白，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败，也明白马特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人物，他是黎巴嫩的反间人员。但当科米亚科夫挣扎着想跳出窗外时，两个宪兵已冲上来，将他抓住，另一个宪兵已将那飞行计划和支票拿在手中。

在这间贸易代表团公寓居住的其他俄国人，听见枪声卜卜，都往前苏联大使馆跑去报信，克格勃立即向莫斯科拍发密电，派了一个前苏联女医生到军事医院去，要求为华西列夫和科米亚科夫治伤。而科米亚科夫的伤势特别严重。

在凌晨一点，黎巴嫩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简报，宣布逮捕了科米亚科夫、华西列夫和巴达维三人。不久后，官方又详细公布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原来马特中尉是一个爱国的黎巴嫩人，当他第一次同巴达维见面，巴达维提出偷幻影式飞机之后，他就向反间谍机关报告了这件可疑的事。黎巴嫩军方的第二局是反间谍机关，他们为了要引出已达维幕后的主使人，就指示马特佯作答应偷机，扮成一个只要金钱不要国家民族的人。他们还在他的衣服上装配了一个十分精巧的窃听器，把他同俄国人所有接触和谈话全部录了音，为了要使俄国人更信任他，马特提出逃往瑞士，而要求支票是取得实物罪证。马特中尉对这个反间谍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

相反，克格勃特务由于他们对阿拉伯人盲目地抱有藐视和成见，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首先他们依赖一个像巴达维这种无耻的人，就是一种失策。其次，他们约马特到俄国人居住的公寓见面，竟大意到没有对他进行电子侦察，以至让他带有窃听器，录下了所有的谈话。第三，他们对马特没有进行反监视，相反却同意马特的要求开支票给他，而且不用外国银行，竟直接开莫斯科人民银行的过户支票。最后的错误是明知一败涂地，还首先开枪，挑

动一场枪战。

这一场间谍战，俄国人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克格勃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立即匆忙组织大规模的反击活动。

5. 推卸罪责喊捉贼

10月1日早晨，克格勃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黎巴嫩、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亲苏人士，散布出一种谣言，硬说整个偷取幻影式飞机的案件，是美国的挑拨，旨在破坏黎巴嫩和前苏联的关系。前苏联新闻社发出大量稿件，列举前苏联是如何支持阿拉伯人民，同时克格勃派到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军官符拉迪斯拉夫·彼得洛维奇·崔可夫到黎巴嫩外交部，提出抗议，威胁黎巴嫩政府，如果继续将这事件公开，就赶走所有在莫斯科的黎巴嫩外交人员，也就是说断绝外交关系。

上午11时，前苏联大使阿兹摩夫会见黎巴嫩总统，正式提出前苏联的要求，必须立即将被捕的两个前苏联人释放，还要求惩办黎巴嫩反间谍军官，公开向前苏联道歉。

前苏联还喊捉贼，要黎巴嫩政府声明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炮制的事件”。

前苏联还指使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对黎巴嫩施加压力。

10月2日，黎巴嫩在强大的阿拉伯邻国的压力下屈服了。黎巴嫩政府下令禁止外国记者再报道这件事。说再进一步报道这件事将“对黎巴嫩最高利益极为有害”。克格勃这一下是成功了。但是，前苏联阴谋偷取幻影式飞机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世界。

10月4日，一架前苏联航空公司的特别客机在贝鲁特机场降落，停在机场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就像不想被人看见似的。华西列夫和科米亚科夫被搬上飞机，后者是用担架抬上去的。

马特这一位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200万美元之上的军官，被提拔为飞行队长。克格勃恨不得宰了他，由于这种威胁，黎巴嫩军方把他派到秘密地点，严密保护，他的同僚十分敬重他，把他当作民族英雄。

(三) 中情局大洋深处偷潜艇

1. G 级潜艇爆炸沉没

1968 年 4 月 11 日，有一艘前苏联潜艇在太平洋水下游戈。这一艘携带核导弹的 G 级 型柴油发动机潜艇，全长 96 米。在这艘只有 8 年船龄的潜艇上，有 98 名乘员。潜艇正以 17 节的航速驶向一个预定的地点。这艘潜艇属前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

大约离夏威夷群岛西北部 750 海里处，这艘潜艇突然发生爆炸，全体乘员连同 3 枚核导弹以及海军密码，一起沉没到 5000 多米深的大洋底。在海底发出深沉而巨大的声响之后，无边的海洋又慢慢恢复了常态，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不管是美国还是前苏联的官方刊物，都没有报道过这次灾难。但是这艘前苏联潜艇一直在美国声纳监测网的监控之下，直到它爆炸沉没。嗣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使用水面舰船、潜艇和声纳探测器对这一地区严密监视了几个月。前苏联使用飞机和间谍拖网渔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踪迹。他们断定它一定沉没了，于是，便保持了极其冷静的沉默。

图 7 苏制 G 级弹道导弹潜艇

接着，间谍史上一项最离奇、开支最大的秘密使命便开始了。

2. 珍尼弗工程

尚未从“普韦布洛”号事件而丢失海军密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美国谍报机构的头头们立即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但是他们的手脚仍被捆得不能动弹，原因并非技术不足，而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海军的财力都因为夺回“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而大伤元气。美国公民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见到被俘的士兵被释放回来，这就成了美国在被俘人员获释之前一年多时间内的主要目标。在此期间，同莫斯科的关系紧张了，因为在外交界，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是人们唯一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气候里，打捞前苏联潜艇是一种危险的行动。不过，美国不久就有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实现这个计划的良机。美国谍报机构的头头们着手制订了一个大胆的、以此来弥补美国海军丢失密码的损失的计划。

除了要力求避免与前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触发成一场核战争的危险之外，这个打捞计划的代价实在难以估量。设计、制造以及管理一个能从 5000 多米深的大洋底打捞潜艇的装置，费用要远远超过 4 亿美元，这笔庞大的开支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年的全部经费。

美国人知道，在世界各地中央情报局的各项使命都是由一些掩护性的机构去完成的。这也表明它有能力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它可以轻易地把这一切用一块商业公司的招牌组织起来。霍华德·休斯帝国自然是一个最现成的对象了。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们凭借他们与休斯诸公司多年的交情，才决定这样做的。在陆地资源枯竭的时刻，开发海底资源已势在必行，因此请休斯来承揽这个太平洋工程，是一个最理想的挡箭牌。这样一来，在公开寻找锰结核的时候，休斯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不受阻挡地打捞前苏联潜艇，然后把它拉走，交给情报部门去分析研究。

1969 年，中央情报局与休斯签订了合同。对于休斯来说，除了央情报局

的信任。这次合作与联系可以使他的帝国免受政府的纠缠。

休斯可能始终都不了解这次合作的真正秘密。也许他根本不会分析他的合作者们送来的报告。不过，熟悉休斯的人暗示说，他一想到这个秘密使命使他有可能会逃脱时，他就兴高采烈……

这一打捞潜艇的计划被命名为“珍尼弗工程”或者叫“亚速尔岛人使命”。

休斯的“全球商船”公司于公司为珍尼弗工程准备了两条船——一条是在宾夕法尼亚建造的“格洛玛·探索者”号。另一条是在圣地亚哥建造的“格洛玛·挑战者”号。

珍尼弗工程共有四个阶段。第一，机械的设计，包括“格洛玛·探索者”号、潜水平底驳船以及工程需要的全部钻管和回收器；第二，这些机械的制造；第三，实施的准备工作；第四，代号为“T·O·”意即“靶子”的行动——打捞前苏联潜艇。

1974年夏季，“探索者”号与“挑战者”号驶向太平洋中心潜艇沉没的地点。这两条身负特殊使命的超级船，成了汪洋大海里的特洛伊木马。当然，这次行动的借口是，霍华德·休斯的两条船被雇用来开采海底的锰结核。从部分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真的。

两次不幸的事件把珍尼弗工程的真相暴露了。

1973年10月，一个工会向法庭控告全球海洋公司解雇10名人员。公司拒绝让其高级行政官员出庭，以免被迫发誓，把两条船的秘密使命暴露出来。此后，1974年6月，在洛杉矶罗马尼街上的休斯总部夜间遭到武装人员的偷盗，他们弄走了大量文件。不久以后就有人给休斯的一位代理人打匿名电话，要求以100万美元换回这批“重要文件”，暗示并威胁说，要不然他可以证明中央情报局同休斯的萨马公司之间的秘密关系。直到联邦调查局出面干预，试图代表美国政府来买回这些文件时，新闻界才开始怀疑，这后面一定大有文章。

原来，萨马公司的经理们知道，那伙强盗肯定已经复制了文件的副本，因此拒绝支付这笔赎金。过了两个月，即1974年8月，从中央情报局总部那里得知，在被盗文件中，有一件是霍华德·休斯关于打捞前苏联潜艇的亲笔摘录。

联邦调查局出面后，要求洛杉矶的警察头子安排一下政府提供赎金取回文件的事情。尽管命令便衣警察在取回文件后不许偷看，但他们为了鉴别真伪，非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不可。

要杜绝泄密是办不到了。6月初，有人把全部情况告诉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威廉·法尔。被盗事件8个月之后，即1975年2月的一天，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打开刚刚出版的《洛杉矶时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纸头版上方有一条通栏大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

在6年多的时间里，珍尼弗工程的机密一直保守得很好，在中央情报局、海军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萨马公司、全球海洋公司、洛克希德公司里，以及尼克松、福特两届政府里，只有确实需要知道的人才了解这个机密。据各情报机关的情况分析，前苏联人肯定还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在打捞期间，前苏联侦察船和直升机虽曾抵近现场侦察，但并未发现什么破绽。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捂得最严实的机密终于曝光了。

《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使全世界千百万人群情激昂。文章差不多占

了一整版，此外还有一张“探索者”号的照片。作者提到了休斯与中央情报局秘密签署的一份合同。

中央情报局迅速作出反应。威廉·科尔比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洛杉矶时报》中断刊登这则消息，并与主编达成协议，文章的续篇不再见报。

《洛杉矶时报》开始辟谣，但仍无济于事。

打捞的详情没有公开，但是，尽管报道说有挫折，看来这条潜艇的一部分确已从海底被捞了上来。目的当然是要找到这条潜艇的密码本和绝密设备。中央情报局在作了艰巨努力来说服报纸不要发表报道之后，最终他们自己对珍尼弗工程作了介绍。这个介绍说，他们已找到部分残骸，意思是说，要把潜艇的其余部分和密码本取上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官方的介绍还补充说，找到了70名前苏联船员的尸体，这些尸体在海上得到了正式安葬。安葬的仪

式用俄、英两种语言进行，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自然，这项行动只取得部分成功的说法，不可避免地在国会中和报刊上引起了喧嚷，说这是对公共资金的巨大浪费。但报刊上也有一些另一面的意见，即让俄国认为这项行动是个失败，密码本及整套导弹系统还未落入美国人之手，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

在这引起争议的全过程中，克里姆林宫始终默不作声。

据1975年4月13日报道，中央情报局正准备派“探索者”号去把沉没潜艇的其余部分及密码本吊上来。莫斯科没有表示任何怨言，也许因为它从来没有承认损失了一艘潜艇。这一新行动的代号为“斗牛士计划”，关于这项计划的某些消息传了出来。据说设计了一个恰好适用于这艘潜艇残骸的新的爪型器具，这样就可以把残骸吊上来而不损害安装核导弹的驾驶指挥塔。据说这一次的使命是要找到导弹、鱼雷和密码本。但这一次几乎同密码本毫不相关，很可能这第二次的使命是为了掩饰中央情报局在第一次已经找到了他们所要找的东西。

大约在珍尼弗工程的秘密传出的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英美在联合寻找1972年在北海坠毁的一架前苏联飞机上的电子装备。全国广播公司说，在海上失事后寻找前苏联军事设备的这类行动至少已有四次，这仅是其中之一。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引用了前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和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的话来证实这些行动。伦敦的国防部则拒绝对这些报道加以肯定或否定。

1975年末，当人们获悉海军研究费用从1.52亿美元增加到2.75亿美元时，美国的打捞计划遭到了更多的强烈批评。后来，檀香山报告说，有一条前苏联拖船在那个地区呆了好几天，不仅有两艘前苏联的大型海洋学船舶正式开向夏威夷，而且不久还会有第三条船来。两国海军之间不声不响的秘密战争罩上了一层沉默的面纱。但是《海军技术》杂志于1976年3月报道，美国海军起初就反对这项计划，然而上头却决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费用应从海军自己的研究费用中支付，真是使它苦上加苦。这家杂志有自己的“海军院外活动集团”它声称，其结果是美国海军反潜艇战的一些研究活动不得不削减。不管这些批评是否正当，现代海军谍报工作的真正危险在于，在某些场合下，这项工作却不由在专业及其他各方面都配备得最好的海军情报组织自己来处理。像珍尼弗工程这类行动，只有美国海军情报署自己才能判断，它所牵涉到的费用以及在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风险是否值得。

在大洋底秘密打捞前苏联核导弹潜艇的神秘行动，耗资 5 亿美元，历经曲折，整整用了 6 年时间，而关于这次历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情况，将有可能永远淹没在巨大而黑暗的深渊之中。

3. “特异功能”帮了忙？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本书名叫《神秘的秘密战》的有趣的著述中，作者说，目前人类还根本无法用仪器探测沉没在 5000 米以下的大洋深处的东西。中央情报局是因为请了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纽约艺术家莫戈·斯旺才测出苏联潜艇沉没的地点。这位有名的艺术家具有大脑透视功能，据美国斯坦福研究院院长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托夫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说，莫戈可以用大脑“看见”千里之外的任何物体，乃至木星、水星上的情景。据报道，他对水星的描述，后来均被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飞行器“水手”10 号发回的照片所证实。正是这位具有特异功能的莫戈·斯旺，用他的大脑“看见”了沉没在太平洋底 5000 多米深的前苏联 G 级 型潜艇，为中央情报局打捞提供了确切的情报。

(四) 幻影行动

1. 莫萨德紧急出动

一个电话在特拉维夫和其他地方激起了一阵骚动。不到一个小时，以色列特工部门的兹维·阿隆上校已经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在罗马内科米亚赫·卡田上校也跳上了飞机，他也要赶往瑞士。

在苏黎世，弗劳恩克内希特所说的事差点使这两位以色列人从椅子上摔下来。他单刀直入地谈起他的计划的要点。

“你们想得到法国的幻影式飞机是枉费心机，寻求零部件也是白费时间，因为戴高乐总统已经下令禁运。”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知阁下能否帮助我们。”客人恳求道。

“可以，我能使你们得到完整的幻影式飞机。”

“这不可能，”阿隆上校说，“我们哪能盗走瑞士的幻影式飞机。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都藏在阿尔卑斯山的地道中，一重重厚厚的大门保护着它们，以避免受到原子弹的攻击。而且，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能下海盗的勾当。我们和瑞士政府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弗劳恩克内希特不耐烦地打断了以色列人的话。“我不是一个叛徒，”他说道，“把我们的幻影式飞机给你们，这将是一种叛变，但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

两个以色列人眼睛直盯着地望着瑞士人，完全迷惑不解了。难道他们飞到苏黎世来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瑞士人说话了：“我想和你们谈谈这种飞机的图纸问题。有了这些图纸，你们就可以自己造飞机了。”

听到这话，两位以色列人惊异的目光中露出了希望的神色，不一会儿，这希望的神色又被贪婪所取代。

“可以谈谈条件吗？”

“20 万美元。但我希望你们理解我这一行动并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2000 万美元也不算贵。我是为了帮助你们。我需要钱，那是因为一旦我被捕入狱，钱可以保护我的妻子。”

两位以色列人面面相觑。应该弄到这笔钱来满足瑞士人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幻影式飞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至此，当代世界上最大胆离奇却又意外获得成功的窃密活动揭开了它的序幕。要知道，有关幻影式飞机的设计图纸和文件足够装满一整节车皮啊！

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党内希特看来是一个搞间谍活动的天才。他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辅佑，也没有经过任何间谍职业训练，但他正在谱写间谍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2. 一车皮图纸

1968 年初夏的一天，当弗劳恩克内希特在公司的食堂里与总经理一起进早餐时，他平静地对总经理说：“赫尔·多克托·斯密特，我已经想好了一件能使我们每年至少节约 10 万法郎的美事。”

总经理的眼睛一下睁大了。还有什么能比节约金钱这种可能性更能使一位瑞士商人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升高呢！

“您知道，存放幻影式飞机图纸的那些保险柜占地面积太大。飞机制造

工程现在已经下了马。除非发生紧急情况，否则这些图纸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您打算怎么办？弗劳恩克内希特。”

“我建议把这些文件全部拍在缩微胶卷上。文件原本可在严密监督下全部销毁。这样，腾出来的地方就可以更好地利用了，我计算了一下，这可以使我们每年节约 10 万法郎。”

苏泽尔兄弟公司的总经理自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公司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派弗劳恩克内希特主持其事。

当然，安全问题是绝对有保证的，苏泽尔兄弟公司承揽着瑞士政府最秘密的工程，因此，早已被瑞士特工部门最有效地控制着。人们仔细地讨论了在温特图尔市焚化场里销毁图纸的步骤。

特工部门同意这个计划，但规定拍摄胶卷必须在军事安全部门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每份文件只能拍一张照片。他们甚至规定了拍摄工作所需要的仪器的型号，指定了进行拍摄工作的大厅，这个大厅尽可能远离普通人能去的地方。

正如弗劳恩克内希特所预料的那样。安装拍摄缩微胶卷的仪器和这些仪器的运转都受到了特工部门的严密监视。他们还同意买一部不显眼的菲亚特小型卡车运送已经拍摄过的文件。这些文件必须在每星期四凌晨 1 点整运到该市的焚化炉。

弗劳恩克内希特亲自提出在装卸文件的时候，要有两名武装人员在场。这位温特图尔市的工程师总是十分严谨的，他甚至把汽车从工厂至焚化场这段短短的路途中会遇到的风险也考虑到了。因此，他亲自选定一个心腹，也就是他的表弟驾驶汽车。这位表弟具备一切条件可以执行这项任务。他是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司机，他抽出每周的休息日干这项工作，由苏泽尔兄弟公司付给他报酬。

事情按瑞士的方式，象时钟一样准确地进行着。运送文件去焚化场的专用箱子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文件是飞机各个部位的图纸、说明书和有关安装工程的每道工序的详细材料。

制造飞机机体和马达还必须有一套专门的车床，苏泽尔兄弟公司同样也掌握着这些机床设备的全部图纸和资料。仅就一台机床来说吧，它的图纸就有 4.5 万份之多。

军事安全部门选定的人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拍摄胶卷的工作。他费劲地打开好几平方米的说明书和图表，仔细地拍摄着。每当他离开工作室时，都要受到搜身检查。

这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

每个星期，他大约要处理 50 公斤重的文件。到了晚上，这些拍摄过的资料被非常小心地装进没有标记的纸板箱里，每星期四早晨，这些纸板箱又集中放到专门准备好的大木箱里，由武装卫兵装上菲亚特小型汽车。

为了确保这一切进展顺利，弗劳恩克内希特每次都监督装货，然后登上汽车坐在他的表弟身旁。这样，他亲自监视着直到焚化场的 15 分钟路程。

到达焚化场的大厅之后，一位检查员清点纸板箱，亲自看着它们被一一打开，检查里面装的是否真的是图纸。只是在看到每一个纸板箱都被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之后，检查员才在一式二份的收据上签字。这是弗劳恩克内希特根据瑞士军方的意见要求这样做的。

弗劳恩克内希特的上司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甚至向他许诺将要发给一笔年终奖金。

公开的情况是这样的，暗地里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弗劳恩克内希特一上来就对他的职员和军事安全全部隐瞒了他曾用化名在温特图尔市租了一间车库，它在紧挨着离菲亚特小型卡车要经过的公路附近有一个特设入口。每逢星期四，载着文件的车子都要离开工厂和市焚化场之间的公路干线，开进这间车库。

在车库紧闭的大门后边，装着幻影式飞机图纸的纸板箱被迅速地卸下来，换上完全相同的别的纸板箱。事情很简单，弗劳恩克内希特早已向纸板厂老板另外订了一套纸板箱。在行动开始前的好几个星期，他和他那开车的表弟就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最后，他俩终于能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里完成调换纸板箱的工作。

弗劳恩克内希特熟悉瑞士官员的心理。他有绝对的把握，监督汽车卸货和把文件送进火化炉的督察员决不会想去念一念那些文件的。何况，这是绝对禁止的，因为这些文件都标有“绝密”字样。他的职责仅限于验证装满图纸的纸箱是否扔进了那已烧到了规定温度的火化炉里。

以色列人真走运，督察员没有进一步注意被销毁的文件。这些文件确实是图纸，但不是幻影飞机的图纸。早在几个星期前，弗劳恩克内希特就从伯尔尼弄来了这些废文件。

在瑞士联邦专利注册局，可以买到 50 多年前就存放在那里的文件。一天，注册官员非常高兴地向一位开着菲亚特小汽车来的人低价出售了大批文件。

买到这些低价的旧文件后，每星期六早晨，工程师和他的表弟便返回他们的私人车库。他们在车库里迅速地、不声不响地工作着，在纸板箱里塞满了从伯尔尼买来的旧图纸和旧文件，预先为下星期的调包做准备。然后，他们便把上星期四弄到手的真文件重新装上卡车，疾速行车 50 公里，送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

游客们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儿来参观辉煌的古罗马废墟，这座城市昔日曾是一座城堡，用来阻挡北部来的日耳曼部落，保护凯撒帝国，它的位置可以说是十分理想的。

因此，这里多来两位外国人，哪怕这两个人每星期都要来这里一次，是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的。

汽车直接开向城郊的一座仓库，这座仓库是瑞士罗兹英治公司的。仓库地处工厂云集的地区，因此任何人都不會留心小卡车的到来，异常迅速的卸货及离去。

卡因上校的一位“朋友”把仓库的钥匙交给了弗劳恩克内希特。这位朋友的名字叫汉斯·施特雷克尔。他是柏林人，为这家运输公司工作仅仅才 12 个月，但他深受雇主们的赏识，博得了他们的完全信任。

施特雷克尔同海关人员混得很熟，并深得他们的赞赏。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当这些人出发去欧洲各地时，为罗兹英治公司越过莱茵河做准备，并且负责办理必要的公文。

罗兹英治公司的这位雇员总是尽力为海关人员的工作提供方便，有时还替他们干些繁重的活计。他常与海关人员在边境附近的酒吧间里喝上几杯啤酒，在付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不要他们破费。遇到麻烦或行政方面的

拖沓现象时，从没有人见过他因不耐烦而红过脸。他常利用到瑞士和德国出差的机会帮别人办一些琐碎的杂事。如果说真有某个特务曾是以认真的态度为自己的工作铺平道路的活，此人就是汉斯·施特雷克尔这个柏林人。

温特图尔市来的两个人在 12 点以前将 50 公斤的文件卸在仓库里。其后，施特雷克尔立即奔向仓库，把图纸装上他那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的座箱，径直越过德国边界。

海关人员和负责检音护照的警察对他的汽车和 SAK·W702 的牌照非常熟悉，他们都一个个满面笑容，快活地和他打招呼。

过一两天他必定返回，回来后少不了要请一次客……一踏上德国土地，施特雷克尔立刻加快了速度，穿过黑森林直奔斯图加特。就在快到斯图加特城的时候，他离开了高速公路，驾车向一个小飞机场驶去。几分钟之后，这些幻影式飞机的图纸被装上飞机飞往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

在布林迪西，图纸又转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星期天早晨，图纸就被卸在以色列的国土之上了。

以色列人急不可待地盼着图纸，每当飞机降落之前，总有一辆汽车在机场跑道上等候，连发动机都不熄火，以便尽快地将这些珍贵的图纸送到以色列航空公司兴奋的技术人员的手里。

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克内希特的第一批货于 1968 年 10 月 5 日到达以色列。就这样，图纸一批接一批地运到了以色列，就像瑞士钟表一样准确。从事情开始到大功告成，瑞士工程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3. 合作者的凄凉

在送出最后一批幻影式飞机的图纸后，工程师喝着白兰地酒，聊着天，暗自庆幸自己的成功。但他不知道，恰恰就在这一时刻，施特雷克尔在把图纸装上他的汽车时被当场发现了。

事情是这样的，这家运输公司的两位董事卡尔·罗兹英治和汉斯·罗兹英治得到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的警报。每星期六，当这位过路人领着他的狗散步时，总看见一辆私人汽车停在仓库旁，一位外国人将一些纸板箱装上汽车，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奇怪。

罗兹英治一家决定亲自解开这个谜。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是施特雷克尔，他正慌忙不迭地装车，然后，驾车全速开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雇主被激怒了，于是便仔细地检查了仓库。他们找到了施雷克尔在逃跑前没来得及装上车的最后一只纸板箱，他们打开箱子一看，立刻惊呆了。箱子里装的是文件，文件上标有“绝密。瑞士军事部制”的字样。兄弟俩便急如星火地跑到附近的警察署报了案。几小时之内，瑞士全境实行了总戒严，搜捕一个叫汉斯·施特雷克尔的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架小小的赛斯纳式飞机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向南方飞去。在莱茵河的边界上，再也见不到罗兹英治公司的这位职员了。

瑞士警察很侠就查明，这是一名以色列间谍，要想再见他一面，那完全不可能了。他们经过 72 小时的侦察，最后把线索集中到了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克内希特身上。而这位工程师已经得到警报，知道了他的间谍活动的不幸结局。因为就在当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汉斯·施特雷克尔”已经和莱茵河上的海关人员永别了。但他镇定自若，毫不慌张。

翌日，他甚至去苏黎世附近的杜邦多夫军用机场，会见了高级军事官员，

共同探讨了空军在今后的需要的问题。弗劳恩克内希特的意见被认为有极大的价值，并受到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

而就在这个时刻，在同一机场上，包括一名瑞士反间谍军官在内的五人小组正等待着他，准备将他逮捕起来。

一进牢房，弗劳恩克内希特就讲开了价钱。只要瑞士当局接受了他的条件，他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幻影式飞机图纸的事。否则的话法国政府必将挑起严重的政治危机。

瑞士当局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1971年4月23日，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克内希特以工业间谍罪和触犯瑞士军事秘密被判处劳役4年零6个月。在和瑞士当局打交道时，弗劳恩克内希特胜利了。

当他出狱的时候，一位以色列公民以私人身份邀请弗劳恩克内希特夫妇首次访问以色列。

图8 法制幻影式飞机

图9 以色列幼狮飞机

出于某种幸运的“巧合”，就在以色列自己“设计”制造的“幼狮”式飞机，也就是联邦德国外交官不无讽刺地称之为“幻影之子”的那种飞机公开表演的前一天，瑞士工程师到了特拉维夫。

在利达机场，他并没有受到人们感恩戴德地用红地毯和鲜花的热烈欢迎。相反，以色列的部长们存心不理睬他的到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以色列官方人士拒不向他表示任何谢意。

耶路撒冷政府连他去以色列的飞机票都没有给他买。人们私下向他解释说，莫萨德或其他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绝对不可能正式承认弗劳恩克内希特在幼狮式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只是一位热心的特拉维夫旅馆老板为他付了旅费。

今天，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克内希特生活在瑞士一个小村庄简陋的房子里，成了一个心灰意懒的人。他的生活很艰难，连工作也找不到。他正在忍受一个犯了不可宽宥的错误的特工人员所遭受的孤独的折磨。这个错误就是暴露了自己。

(五) 铅块行动

1. 以色列急需铀

以色列早在 1956 年就开始动脑筋造原子弹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古里安，通过多方努力和法国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法国 1958 年派人协助以色列，在南部内佳海岸迪莫拉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当时以色列只有 7 个人知道这个最高机密。一般人只听说这儿正在建设一个纺织厂，但却有重兵守卫，上空也列为禁航区，都感到莫名其妙。

1967 年，以色列研制原子弹成功在望。然而就在这一年爆发了“六·五”战争(又称“六天战争”)，法国怕得罪阿拉伯国家，突然宣布停止向以色列供应铀，这一着几乎使以色列自制原子弹的企图功亏一篑。

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制造原子弹，必要时即使偷也得偷一些铀作原料。莫萨德头目亚里夫立即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棘手的任务，设法弄到铀，以保证制造原子弹的需要。这个任务被列为最高机密，它的执行计划被命名为“铅块行动”。

2. “铅块”到手

莫萨德人员打听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SGM 公司拥有大量由刚果运来的铀，储藏在安特卫普港附近一个地下仓库里。他们起先想找到一个贸易伙伴，暗地买下这些铀。莫萨德工作人员——27 岁的阿伯尔想到了一个名叫舒诚的联邦德国商人。阿伯尔在 1964 年与他结识，此人神通广大，与人合股经营着一家去除化学毒素与放射性元素的色料公司。这个公司的顾客除美国军人外，还有联邦德国的军人。

特拉维夫的塔尔火柴工厂总经理沙哈洛夫，真实身份是莫萨德的上校，受命和舒诚联络，并表示对他的公司经营的颜色料有兴趣。

48 岁的舒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因飞机失事头部受伤，常常头疼。沙哈洛夫获悉后，即邀请他去以色列休养。地中海温和的气候，对他的连康大有助益，同时，他与莫萨德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了。

1968 年 3 月 21 日，舒诚以他的公司的名义向布鲁塞尔 SGM 公司订购 200 吨铀。他的信中说，他的公司大量生产石化产品，需要铀作催化剂。信上还说，必须将铀先运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与他有业务来往的公司加工处理，然后再运回来使用。这封信是按莫萨德的计划办的。他们准备把这些贵重的铀先运到公海，再转运到以色列。

SGM 公司对这封信持审慎态度，他们先派人查舒诚公司的性质及其可靠程度。查证结果令人满意，舒诚的公司已把 850 万马克存入瑞士银行，准备付款。

SGM 公司特派副经理德维克去联邦德国与舒诚晤面。德维克对舒诚说，此行并非因为对他的公司有什么怀疑，而是为了慎重和礼貌。他还说，在欧洲共同市场内，所有的铀均受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管制，如果把铀运到摩洛哥去，须先取得该委员会的特别许可证，但摩洛哥不是欧洲共同市场成员，此路暂时不通。

一计不成，莫萨德只好再找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商业客户。不久他们找到了设在意大利米兰的塞加色料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闻知他的老友舒诚邀他去做铀加工生意时，深感意外，因为他从来未曾做过与铀有关的任何生意，

可是当他接到舒诚预付的4万马克订金时，他动心了，因为他的公司景况不佳，正需要周转的资金，因此就答应下来。如今，莫萨德只要再找到一艘悬挂着不相当于国家国旗的船只，把铀由安特卫普经热那亚运到米兰就行。

利比亚的比斯加尼轮船公司董事长亚特也是莫萨德特工。他委托土耳其人西利沙去找船只。西利沙于1968年8月11日在汉堡找到了起先对偷运事件一点不知情的莫勒。9月27日以120万马克租金，租了一艘长78米、重约1000吨的“雪尔211”号。莫勒受莫萨德之托雇用了35岁的巴洛夫作船长。10月9日，“雪尔211”号试航至拿波里。如今万事俱备，只欠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运铀许可证了。

欧原会承办这项运铀申请事宜的是学法律的欧普西。他对原子科技一窍不通，便去请教SGM公司副总经理德维克，问铀是否能作催化剂，德维克答称可以，并说荷兰政府已批准用铀作催化剂。

10月30日，欧原会发给许可证，“铅块行动”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11月15日，舒诚亲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监督200吨铀装船。这些铀分装在560个铅桶内，桶外漆上“铅块”字样。从下午两点开始，直到晚上才装完。一小时后，该船已航行在海上，驶向热那亚。11月24日该船理应进入地中海，并自巴利阿里群岛向东北航行，但它却朝正东方驶去。11月29日深夜，这艘船按莫萨德的计划，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公海上，与已停泊在那里的一艘以色列油轮靠在一起，四小时后这些铀已被转装到以色列油轮上。油轮把这些铀运到以色列的海法港之后，又转运到以色列原子中心迪莫拉。

12月2日，土耳其港务人员在土耳其某港口附近海面发现了“雪尔211”号，但它已空空如也，它的航海日志上也没有最后一星期的航海记录，船长巴洛夫早已把它撕掉，塞加公司因协助装运这些铀，从舒诚的公司那里得到了1.4万马克赏金。

7个月后，欧原会的官员仍未收到塞加公司运走铀的证明，才发觉200吨铀失踪了。但欧原会也无能为力。几个月后，欧原会的安全主任等赴联邦德国调查，舒诚答称：因受某客户委托，已把这些铀转售出去了，至于客户姓名，基于商业秘密，不能奉告。

1970年，以色列内阁宣布：“铅块行动”已告成功。

(六)偷“机”贼偷了“响尾蛇”

这是一次空前大胆又高度喜剧化的行动，克格勃间谍竟然偷了一枚导弹，把它伪装成一卷地毯，开车跑遍德国！

1. 奇妙的结合

这次行动是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为首者曼弗列德·兰明格，德国建筑师，30多岁，是个花花公子。在遇见一个叫约瑟夫·林诺斯基的波兰人之前，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在纽伦堡参加汽车大赛。此后他就被介绍来过另一种危险的生活——受雇于克格勃搞间谍活动。

约瑟夫·林诺斯基出生于华沙附近，是个有经验的锁匠。1941年他被纳粹逮捕并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虽然受尽折磨，他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这段经历使他极端厌恶德国和德国人，以致当他27岁的老婆（波兰人）海伦娜要同他离婚时，他拒绝了，并告诉她：“我永远不能冒这个使你有可能跟一个德国人结婚的风险，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儿子就得叫某个德国猪爸爸。”

1951年，林诺斯基向波兰驻柏林军事代表申请到华沙探亲。他获得了批准。在华沙时他被吸收加入波兰情报机关，然后获准回到联邦德国。他始终是个低级特务，只能报告他所能搞到的一些零星的情报，换取一年几百马克的报酬。他被捕后，海伦娜曾经回想起，约瑟夫虽然常常一文不存，但是当他真的需要钱的时候，却总是有办法搞到。他还经常从国外收到大批信件。她说：“有一次我因为好奇，拆开了他的一些信，他发生后竟打了我。”

1958年，林诺斯基遇到了曼弗列德·兰明格，并对他个人生活方式颇感兴趣。这时兰明格刚同他的妻子离了婚，独自住在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的一所大房子里。林诺斯基此时也离开了他的老婆孩子，正要找地方住下。他和兰明格交上了朋友，而这位建筑师就请他搬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同性恋关系，实际上倒象是主仆关系。兰明格很乐意有人来照料那些烦人的家务事，而林诺斯基则和他一道过着变化无常的生活。为了挣几个马克来度过他的困难，林诺斯基向波兰情报机关送去了一个例行报告，讲了这个新朋友的情况。

在审讯时，兰明格说他是1967年加入克格勃的。但是其他证据表明，兰明格可能早在1963年就加入了克格勃并在莫斯科受过训。

1967年2月，兰明格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在因戈尔施塔特的一个俱乐部里玩牌的时候，他遇见了沃尔夫·戴瑟德·诺普，他是附近策尔空军基地第74“星式”战斗机中队的一名33岁的飞行员。他和兰明格一样，总在追求更有趣、更刺激的生活。他们不久就成了至交。当诺普抱怨说他在本地骑马俱乐部中没有被选为书记时，兰明格就建立了一个唱对台戏的俱乐部，让诺普当主席。他们见面时诺普常常嘲笑策尔空军基地的保卫工作做得太差，他告诉兰明格：“任何一天晚上，你都可以走进去，偷走一架‘星式’战斗机。”这个有趣的情报被直接送到莫斯科。

2. 克格勃下令偷“鬼怪”

除了开快车和骑马之外，诺普最主要的兴趣是女人。兰明格从莫斯科得到命令，要尽量使他的朋友得到满足。他收到一笔基金，用来在纽伦堡给诺普租了三套奢华的公寓，后来这个飞行员曾向他的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的

寻欢作乐场所”。这是另一种性谍报方式。诺普用不着别人帮助就能找到并勾引各种漂亮姑娘。别人用不着对他进行讹诈或设什么圈套，只要能提供刺激并使他保持奢华的生活水平就行了。同兰明格和林诺斯基在任何计划中进行合作，对这位飞行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1967年春，对诺普进行第一次考验的时机来到了。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力气和金钱，兰明格要看看结果如何。

诺普搞到一套通行证，使林诺斯基可以进入策尔基地。这个波兰人利用其开锁的技巧进入了一个绝密库房，设法偷得了一个利顿 LM 型导航仪。据说这是西方同类仪器中最复杂的一种，这个仪器后被藏在一批超短裙货物中偷运到莫斯科。此后的一次冒险则是从汉诺威的一次工业展览会上偷走了一个价值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惯性制导寻航仪。这再一次表明诺普的人事关系和林诺斯基在撬锁方面的技巧，二者配合起来是多么完美。

从这以后，克格勃充分相信这个小组可以获得一个空前的胜利——偷一架完整的“鬼怪式”飞机。策尔空军基地已订购了 80 架这种飞机，几个月之内就要运到。莫斯科通知兰明格要隐蔽待命。可是诺普却建议偷另一种很容易偷到的武器，而且他相信这并不会妨碍偷飞机的事。于是兰明格便擅自同意并决定偷一枚“响尾蛇” AIM-9E 式空对空导弹。

3. 三人小组巧偷“响尾蛇”

“响尾蛇”导弹最早是 1956 年开始在部队使用的。到 1962 年美国停止生产时为止，已经造出了 6 万枚这种固体燃料导弹。此后在 60 年代，由一个欧洲财团继续生产。

当舆论界得知这起盗窃事件的消息后，西方情报机关曾向国际新闻界透露了一系列情节，说由于这批导弹早已大批生产，以致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军火商手里买到，所以这次盗窃是一起对俄国人毫无价值的、愚蠢的抢劫。但是他们却避而不谈 AIM-9E 式导弹是装有一台极精密的秘密追踪仪器的，这种仪器大大提高了它的低空性能。对前苏联有价值的正是这个制导系统，而不是那个又笨又大的导弹本身。兰明格由于缺乏把这个制导系统从导弹上卸下来的必要的专门技能，便决定把整个 2 米多长、70 多公斤重的导弹弄走。诺普先对贮存库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然后告诉林诺斯基有关那些锁的详情。在研究了 this 航空站的保安措施后，这个飞行员认为 10 月 7 日是最合适的日子。在这个基地里，老鼠十分猖獗，司令下令当晚要下毒饵杀老鼠，因此，所有养狗的住户都接到了指示，要他们届时把狗关起来。这个意外的幸运事件排除了偷窃行动的最后一个严重障碍。

诺普给了林诺斯基一个通行证以便进入基地，他进去了以后，诺普又把他藏了起来直到天黑。在开始偷窃前几小时，诺普走到基地环形栅栏边的一个选定的地方，把铁丝网剪开了一大段，然后把它松松地装回去，如果不注意检查就看不出来。午夜之后不久，他把那个波兰人从隐藏地点接出来，然后一起来到导弹库。林诺斯基很容易地打开了几道锁。他们也没费多少劲就把一枚导弹从安置架上卸下来并把它放上一个双轮手推车，推出了库房。然后他们又把几道门关好并重新锁上。

他们把导弹从环形栅栏中抬了出来，抬到附近的一条胡同里。

兰明格正在诺普的马塞拉蒂牌跑车旁等着他们。导弹太长了，他们把跑车的后窗打破才把它整个装进车里去。为了把导弹的尖弹头盖起来，诺普从

箱千里找了一块旧地毯，把它裹在这个直径 15 厘米的导弹上，然后他们开车跑了 300 多公里，横穿德国来到克雷费尔德的一所公寓，这是兰明格为了这次行动而预先租下的。他们在这里把导弹从车上卸下，然后设法把它分成两部分，用木板箱装好，贴上了“商业样品”的标签。当诺普长途跋涉回策尔基地去的时候，兰明格就开车来到杜塞尔多夫机场，把这两个木箱经哥本哈根寄往莫斯科。

当他的木箱平安装上飞机之后，曼弗列德·兰明格也飞往莫斯科。然而当他几小时后在莫斯科降落时，他却大吃一惊，木箱和“响尾蛇”都不见了。他立即飞回德国，去察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杜塞尔多夫他发现后来木箱又从哥本哈根运了回去，因为货运单据上有一处弄错了。机场上的人很客气地请他把漏写的一些详情填好。于是木箱顺利地来到了莫斯科。兰明格和他的同伙得到了近 3.4 万美元的报酬。

兰明格的间谍网由于本身缺乏安全保障而被毁坏了。一个空军外科医生的妻子让他的丈夫到后花园去拣野芹菜，他沿着基地周围的栅栏漫步，发现了铁丝网上被剪断的地方。经过迅速的调查，发现了导弹被盗。线索直指诺普，从诺普又找到了林诺斯基和兰明格，他们遭到逮捕和审讯，并判为犯了间谍罪。林诺斯基被判 4 年徒刑，诺普 3 年，兰明格由于是他们的头，被怀疑是个克格勃的职业特务，判了 7 年徒刑。但他只服了部分刑期。如果说俄国人对兰明格很不高兴，是因为他擅自偷了一枚“响尾蛇”导弹而使他们失掉一架很可能到手的“鬼怪式”飞机的，但他们显然也并不十分抱怨他。1971 年 8 月，在一次最大的间谍交换中，大约 20 名民主德国特务同 6 名因政治罪而被判长期徒刑的联邦德国人相交换。在交换名单上的头几名中就有这位建筑师曼弗列德·兰明格。

(七)核引信与原子炮弹

1. 美英合伙设“毒刺”，伊拉克间谍上当

1990年3月28日早晨，伦敦希思罗机场上的一架伊拉克航空公司的班机还有半小时就要起飞了。一名大约50岁的男人匆匆忙忙地走向检票口，准备登上这架飞往巴格达的班机。

突然，几名英国警察出现在他的面前，不由分说把他带出了机场。在检票口，英国警察还逮捕了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一个中年法国妇女，另一人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雇员。与此同时，伊拉克航空公司驻伦敦办事处以及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家名叫欧洲生产商中心的有限公司也遭到英国警察的突然袭击和搜查，又有2人被逮捕。

当天中午，英国电视台迅速报道英国政府人士的话说，伦敦警察厅在英国和美国的海关官员的配合下，挫败了一起企图把一批用于核武器引爆装置的电子部件偷运到伊拉克的阴谋，有5名涉嫌者被逮捕，同时从准备搬运到伊拉克班机上的货箱内搜出了40个引爆核武器所需要的电子部件，价值1万多美元。

消息一传出，立即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西方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进行了大量报道和宣传；一些政界人士、军事专家、观察家纷纷发表谈话。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答议会的提问时说，把核引爆装置的部件偷运到伊拉克的企图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发表谈话说，这个事件“再次引起美国政府对中东核扩散问题深为担忧”。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宣传说，虽然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在1981年遭到以色列飞机的轰炸，但是它现在已经开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材料，他们显然需要美国制造的核引爆装置部件。伦敦的一位大学教授发表谈话说：“如果他们正在设法偷运这些高度尖端的引爆装置，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制造核武器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很快就会制造出来。”

伊拉克政府坚决否认它卷入了偷运核引爆装置部件的事件。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是英国政府、新闻界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掀起的一场反对伊拉克的运动，这场运动是试图为以色列侵略伊拉克提供借口。伊拉克驻巴黎的外交官还指出，这个事件是美国和英国蓄谋制造的一个陷阱。

就在3月28日当天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电视中披露，所谓挫败伊拉克偷运核引爆装置的阴谋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精心设下的一个陷阱，美英两国在18个月前就开始策划这一事件，他们把这项行动称之为“毒刺”行动。

美国司法机构29日公布了一份材料，详细透露了“毒刺”行动的细节。

1989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生产核武器引爆装置的公司向美国海关当局报告，英国一家公司想购买核引爆装置电子部件。美国决定让海关当局派遣一名侦探，伪装成这家工厂的管理人员，同英国这家名叫欧洲生产商中心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阿里·达吉尔取得了联系。

在贸易谈判过程中，美国侦探发现49岁的达吉尔是一个拥有伊拉克和英国双重国籍的伊拉克人。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伊拉克官方派出的采购机构，在两伊战争期间，它为伊拉克政府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物资。达吉尔有一名助手，就是那个在机场被逮捕的法国妇女、41岁的让南娜·施佩克曼，她也居住在伦敦，丈夫是英国人。

根据“毒刺”行动计划，美国这位海关侦探不仅与达吉尔等人建立了密

切的关系，还数次飞往巴格达，商讨如何把 40 个核引爆装置部件通过英国运回伊拉克。

与此同时，美国有关当局要求马萨诸塞州的另一家生产核引爆装置的工厂伪造 40 个表面相同的部件。这家工厂的总经理说，几个月前，他们把这 40 个伪造部件交给了美国海关，但是他们不知道干什么用，也不知道把它们运到了什么地方。

1990 年 3 月中旬，美国这位海关侦探得到达吉尔的指示，要他把 40 个核引爆装置部件作为空调设备部件空运到伦敦希思罗机场。3 月 24 日，这批真部件由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从洛杉矶运到了希思罗机场后，很快被英国海关人员调包，用原先准备好的伪造品替换了真品。真品交还给了美国驻伦敦的代理机构，3 月 28 日准备由伊拉克航空公司的班机运回巴格达的那批电子部件是毫无用处的伪造品。

3 月 29 日，英国法庭以非法出口限制设备罪对达吉尔、施佩克曼以及一位黎巴嫩工程师、37 岁的陶菲克·阿姆尤尼提出起诉，将被同时逮捕的伊拉克航空公司雇员奥马尔·拉蒂夫驱逐出境，另一名被捕的持有英国护照的塞浦路斯人经审问后释放。

美英蓄谋制造的这起偷运核引爆装置部件的事件使已经处于紧张状况的伊拉克和英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

2. 想占便宜吃了亏，原子炮弹是假的

A 国的一名少校走进 R 国驻联邦德国的某个观察使团，声称要出卖一枚原子炮弹。为了表示诚意，他无偿地交出原子武器仓库详图、检测程序说明书和原子武器设施的操作规程。文件本身的价值很大，而少校提出的重要建议更吸引人。他声称为此要索取一大笔钱，还要求对方把炮弹拿去研究两个月之后将原物归还。

过了几天，R 国情报部门的专家证实所获文件是真品，情报价值甚大，并决走买下这枚原子炮弹。

一星期后，一个漆黑的雨夜，在一片森林空地上，两辆摩托车相遇在一起。一辆是那个 A 国少校，另一辆是三名 R 国作战军官。附近隐藏着两辆 R 国的摩托车，万一出事就会冲出来。那天晚上好多人彻夜不眠。R 国领事守着电话机打盹，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出事他就会向那片森林地飞奔而去，并以外交官的名义出面保护这些军职外交人员。同时，根据上级的命令，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和通讯社也处于戒备状态。他们当然不知内情，但声明早就拟好。必要时就向全世界宣布，帝国主义者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挑衅。

这时那个 A 国少校和三个 R 国人已把炮弹从一辆车子搬到另一辆车上去，并作了彻底的核查。R 国作战官员们事先已知真炮弹应有的编号、辐射强度、净重和相应的标记。这些全部核实无误之后，才把一只塞满了钞票的公事包交给了 A 国少校，并向他保证两个月之后定将原物交还。

只要炮弹装进了有外交牌照的车辆，就等于到了自己国家的领土，当地警察可以把车辆拦截下来，但却无权检查，也不能从车内拿走任何东西。外交豁免权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呀！一路上平安无事，无人阻拦，车子顺顺当地开进了 R 国外交使团的庭院里。随后把炮弹装在外交货箱里运到了 R 国。

为防这枚炮弹里设置定时装置，这枚炮弹就被暂时拉到一个机场，再由一架军用运输机迅速运往偏僻的海岛。炮弹没有爆炸，但不能保证它在分解

时不爆炸，那就会把那些正在从事分解操作的第一流专家炸得无影无踪，因此又在这原子试验基地匆匆搭起一座特制帐篷。分解准备工作就使专家们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因为炮弹的原子辐射量比它应有的量大得多。经过漫长的争论和协商，他们终于小心翼翼地把炮弹分解开来了。直到这时候才发现它根本不是什么原子炮弹，只不过是一枚外表实观的教练弹而已！

事后那些参与行动的间谍们当然领不到勋章，可也没遭惩罚。

但是 R 国的间谍们对此耿耿于怀，不肯罢休，一心要查找那个 A 国少校。找了一番，毫无踪迹。此人于废品脱手之后就被调回国就任新职去了。

三、无孔不入的科技间谍

(一)代号“费韦尔”

1. 克格勃里的“鼯鼠”

1984年10月，联邦德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预测部总工程师、60岁的曼弗雷德·罗奇被反间谍机构逮捕。17年来，他一直在为克格勃服务，使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他所在企业的机密材料和计划。

曼弗雷德·罗奇是继1974年4月勃兰特总理的顾问纪尧姆被捕之后联邦德国发现的最大的间谍。1983年春，法国领土监护局通知波恩，在梅塞施米特公司里潜伏着一只相当高级的“鼯鼠”。经过18个月的调查，终于使这位总工程师现了原形。就这样，法国曹方为他们的德国同行帮了大忙，他们使用的是“费韦尔”材料。

1985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发表关于前苏联获得西方军工技术问题的报告。他当天指出：“每年苏联有5000多个军事项目极大地受益于从西方获取的工艺技术。”温伯格明确指出：“我们只是就苏联最近非法窃取的工艺技术作了一个估计。”

少数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又归功于“费韦尔”材料。

人们看到，从那时起以后的5年内，由于“费韦尔”材料的披露，东西方关系、更确切地说西方国家与前苏联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反前苏联间谍斗争史上，“费韦尔”是一个里程碑。

1981年春的一天，一位法国籍的男子在索塞街11号(当时的反间谍局所在地)投了两封信。这位法国人在第一封信里写道，一位“苏联朋友”两年前在莫斯科交给他一封信，要他转交给领土监护局。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由于怕被逮捕和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把这封信带出前苏联。虽然不了解他的朋友的确切工作，但他知道他的朋友属于前苏联国家机关的上层人物。

第二封信就是那位“苏联朋友”的信。这封信也是用法文写的。写信人没有说明自己的确切职业。他声称60年代曾在前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任过职，并表示随时准备为法国服务。这位前苏联人对他这样做的原因未作丝毫解释。根据前苏联的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可以送他上刑场。信的末尾署着他的姓名。

他是不是一名破坏分子？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人们立即查阅了情报部门的档案，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自我介绍，60年代他确实在巴黎任过外交职务。在领土监护局的卡片上，当时对他的评论是：曾经与这个人接触过，他已表现出某些亲法的情绪。但是在他开始行动之前他已被召回莫斯科。

事情过去了将近15年，这位前苏联人此时却来向法国反间谍机构问好，而且是主动地问好。这真是大好了，好得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如果是一次破坏行动的话，那么领土监护局就很可能被引到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这是前苏联人特别喜欢使用的使西方情报机构瘫痪的手段。

领土监护局的两位领导成员亲自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们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并给这一行动起了个代号，叫“费韦尔”。但是，在开始时并不知

道他们正在前苏联情报机构心脏里从事最重大的渗透活动。

反间谍人员同转交莫斯科来信的那位法国人进行了接触，要求他充当介绍人。这位法国人接受了这一要求，尽管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几周后，他从前苏联回来了，带着第一批情报。

这时，而且只有到这个时候领土监护局的领导才真正认识到“费韦尔”的重大意义。不能再让一位业余人员去传递信息了。应由一位高级专业人员在莫斯科处理这件事。

“费韦尔”是克格勃第一总局 T 处的高级军官，当时在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工作。“费韦尔”能接触到 T 处主管的所有科技间谍材料。他不但了解前苏联科技间谍的整个活动情况，而且还熟悉从事科技间谍活动的所有军官（在莫斯科的军官和在世界各地的常驻军官）。尤为重要的是，他知道为前苏联人效劳的西方情报人员的姓名。

了解这类绝密材料的军官，在前苏联是严格禁止出国的，而且还被严密监视着，以防泄漏情报，因为万一出事，将会带来惨重的损失。既然“费韦尔”不能离开前苏联领土，那么法国人就得到莫斯科去找他。这一行动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但法国情报人员还是迎着风险上。

在 1981 年春至 1982 年秋这 18 个月内，“费韦尔”向法国领土监护局提供了近 4000 份绝密材料。这些绝密材料都是西方在此以前从未弄到过的。他提供的情报质量很高，使他成了迄今为止西方情报机构在前苏联间谍机构内部培养的最重要的“鼯鼠”。

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费韦尔”从未向法国领土监护局提出过什么要求以作为对他提供的情报的回报。他只希望一旦他能离开前苏联，法国能使他过上象样的生活。至于他的动机，在与他进行的屈指可数的秘密会晤中，他没有正式谈过。是由于怀念法国吗？从巴黎离任回到前苏联后，他曾多次申请出国工作，但均未获准。后来，当他进入克格勃的上层以后，离开前苏联的希望便彻底破灭了。与此同时，他开始认识到克格勃在西方、包括在他十分依恋的法国进行的颠覆活动规模巨大。

于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对他的国家的政治抉择产生了怀疑。

选择有时是痛苦的：是继续为他日益厌恶的事业工作呢，还是投靠到另一个阵营里去？他选择了第二条路，也是一条最艰难的路。

“费韦尔”必须具有非常顽强的精神。每一位职业情报人员都说，当“鼯鼠”在精神上是难以忍受的，要玩弄两面手法，沉着地对付一切考验，才能不使情报机构产生怀疑。而且，“费韦尔”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费韦尔”在其生前从未被克格勃发现过。但是，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领土监护局突然失去了有关他的消息。当时，领土监护局没有马上对此感到不安。考虑到安全问题，领土监护局规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完全由“费韦尔”决定。

1983 年初，法国反间谍机构确信，“费韦尔”已销声匿迹。“费韦尔”的消失与他的行动毫无联系。领土监护局没有任何失误，克格勃也没有察觉他的“背叛”。“费韦尔”很可能是由于某个荒唐的原因而失踪的。

在 1982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莫斯科流传着一种奇怪的说法，说有一位克格勃的高级军官因犯杀人罪而被判了刑。有人说，这位军官是在执行任务期间干了伤风败俗的事，几天后，一名警察要揭发这件“丑闻”，他便将这名

警察杀死了。

这一传说没有透露出任何姓名。但法国反间谍机构根据“费韦尔”的失踪和那件丑闻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这一点推断出，这位高级军官就是“费韦尔”。

2. 间谍部署大揭秘

要说“费韦尔”到底为西方提供了什么，他为西方提供了“苏联在科技战线上的兵力部署”。这一军事术语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前苏联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以通过间谍和掠夺手段来获得它自己不能生产的一切。这一“战斗部署”的内容包括：

(1)有关科技战线上所有组织的完整而详细的名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2)每年在军事工业的各个领域借助非法获得的外国技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的情况。这些用典型的官僚主义笔调写成的，令人惊愕的总结首次使人们估量到，前苏联进行的掠夺规模巨大，手段极多；

(3)克格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官的名单以及为从事科技间谍活动的“X战线”的人员名单；

(4)“X战线”的军官在美、法和联邦德国等十几个西方国家里收买的主要情报人员的身份。

“费韦尔”获得的这些情报来源可靠。他提供的材料上都有“绝密”字样。这些材料的影印件都有编号。“费韦尔”提供的那些影印件编号是“一”。因此，它们来源于T处领导办公室。许多材料上还有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的亲笔批注和签字。有一份材料上甚至还有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的亲笔批示。

因此，“费韦尔”提供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搞情报和偷窃活动在前苏联是由最高级机关指挥和掌握的。

“费韦尔”材料使人们首次了解了前苏联在西方国家从事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规模。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前苏联人建立了一个以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为核心的庞大机构。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是一个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机构。该委员会1985年11月起由尤里·马斯柳科夫担任主席，其使命是：

——综合12个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部的要求；

——根据这些要求制订每年的情报搜集计划；

——将这一计划发给每个情报搜集机构(克格勃、情报总局以及各个东方国家的情报部门等等)；

——搜集整理上述情报机构在当年通过偷窃和间谍等手段获得的情报；

——总结这样做在科研和生产中节约的钱财数额。

在外贸方面也是如此。从西方获得的一点一滴工艺技术都经过系统的改造，为军事服务。因此，前苏联的所有贸易活动都首先为提高其战争能力服务。

最后，在间谍这个特殊领域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在间谍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表明，军方在获得科技情报方面拥有完全的优先权。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如“费韦尔”提供的材料所说明的那样，前苏联

军事工业委员会每年的情报工作计划制订得非常精确细致。每项需要都附有技术性能、系列号码、公司名字以及在何处可获得某部所需材料等等说明。这些详细说明是根据事先系统地、大规模地搜集来的必需的情报而写出来的。

这些“积累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克格勃、情报总局、科技人员和前苏联的商务代表通过往往是合法的手段获取的公开资料(广告、商品说明书、货样等等)。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在这些情报搜集机构每年搜集的 10 万份材料中,有 90%不是机密材料。

例如,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每年收到 150 万份西方科技杂志,并对每份杂志进行精心研究。在这些杂志中,美国的《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似乎颇受前苏联军人的赏识。

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还参加各种展销会,因为在那里能搞到各个领域里的技术情报。每年有近 3500 名前苏联人被派往国外(其中 2000 人被派往美国),他们名义上的使命是促进科技交流,而实际上是搞情报。

据“费韦尔”材料中一份来自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材料说,在 1979 年至 1981 年这 3 年里,前苏联人参加了 35 次国际科技会议,其唯一的都是搜集对他们的军事工业有用的情报。许多与会者就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军官。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在其总结中指出,他们搜集的情报使苏节省约了数百万卢布的研究费用,相当于 100 名科技人员 3 年的研究成果。

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对能够为前苏联军事工业提供情报和材料的西方企业进行统计和分类。其分类标准是该企业的生产能为苏军提供的好处。

分布在 30 来个国家的 300 多家企业负责向前苏联输送西方的工艺技术。有些公司本身就是由克格勃、情报总局或前苏联其他情报机构开办的。其余大多数公司是唯利是图的西方人开办的。莫斯科毫不犹豫地以高出市价 50% 的价格向他们购买功能先进的计算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手段是依靠一些情报人员。“费韦尔”的一大功劳是提供了前苏联在十来个国家里的情报人员名单,从而使西方各国的反间谍机构发现了大部分前苏联情报人员。

1983 年底在法国被捕的皮埃尔·布尔迪奥勒和在西德被捕的曼弗雷德·罗奇就是两国反间谍机构根据“费韦尔”材料提供的线索发现的。依靠“费韦尔”的情报,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两位受波兰情报机构指使、为前苏联人效劳的英国人的线索,他们是威廉·贝尔和詹姆斯·哈琅。贝尔接触到了雷达系统、空对空导弹和地对空导弹领域的最先进的研究工作。从 1978 年起,到 1981 年他被捕那天为止,他使前苏节省约了数千万卢布,并使苏联在上述领域里缩短了 3 年研究时间。哈琅给西方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位电子学工程师在 1971 年至 1981 年为前苏联提供了数十份有关洲际弹道导弹研究工作的绝密材料。

南非海军高级军官迪特尔·格哈特在 1964 年至 1983 年间为前苏联情报总局提供了有关西方防空导弹的情报。他也是由于“费韦尔”材料而被逮住的。

目前,还有大量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被“费韦尔”揭发的每个人都已经或正在受到西方反间谍机构的严密监视,以准确无误地证实他们的背叛行径。这类调查需要大量时间,这特别是因为自从“费韦尔”1982 年底销声匿迹以后,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停止了許多间谍网的活动。也许得过 5 年、甚

至 10 年才能结束这些调查。

然而，还应指出，在他提供的名单上有 3 位美国国会议员和 1 位联邦德国议员。

3. 科技间谍战果辉煌

亨利·勒尼亚尔在一篇关于前苏联科技情报活动的文章结尾部分写道：“苏联人善于通过系统地搜索西方各个高级工艺技术领域来获得自由世界防务领域中的某些关键性的或者潜在关键性的情报。这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对东方占有的优势和我们的安全。”

勒尼亚尔的话是有所指的，其实他就是法国反间谍机构里从头到尾处理“费韦尔”材料的那两个高级军官之一。勒尼亚尔是他的化名。

亨利·勒尼亚尔指出，当法国将此事件通报西方国家领导人时，他们都感到万分不安。

自从 7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从西方获得了 3 万件先进器材和 40 万份材料。由“费韦尔”提供的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说明，在与军事工业有直接联系的 12 个部中，从中获益最多的有两个部，它们是：国防部和航空部。仅这两个部所获得的西方工艺技术就使莫斯科在 1976 年至 1980 年节约了 65 亿法郎，相当于 10 万名研究人员每年的研究成果。在第 11 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前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增加了 15%。

在武器生产方面，前苏联进行了系统的窃取情报的工作，正如下述典型实例所证明的那样：

- 前苏联的“海盜旗”式轰炸机是美国空军的 B-1B 轰炸机的仿制品；
- 现在威胁着欧洲的 SS-20 导弹的一半以上的工艺技术是从西方获得的，尤其是制导系统；
- 前苏联的洲际导弹核弹头保护装置是在美国的保护宇宙飞船返回大气层方面的研究基础上研制成功的；
- 前苏联在攻击性卫星和激光武器方面的所有试验都直接受启发于西方的材料和研究成果；
- 前苏联新式潜水鱼雷是在美国的 MK-48 式潜水鱼雷基础上研制的。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其实，前苏联的所有武器都是不同程度地利用“进口”工艺技术制造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领导人早就猜到了，“费韦尔”只不过是提供了具体事例，迫使他们意识到这种系统的掠夺技术情报所包含的危险性而已。因为，如果前苏联借鉴这种或那种技术来加强自己的军事潜力，这就意味着，前苏联总参谋部对大部分西方武器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于是，苏军就拥有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费韦尔”提供的情况已迫使美国人改变其巡航导弹的制导数据，因为前苏联人在几年以前就已知道了那些数据。另外，配备有高级发射雷达控制系统的美国 F-18 型战斗机现在已是容易遭到攻击的飞机了，因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已窃取了关于这种雷达系统的技术情报，前苏联空军已采取了改变美国这种飞机的射击准确性的反措施。美国军队和北约军队使用的“陶”式反坦克导弹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因为苏军已洞悉这种导弹的全部技术，已能干扰这种导弹的制导系统。根据“费韦尔”提供的情况，美国计算了一下前

苏联间谍活动给美国军队造成的资金损失。计算结果表明,这一损失数达 200 亿美元。这相当于华盛顿现在为弥补前苏联仅靠西方技术转让使军火工业取得的进展而必须投入的资金数额,相当于法国的军事预算数额。亨利·勒尼亚尔明确指出,关于以前人们对前苏联在军用和民用方面达到的科技水平所做的估计,现在看来必须向上修正(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

在得悉“费韦尔”提供的情况时,西方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例如里根)简直出了一身冷汗。他们现在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论据。这些论据说明,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很可能还只是一个二等国家的水平。

“费韦尔”提供的情况还表明,面对前苏联的渗透(包括在绝密情报方面的渗透),西方国家是极其脆弱的。

根据“费韦尔”透露的情况,可以进一步理解 80 年代初东西方关系恶化的原因。这一原因甚至能说明阿富汗战争、波兰局势和围绕部署欧洲导弹问题的斗争。

(二) “火神”失窃

1. 二百万法郎买来一份文件

克格勃特工仅用 200 万法郎就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一名工程师手中买到了法国核打击力量的核心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上用法文印着两个字“火神”。在法国军语中，“火神”代表最高机密。前苏联人几乎完全掌握了部署在法国核潜艇、幻影战斗机、坦克和阿尔比恩发射井内的导弹核弹头的情况。实际上，俄罗斯人今天仍掌握着法同核武器的关键机密，尤其是核弹微型化水平以及高频无线电密码引爆系统。因此，莫斯科可以干扰无线电引爆系统的通信，从而阻止核弹点火引爆。这是战后一起最惊人的间谍案。

1992 年 7 月底，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俄罗斯人为克格勃新起的名称)上校、52 岁的维克多·奥琴科叛逃，向英国情报部门供出了这起间谍案的内情。这名高级军官曾在前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内负责科技谍报工作。他向英国情报人员供出了两名最得力助手的名字：谢尔盖·季米列夫(化名塞尔日)和瓦连京·马卡罗夫(化名勒内)。他们都是克格勃(然后是对外情报局)军官，公开身份是驻巴黎大使馆秘书。塞尔日 1986 年 1 月到 1991 年 7 月在驻巴黎使馆工作，勒内的任期是 1988 年 9 月至 1992 年 7 月。他俩轮流操纵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杰出工程师、35 岁的弗朗西斯·唐佩维勒。这位核物理博士在利梅伊——布雷瓦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军事技术局中子核物理部工作，具有接触“火神”国防机密的资格。实际上，利梅伊——布雷瓦讷送出去的报告仅供共和国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阅读。

2. 流浪汉一样的核物理博士

奥琴科上校为了证实他对唐佩维勒的指控的可信性，向英国情报机关出示了法国工程师提供的文件复印件。这份文件长达 100 多页，制定日期是 1990 年 5 月 10 日。英国情报部门立刻向法国同行通报了情况。根据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若克斯的要求，内政部长保罗·基莱斯 1992 年 8 月中旬责成法国反间谍机构——领土监护局调查此案。基莱斯遇到一个令他为难的细节问题，他无权查阅这份文件，局长雅克·富尔内更无权查阅。有关人士告诉他们，这份文件提供了有关 1990 年 5 月在穆鲁罗瓦发射中子武器的所有技术情报。

法国在中子弹研究领域比俄罗斯先进 10 年。这种“干净”的原子弹可以通过核辐射消灭 3~6 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生命，但毫不损害经济和军事设施。中子弹可用多管火箭炮发射，还可以用其他工具发射。法国第 12 炮兵团装备了这种携带微型化核弹头的武器。由于唐佩维勒出卖情报，俄罗斯可能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

在领土监护局调查时，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军事技术局局长证实，这份文件是真的，唐佩维勒当天确实在利梅伊——布雷瓦讷。领土监护局决定跟踪唐佩维勒工程师。特工跟踪后发现，他们的“顾客”行为古怪，根本不像原子能委员会的“大专家”。

这个不可救药的逃票者乘地铁从不买票，从自动检票机上一跃而过。夜幕降临之后，这位核物理博士像流浪汉一样在街头翻垃圾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特工人员一度曾误认为他是反跟踪的老手。这个“间谍”驾驶一辆雷诺 205 型旧车，这辆车肮脏不堪，好像从未擦洗过。领土监护局跟踪一个月一无所获。9 月 14 日上午，局长决定拘留审讯唐佩维勒。帕特里克·卡勒瓦尔

警官刚开始审讯，唐佩维勒就招供了，承认偷印了原子能委员会军事技术局 40 多份绝密文件。由于他供认的军情非常严重，他被带到领土监护局副局长屠伊·塞居拉的办公室继续审讯。

这位古怪的科学家——间谍平静地解释说，他偷绝密文件易如反掌，就像在超级市场购物。审讯他的特工人员听得目瞪口呆。他只要向处里的秘书要文件，秘书就会从保险柜里取出他要的文件送到他面前。原子能委员会有两项规定：调阅文件必须在一本登记本上签字，最迟在当晚送还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是利梅伊——布雷瓦讷中子核物理部的，另一部分来自原子能委员会其他部门。唐佩维勒拿到文件后用办公室的复印机迅速复印，然后把复印件装入普通塑料袋带出去。原子能委员会门口没有任何检查哨。

塞居拉立刻意识到唐佩维勒不是在胡编口供。在长达 12 小时的审讯中，这位高级科学家向领土监护局二号人物和盘托出了他的生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间谍活动情况。这个冷酷无情的单身汉是预备役中尉，1987 年在奥尔赛巴黎第 11 大学通过核物理博士论文考试时年仅 30 岁。此后，他在家里，在中学和大学教数学和物理，月收入高达三四万法郎，但是从未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这丝毫不影响他顺利通过原子能委员会“火神”绝密资格的调查，他在 1988 年 12 月提出的求职申请于 1989 年 6 月获得批准。

3. 餐馆接头

自 1987 年起，唐佩维勒每周两次在家中、在奥尔赛给前苏联大使馆一名二秘上核物理课，此人是“塞尔日先生”。这也没有影响他获得“火神”资格！这名克格勃军官每个月同他的间谍接头一次。接头地点是伊夫林省的一些餐馆，每次都由这个前苏联人事先指定，然后寄一张接头餐馆的广告卡通知唐佩维勒。

接头时间是 20 点或 21 点，两人在约定的餐馆共进晚餐。每次接头都是唐佩维勒前脚刚到，塞尔日后脚就跟进餐馆，而且每次都是步行而来。克格勃军官离开餐馆时把包着 500 法郎或 200 法郎大面额钞票的牛皮纸或报纸递给唐佩维勒，从他手中接过装在塑料袋里的宝贵文件。物理学家驾驶着他那肮脏的雷诺 205 离开餐馆。他几次邀请塞尔日上车同行，但均被谢绝。最后一个细节是，每次就餐都是塞尔日讨帐，他的间谍显然非常吝啬。

塞尔日和勒内这两名前苏联军官还设计出一种紧急接头的方法。唐佩维勒每天去巴黎地铁郊区快车线车站都要从奥尔赛桥下经过，奥尔赛桥距他的公寓 1 公里。克格勃军官同他紧急接头的暗号是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撒上几片玫瑰花瓣，这就是通知他下星期二或星期四在当皮维尔的一家餐馆里接头。如果唐佩维勒要见克格勃军官，就在奥尔游泳池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下扔几块柑桔皮或菜叶。接头地点和日期不变。

这两个前苏联人还使用一种不见面转交文件的特殊方法。塞尔日给唐佩维勒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朗布依埃森林附近一根电线杆上的“死”信箱。这位法国工程师必须徒步走到电线杆前，把垃圾袋放在电线杆下，文件就藏在垃圾里。

在海湾战争期间，塞尔日严令唐佩维勒谨言慎行，告诫他提防伊拉克人，因为伊拉克人千方百计招募像他这样的高级工程师研制伊拉克原子弹。唐佩维勒借机打听他是不是为克格勃工作。这位前苏联军官断然否认，仅透露说情报是转卖给一个非共产党国家。

1992年4月，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一名克格勃上校叛逃之后，唐佩维勒接到“上司”的命令：加倍谨慎！

塞尔日不断向他索要绝密的民用或军事计划，但他未能搞到“上司”所要的全部绝密文件。克格勃军官最感兴趣的是“腓比斯”计划(法美大功率激光)、铀同位素激光分离、钚同位素激光分离等情报。唐佩维勒未能搞到这些情报，他甚至试图奉命为俄国人招募3名高级科学家，其中1人在美国费城工作。相反，他向俄国人提供了原子能委员会军事技术局电话分类表。

在高技术间谍战中，俄罗斯的间谍又赢了1分。

(三) 个体户身后的谍影

1. 他有时髦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条件，中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间谍的触角也伸向了中国。

乐晋才是个体户，专门经营服装买卖。像他这样的经营服装的个体户，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

乐晋才的服装摊，总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同行们都很羡慕他：“这小子，路子真够野的，尽弄些时髦货。”

也有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悄悄地问他：“咳，哥们，您这些玩意是从哪儿弄来的？给咱也透透。”

他只是神秘地一笑。

乐晋才的底细很多人都知道，要说海外关系，他一个也没有，要说劣迹，他倒有不少。他的父亲是一个军工厂里的中层干部。文化革命中，父亲住“牛棚”，他成了流浪街头的“野孩子”。后来他父亲平反，他被招到父亲所在的军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几年的流浪生活，使他觉得工厂的纪律是一条条的绳索，束缚着他。他开始旷工，溜门撬锁，与流氓鬼混。

他被判了3年刑。

出狱后，他摆上了个体服装摊。

有一天，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他的摊位前面。

“小伙子，你这些服装，样式陈旧，色彩也过时了。”中年男子说，他的话中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

“怎么，您要买衣服吗？我这儿有最新款式的服装。”说着，他从货架上拿出一件上衣来给他看。

中年人笑了笑：“这种款式早就过时了。”略停了片刻，“你如果想让生意兴隆，我们谈一笔买卖怎么样？”

“你？……”

“这是我的名片。”中年男子递给乐晋才一张散发着香味的名片。

只见名片上印着：

香港大明贸易公司驻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玺臣

乐晋才拿着名片端详了半晌，说：

“噢，您是孔尔巨先生，不，孔……玉臣副经理。”他认不全名片上的字。他心想：这位港商，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别扭的名字。

孔先生看到他那副尴尬的样子，并没有去纠正他读错字，只是笑了笑：

“你就叫我孔先生吧！”

“孔先生，您说的买卖……”

“我在深圳有一批服装，你把它弄来，保证你挣上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了5个手指。

“5吨？”（流行在个体户中间的黑活，意即5000元）

“不。5方。”中年人平静他说。（5方意为5万元）

“真的？！”

“当然，不信，你跟我到深圳跑一趟。”

乐晋才去了一趟深圳，弄回来一大捆衣服。这些衣服还真“叫座”，几

天工夫就销售一空了。

从此以后，他三天一趟五天一回，深圳成了他的“根据地”。那位中年男子孔先生，成了他的“后勤部长”。

2. “边角废料”的奥秘

买卖总要双方满意才行。

乐晋才对弄到的服装十分满意。

孔先生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他从他父亲的军工厂弄一些“边角废料”或是“废旧零件”什么的，带到深圳，交给孔先生，就行了。这些“边角废料”，孔先生作价收买。这对乐晋才来说，又多了一条财路。

找到这样一个货源，乐晋才喜不自禁。

不过，乐晋才多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他感觉，这个孔先生有点儿不像是个生意人，他为什么对那些“废旧零件”感兴趣呢？

“管他呢，他要的那些废料又不值几个钱，扔了也是白扔了，给他弄点又不犯法，顶多是换几个钱花花。”这样一想，他的心里又坦然了，“这个财路，打着灯笼也难找呀。”他想。

有一天，孔先生问他：

“你认识这是什么吗？”

只见孔先生在桌子上摊开了一张图，上面画的好像是房屋什么的。

“咳，我哪认识这玩意。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他很坦率他说。

“你看这像不像你过去工作过的工厂？”

他又仔细看了看，“有点像。”他说。

“这是大门，”乐晋才指着图说，“这是我过去工作过的车间，这是……”他停了停指着一处说，“这儿好像还缺少点什么，对了，这儿又新盖了一个车间。”

他又指了指图上的另一处说：“这个车间有军人站岗，这是动力车间，我还从来没进去过呢。”

就这样，乐晋才从“边角废料”到动力车间的位置，再到整个军工厂的布局，都告诉了孔先生。

“下一次，你要从这个新车间里找一些边角废料给我带来。”孔先生这样对他说。

就在乐晋才再次拿着“边角废料”交给孔先生的时候，他们被一起“请”进了国家安全机关。

乐晋才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小题大作：“如果说我没有按时交税，我补交不就完了，干啥把我抓起来。再说偷税漏税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些明星……还有……”

“不。你不是什么偷税的问题。你向间谍提供情报，向间谍出卖军工厂“的原材料。”

“根本不是原材料，那都是废料。”

“对于间谍来说，那是十分有用的材料。从你出卖的这些材料中，国外的间谍机关就可以分析出，这家工厂的产品、产量、产品的性能等等情况。”对于乐晋才这样一个无知的青年来说，国家安全人员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当乐晋才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他痛心地忏悔说：“这一心只想赚钱，什么国家的安全，根本没有考虑过。我是个有罪的人。”

孔玺臣也坦率地承认：“现在搜集大陆的情报。要比过去容易得多。对于乐晋才这样的个体户，金钱的诱惑比色情的诱惑还有力量。他们只认钱，他们并不担心那些风流韵事会损害他们的名誉，他们担心的是金钱的丧失。”

(四) “锁眼”的秘密

由于外层空间已成了前苏联和美国争夺的第四个战场，两国的情报部门都在为如何窃取对方的空间技术而绞尽脑汁。双方的间谍机关都发现，即使象间谍卫星这样的尖端技术，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作用。只有在对方的核心部位中安置间谍，才能真正窃取对方的机密。因此，为了取得在太空中的霸权，他们在地上也利用间谍进行激烈的争夺。

1968年，前苏联大型宇宙飞船5号绕月球后安全返回地球，这说明前苏联的宇宙科学技术已经领先于美国。美国为了改变其落后的局面，就四处下手，用一个两面间谍——被美国招募的前苏联宇宙开发技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搞到了5号飞船的绝密科技资料。以后又耗资10亿美元，造出了代号为“大鸟”的间谍卫星。“大鸟”间谍卫星装有地域监视和近距放大两种不同的照相设备，可以完成“普查”与“详查”两种军事侦察工作，可以识别前苏联的导弹发射场，观察地面雷达设施，监视部队调动和导弹部署等。克格勃早就想得到这种间谍卫星的资料，只是苦于无从下手。

1. 浪漫的年轻人

后来美国又制成了KH-11“锁眼”间谍卫星。这次倒没用克格勃费心，有人把KH-11卫星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的情报送给了克格勃，给美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这个出卖机密的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年轻的低级官员，名叫坎皮勒斯。这个年轻人聪明热情，外表整洁，从小就爱读间谍小说，一心想成为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可是当他将他的夙愿付诸实行时，他失败了。

坎皮勒斯案件开始于1978年。他在芝加哥市东南端长大，是希腊移民的儿子。1976年大学毕业之后谋到了一个在医院里售货的职业，后来进了中央情报局。在情报局里他发现工作非常乏味，特别是对一个想干秘密行动任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1977年，坎皮勒斯22岁，上司指定给他的工作是在大楼的第七层楼上当“看守”，每天呆在一个小房里值班12个小时。他的具体工作是看守机器，接收从KH-11间谍卫星发来的照片和国务院等处发来的报告，然后将这些材料装在袋子里送到底层的焚烧炉里烧掉，一天5~10次。他对这项差使毫无兴趣。

坎皮勒斯早就想调换工作了。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张KH-11间谍卫星的使用说明，放入运动上衣的口袋里走出这幢大楼，并于翌年2月将它带到希腊首都雅典。后来他招认说，他早就有一个模糊的念头，把这份机密文件卖给前苏联人。

2. 送上门的情报

1978年的秋天，按照坎皮勒斯自己的话说，他无意间走过前苏联驻雅典大使馆，看到里面正在举行花园舞会，于是他决定走进去试试自己的幻想。进入大使馆后，他碰巧遇到了一位武官。在那以后他几次会晤了那个武官，谈到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和他所能提供的情报，第一次见面，他就拿到预付款3000美元。

开始的时候前苏联武官还怀疑坎皮勒斯可能是一个派过去的间谍，但是后来怀疑消释，并约定第二年夏天再接触。武官当即在一张旅游车票的票根

上写下一个地址，要坎皮勒斯下次回到雅典时按这个地址寄一张写有暗语“生日快乐”的条子去，以表示已经回到雅典来了。然后就到一个指定的公用电话旁边按上一个揿钉。这是武官和坎皮勒斯约定的将在下个星期六夜晚碰头的暗号。这样的构思布置，可谓天衣无缝。

令人吃惊的是，坎皮勒斯在当年的春天，把他的这个故事讲给他在中央情报局里的朋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特工听，他的用意是想实现当双重间谍的梦想。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事隔数月，联邦调查局得到了这个风声。当时，联邦调查局已得到报告说，从前苏联人已在采取某些措施防止 KH-11 间谍卫星的监视的迹象上看，KH-11 间谍卫星的机密被泄漏出去了。

坎皮勒斯在动身去雅典之前居然同意接受测谎器的测验，两次测验结果他都失败了。至此他只好招认了。避开了花园舞会的细节，只是说他仅仅是在一个下午，到前苏联大使馆对碰到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前苏联人说，他有对前苏联人有用的情报。在几次接触中，坎皮勒斯把间谍卫星的使用指南部给了前苏联武官。

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坎皮勒斯事件之前，中央情报局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份机密文件不见了。事发之后的两天，中央情报局又发现另外 13 份副本也不翼而飞。

坎皮勒斯于 1978 年秋天以间谍罪被处 40 年徒刑。

(五) “东芝事件”始末

说到高技术间谍战不能不说到“东芝事件”。

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视厅逮捕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副部长谷村弘明。他们被指控在东芝机械公司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谋，非法向前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的案件中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东芝事件”。

1. 海军的难题

在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前苏联的潜艇一直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前苏联潜艇噪音极大，以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能确切掌握其行踪。在200海里之外，美国海军就能测出前苏联潜艇的位置，并能跟踪它。苏军认识到，如不尽早设法消除潜艇噪音，不管建造多少潜艇，打起仗来，都逃脱不了“折戟沉沙”的厄运。

潜艇的主要特点是隐蔽性好、自给力强、续航力和突击威力大，能远离基地长时间、独立地在海上遂行消灭敌运输舰船和大中型战斗舰艇，破坏、摧毁敌基地、港口和岸上重要目标，进行侦察、反潜、布雷、巡逻，以及运输少量人员和物资等战斗任务，对敌方具有致命的威胁。

但是，要消除潜艇噪音谈何容易！现代潜艇噪音主要来自潜艇内部机械和推进器。一艘潜艇在每秒十周频率范围的噪音，有90%出自它转动的推进器。这种噪音是反潜探测的重要信号源。一艘潜艇噪音增加10分贝，它的暴露距离就会增大1~3倍；反之，噪音降低5分贝，它的暴露距离就会减少到原来的1/3。要生产在水下推进时旋涡小、噪音低、对方声纳很难探知的先进螺旋桨，就需要由电脑控制的高精度加工机床。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其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一直严密防范有关螺旋桨叶片加工的高技术流入前苏联。前苏联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多方动员力量，特别是情报机关的力量，千方百计从西方国家获取制造潜艇的高科技。

于是，科技间谍们开始行动了。

2. 秘密协议

1970年前苏联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机械工具展览会上，曾向丹利机械公司订购了6台专供潜艇推进器作整形和打光用的巨型铣床，但后来因美国海军的干涉而作罢。

1979年，机会终于来了，以全苏技术机械进口公司副总经理为掩护身份的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奥西波夫，通过日本和光贸易股份公司驻莫斯科事务所所长熊谷独和伊藤忠商社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及挪威康士堡贸易公司拉上线。1982年12月至1983年6月，后者非法向前苏联出售了4台大型MBP-110S型9轴数控大型船用螺旋桨铣床，成交额达37亿日元(当时合1800万美元)。一年后，前苏联又从东芝机械公司进口了研磨机和控制研磨机用的计算机修正软件，用于提高机床的性能。这种高约10米、宽22米、重250吨的铣床，可以加工重达130吨、最大直径11米的船用螺旋桨，使误差降至毫米以下。这样的螺旋桨不仅能提高航空母舰的速度，而且能大大降低潜艇推进器发出的噪音，从而使潜艇更难被发现和跟踪。这种高性能的机床，是由冰岛以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和日本等15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出口

的产品。该委员会曾明文规定，具有3轴以上加工能力的数控机床，属于战略物资，禁止向前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出口。

为了掩人耳目，前苏联没有向日本订购与9轴铣床相配套电脑控制系统，而是坚持要挪威国营武器制造公司——康士堡贸易公司，向东芝机械公司提供4台NC2000数字控制装置，由东芝完成总装后，出口前苏联。前苏联为此还与康士堡公司单独签订了秘密合同。这种数控装置通常与不为“巴统”所限制的两轴机床配套使用。但是，只要改变一下配线和电路，就可作为9轴机床的数控装置。此前，康士堡公司已将这种非法转换的数控装置，销往前苏联达20台之多。另外，这个公司还向前苏联秘密出口过火炮自动瞄准电脑，它是前苏联秘密交易的老搭档。

1981年4月24日，前苏联和日本的签约仪式在东芝公司的外贸代理商——伊藤忠商社驻莫斯科办事处举行。包括奥西波夫和托洛特斯基在内的苏方代表，在长达120页的合同上签了字。合同上写的是技术性能较低、不为“巴统”所禁止的4台两轴铣床。但事实上，在前克格勃特工奥西波夫等精心策划下，东芝机械公司和前苏联早已“暗渡陈仓”，签订了一份保证在发货时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提供9轴铣床的秘密协议书。

3. “偷梁换柱”

1981年5月19日，即日本、前苏联秘密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东芝机械公司即向日本通产省申领向前苏联出口的许可证书。申请书诡称，是用于加工水力发电机叶片的简易TDP—70/110型两轴铣床，隐瞒了9轴铣床的高性能，从而骗取了通产省的出口许可证。在以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东芝机械公司完成了MBP-110S9轴机床的总装任务。从1982年12月至1983年6月，东芝公司陆续将上述4台机床出口到前苏联。其中第一批机床，以几十个条板箱分装，由东京芝浦码头吊到前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号货轮上。当时，和光贸易股份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熊谷独，还专程返日，在东京码头督促装运。日本海关人员，因事先已检查过伪造的、写有两轴铣床的书面文件，所以免于拆箱检验实物，并挥手放行。由东芝机械公司组装的4台大型MBP-110S电脑控制的9轴螺旋桨推进器工作母机，就这样顺利通过日本海关，运往前苏联。

此外，前苏联还在1984年秘密向东芝机械公司购买了同样被“巴统”禁运的5轴铣床和12个供9轴铣床使用的铣刀和超量零部件，以及附有可提高工作效率的电脑软件。

这4台9轴铣床安装在前苏联海军的一个主要造船厂——列宁格勒市的波罗的海造船厂。该厂有一个规模庞大的螺旋桨制造车间，曾建造过“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和W级潜艇。

为了掌握技术、争取时间，前苏联军方临时改变主意，只要日方安装两台机器，其他两台由他们的技术人员组装。在安装过程中，前苏联除对日、挪技术人员展开了大力争取外，还组织了一批本国技术人员，采取“现学现卖”的办法，白天随师学艺，帮日、挪技术人员安装机器，晚上再挑灯夜战，按白天所见方法，如法炮制，安装另外两部机器。这样，前苏联在很短时间内就生产出了新型推进器。在波罗的海造船厂的那些9轴工作机床，一年可制造12~17部高质量的推进器，从而使前苏联潜艇的推进系统技术有了很大长进，使它们的速度更快，声音更小，更不易被发现。

从 1975 年至 1985 年的 10 年间，前苏联潜艇噪音降低了 30 分贝。这种明显的进步，使西方人士感到震惊。1986 年，前苏联装备海军的新型核潜艇的噪音，只相当于以前核潜艇的 10%，使美国海军直到近在 20 海里以内，才有可能侦测出来。

1986 年 10 月，一艘负有特殊“研究”使命的、载有许多最新实验追踪器材的美国海军 688 型核潜艇——“奥古斯塔”号，在直布罗陀附近因为没有侦测到一艘正在追踪的前苏联潜艇的噪音，竟然与之相撞，造成 270 万美元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承认，美国海军反潜飞机和舰艇搜寻这类新型潜艇，比过去要困难 10 倍。

9 轴铣床加工的螺旋桨，还将大大提高前苏联 4 艘新造航空母舰和其他新型潜艇的航速。1984 年 8 月，美国侦察卫星将前苏联正在建造的、暂时命名为“克里姆林”号的新型核动力潜艇拍照下来。根据这些卫星照片分析，其排水量可达 7500 吨，动力 24 万马力，最高速度 33 节。

4. 秘密交易曝光

1985 年 12 月，日本、前苏联秘密交易当事人之一、日本和光贸易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当年 51 岁的熊谷独，因和他的雇主发生纠纷而辞职，并向“巴统”委员会主席盖尼尔·陶瑞格递交了一份关于揭发东芝机械公司向前苏联出口 4 台 9 轴工作机床的报告。

陶瑞格当即将这份报告给日本代表过目。日本代表表示，要马上调查此事。日本通产省进行调查时，东芝机械公司则以预先签署的假合同和其他技术文件资料为佐证，矢口否认，并于 1986 年 3 月通过日本代表，向“巴统”委员会主席保证，绝对没有像熊谷独所指控的那件事。但美国国防部技术安全署在全球性追踪的电脑报表中，发现前苏联正在采购潜艇科技。

1986 年 12 月，技术安全署主任布雷耶和美国国防部次长菲烈德前往东京，与日本副外相会面，并向他出示证据。但此次会面极不融洽。日方坚称，经过调查，绝对没有发生过将巨型机械售予前苏联的事。

布雷耶和他的伙伴在东京调查碰壁后，就决定要在“巴统”年会上公开予以揭露。1987 年元月 28 日，美国人在法国巴黎“巴统”年会上，放映事先制作的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向前苏联出口 4 台装配有挪威生产的数控装置的 9 轴大型铣床的幻灯片。日本和挪威代表当即退出会场。事后，日本代表向美国技术安全署主任布雷耶表白：“美国的这项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日本出售给苏联的铣床都是简易型，并事先获得协委会的核准。”布雷耶涨红脸高声反击道：“永远别再对我说这些，美国提出的是绝对可靠的资料。”

4 月 30 日，日本警视厅采取紧急行动，以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对东芝机械公司总部和静冈县的沼津事务所等 14 个机构进行全面搜查，缴获了全部档案资料。至此，过去被谎言、假合同所掩盖的秘密交易，在确凿证据的面前，现了原形。日本新闻界充满了震惊和羞辱，前首相中曾根正式向美国就此案给“双方安全”利益所造成的危害表示道歉，并表示对有关人员将通过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5. 东芝“负荆请罪”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好对东芝机械公司和其他商社及有关人员，处以最严厉的行政和刑事处分。

1987年5月15日，日本通产省发布命令，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在一年内向14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出口任何产品，禁止担任中间商的伊藤忠商社在3个月内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机床；而对为本次非法交易牵线搭桥的和光贸易公司则给以警告处分。“东芝事件”本来与中国无关，但却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日方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对中国出口价值24亿日元的35个合同，而且连其他日商同中国签订的9亿美元合同，也被毫无道理地拖延审批。对此，中国有关方面，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与索赔。

7月1日，东芝机械公司的母公司——东芝公司董事长佐波正一和总经理里杉一郎被迫宣布辞职。此前，东芝机械公司社长饭村和雄也于5月15日引咎辞职。另外，东芝公司为了“负荆请罪”还以1亿日元的代价，在美国50多家报刊上，整版刊登“悔罪广告。”

7月中旬，日本通产相田村元专程飞往华盛顿，向美国作了3项保证：(1)修改《外汇及外贸管理办法》；(2)加强日、美高级事务协商；(3)增加出口审查人员，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管理和审查。审查对象是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和1亿日元以上的大笔贸易项目等。紧接着，日本政府以罕见的态度，于当月底制订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修正草案，并很快在众议院强行通过。新的管理法，增加了关于出口必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与外务省进行“法定协商”的条款，并加重对违法者的处罚。

8月20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局长谷川召见前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他通知前苏联驻日贸易代表处代表波克罗夫斯基离开日本。这是日本当局针对当天早些时候，前苏联政府要求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海军武官竹岛信博和三菱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处副主任大谷隆男离开前苏联的对应措施。在上述外交风波中，双方都指责对方人员非法从事情报活动。日本政府这样以牙还牙地迅速作出反应，主要意图是想向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显示其对前苏联的强硬立场，以摆脱因“东芝事件”遭到美国严厉指责的尴尬处境。

四、鲜为人知的间谍人物

间谍这个职业是世界上最具神秘色彩的职业。这个职业充满了惊险，充满了刺激；这个职业吸引了不少愿意为它而献身的男人；这个职业更少不了为它而工作的女人。

女间谍对军人特别的青睐，她们是军事秘密最危险的敌人，下个世纪仍然如此。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女间谍的表演吧。

(一) 哈妮尔神秘消失

1. 谁泄露了秘密

1986年的一天，英国一家很出名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条世人震惊的消息：以色列正在秘密制造核武器。这条消息披露了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详情，包括一些细节。

消息一见报，立即引起了以色列秘密谍报机构莫萨德的注意：是谁透露的消息？肯定是一个知情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很快，莫萨德发现了建以色列在耶杰佛沙漠的核武器工厂的一个可疑人，这个人叫瓦努努。

瓦努努是8岁时从摩洛哥移民到以色列的。后来他参了军，服役时是个工兵，尔后在那杰佛沙漠的核武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瓦努努是一个有头脑的年轻人，他爱思考，肯动脑。在核武器工厂工作期间，瓦努努对以色列的疑问在逐渐增加。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认为在核工厂进行的秘密工作是不道德的。

后来，瓦努努离开了以色列，当他抵达伦敦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透露出相当天真的气息。他几乎没有考虑后果便决定将以色列制造核武器的真相披露出去，而似乎有一种凛然的正义感在驱使着他，使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对自己的做法充满自信，相信他的披露会帮助人类避免一场灾难。不过，他有时也感到孤独。

《星期日泰晤士报》得到瓦努努的这条消息后，将信将疑。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决定与以色列大使馆取得联系，以便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并向瓦努努保证：保护消息的来源。瓦努努同意了。从表面看来，得知这一消息的以色列大使馆似乎毫无所动，几乎根本没有当做一回事，但事实上就是第二天，莫萨德就开始行动了。

莫萨德的行动远比人们意料的要迅速，这是他们成功的诀窍。对像瓦努努这样人物的出走，他们当然更不含糊。他们决不容许威胁以色列国家利益的背叛。

与以往的行动一样，莫萨德捉拿叛逃的瓦努努的计划是诱捕。这样一个任务的主角当然应由一个年轻而又美貌的女性来充当，莫萨德选中了一个名叫哈妮尔的姑娘。她的容貌和身材恰到好处，每一点都充满魅力而又丝毫不显妖艳，对吸引像瓦努努这样的男性，她无疑是最好的香饵。

2. 哈妮尔诱捕

哈妮尔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她在那里足足长到17岁，学会了美国少女所应具有的一切习性与作派。因此，要对瓦努努这样的一个单身的核技术人员隐瞒她在以色列的生活这并不困难，况且，瓦努努根本想不到会有一个来自莫萨德的女人出现在他身边。

瓦努努做梦也想不到，像哈妮尔这样漂亮、看上去极为单纯的女性，会出自以色列最高级的谍报机关。的确，与瓦努努不同，哈妮尔是彻底投身以色列的事业的。当她还是个少女，居住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时，她就已积极卷入了犹太政治。在她开始学习犹太语时，便不再有固定的男朋友。这表明了这个女孩对于信仰的坚定和对今后考虑的长远。到了16岁时，她的学习中

便包括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持的为期 7 周的“领导”课题。

图 10 哈妮尔诱捕

大约就在这期间，哈妮尔的父母感情破裂要求离婚。他们俩恶语相伤，整个家庭吵得乌烟瘴气。为了寻求安宁，哈妮尔投向了她的教师。她的老师鼓励她好好学习，并抓紧时机向她灌输犹太思想。后来，当到以色列深造的机会来临时，哈妮尔丝毫没有犹豫。

这次为期 3 个月的深造是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的，主要课程是学习世界犹太史和希伯来语。这是哈妮尔第一次回到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这次故乡之行更加增进了作为犹太人的哈妮尔的民族意识。对这个初次谋面的祖国，她充满了好感，很可能就在这一次，她更加坚定了为以色列献身的决心。课程结束，哈妮尔回到美国，高中一毕业，她立刻就返回以色列，参加了一个青年战斗先锋组织。

青年战斗先锋组织是一支军事精锐部队，其成员只挑选最富于高度主动性的新兵，作用是保护和建立新的居民点。就在这段时期，哈妮尔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军事情报部的少校欧弗·本托天。

1985 年 3 月，25 岁的哈妮尔完成了她的婚礼，结束了她的少女生活。随着婚礼的完成，她也作为一个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被以色列接纳了。自此，她开始接受一些足以令她自豪的国家使命。现在，她接到了诱捕瓦努努的命令。

哈妮尔接到莫萨德总部给她的行动命令后，来到了伦敦，住进了位于维多利亚街区的埃刻莱斯顿饭店的 209 号房间。

哈妮尔首次接近瓦努努是在 9 月 24 日，星期三。瓦努努后来说，他当时正漫步在曼彻斯特广场，一位看上去十分孤独的女人似乎正在观察他，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最后，他平生第一次鼓起勇气接近了对他来说完全陌生但又充满诱惑力的女人。

初次接触，哈妮尔显得有点害羞，谈话进行了约喝一杯咖啡的功夫。她说，她叫辛茜亚·汉宁，是从佛罗里达来受培训的美容师。她以地道道的莫萨德方式采用了一个真人的名字做伪装。辛茜亚·汉宁，是她兄弟的 22 岁女朋友。当时，哈妮尔肯定看上去比她 26 岁的年纪更年轻，她做得很成功：瓦努努中计了。能认识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女郎，瓦努努全身都洋溢着一种男人的喜悦和自豪，他一点也没有怀疑这艳遇对他这种年纪的男人是否有点太不真实了。

他们天天见面，哈妮尔表现得十分逼真，完全象一个热恋中的情人，而瓦努努也的确体验到了来自她的爱情。不过，哈妮尔同时也顺利地实施着她的计划，巧妙地利用瓦努努的急躁和他的文章迟迟未见发表的挫折来破坏他的自信。

接着，她的运气来了。最初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瓦努努之间进行接触的是一个叫奥斯卡·贵里洛的哥伦比亚记者。贵里洛出于他自己才清楚的理由，决定也将这篇文章送到《星期日镜报》去。

《星期日镜报》登了这篇稿子，但同时也揭露这个名字叫贵里洛的哥伦比亚人有过犯罪记录，留下了这整个故事似乎不太真实的感觉。但真正有影响的是《星期日镜报》发表了一张瓦努努的照片。正是这张照片，使整个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由于这张照片，在这个国家你到处都会被认出来。你到国外某个地方去会更好些。”哈妮尔对瓦努努这样说。她还补充道，看来《星期日泰晤士报》不像马上要发表他的文章。

另一个到国外的诱惑是，哈妮尔坚决地拒绝了瓦努努的一切性要求，她声称只有在比伦敦的旅馆更熟悉的环境中，她才能同意这种事情。但瓦努努的意志看来比他想象的要坚定些，他同样坚决地拒绝了要他离开英国的提议，表现得十分有男子汉气。

如果瓦努努把他的男子汉气概坚持到底，那么事情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遗憾的是，瓦努努的男子汉气概没有坚持多久。哈妮尔到伦敦西区的伯克利街的托马斯·库克售票处买了一张去罗马的头等舱机票。她把票拿给瓦努努看，并解释说，她第二天就离开，住到她姐姐在罗马的公寓去。她问瓦努努是否也想陪她同去。

她用忧郁和期待的目光注视着瓦努努，其天真和真诚令瓦努努再也无法坚持他那男子汉的气概，他同意随她一起走。

第二天一早，哈妮尔给瓦努努买了一张同样的机票。他们在希斯罗机场乘下午之点 10 分的航班离开伦敦飞往罗马。结局是，瓦努努被一杯咖啡药倒，戴上手铐，用船送往以色列。

1986 年 12 月，瓦努努走进耶路撒冷的法庭时，他才能向新闻媒介提供一点他被莫萨德绑架的线索。当警车倒车时，瓦努努张开了他的手掌，上面用黑墨水潦草地写道：86 年 9 月 30 日 21 时，BA504 航班，瓦努努在意大利罗马被绑架。”

根据这一线索，一家报纸发现“辛茜亚”在为自己买票时用的名字，并知道了一位辛·汉宁小姐在飞机上坐在瓦努努旁边。为其间谍提供借用的身份，是莫萨德惯用手法，瓦努努的劫持者借用了确有其人的辛茜亚·汉宁小姐的身份和背景。

3. 哈妮尔神秘失踪

尽管金属的百叶窗将窗户罩得严严实实，但地处以色列海滨胜地内坦亚郊外的这所房子实际上已经荒弃了。这座有漂亮晾台的小平房表面看来还整整齐齐，但到处都显然可见被遗弃的痕迹，花园中也已杂草丛生，与周围优雅宁静的居民区格格不入。

邻居们毫不掩饰对提问者的怀疑，他们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突然对这所普通平房的主人大感兴趣。他们说，欧弗·本托夫和他的妻子哈妮尔走了，但问到“上哪儿了”，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代替回答，显然，他们认为此事根本不值得他们去加以关心。

这对夫妇是在有两位记者造访了这所极为平常的房子后突然消失的。这两位记者直接了当地向房子的女主人说，他们断走她帮助绑架了前以色列的核技术人员瓦努努。女主人否认了这个问题。

但几个小时后，女主人哈妮尔和她的丈夫——一位前军事情报部的少校，就不知去向了。

哈妮尔从地球上消失了吗？没有。也许此刻她又以别的什么名字出现在某个国家的饭店里，她还在行动着。

军人的艳遇常常伴随着某种阴谋。女间谍为军人设下的陷阱是玫瑰色的。女间谍拉人下水的方法既十分古老，又很现代。

(二) 她设下一个陷阱

1. 列车里的“巧遇”

火车对于众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最经济、最普通的旅行工具。

然而，列车上的软卧车厢却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随意乘坐的。祝田冰坐进了软卧车厢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

祝田冰是部队的一个宣传干部，刚过“而立”之年。论资格和级别(其实，在很多时候级别和资格说明不了问题)，他本不该坐进软卧车厢，可是他必须立刻赶到成都，单位破例给他买了一张软卧车票。

当祝田冰提着简单的行装，刚一跨进软卧车厢的拉门，一股浓郁的艳香钻进了他的鼻腔，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祝田冰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这是一种法国制造的高级香水的味道。抬起头来，他发现车厢里坐着一位相貌端庄的姑娘。姑娘的衣着并不艳丽，但衣着的质地却很高级，是一种真丝双皱绸制的连衣裙，连衣裙的做工十分精巧。

祝田冰放下行李，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来。他两眼望着窗外急急上车的人们，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这姑娘是干什么工作的呢？香水的味道说明她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况且一般人也不会坐进这种车厢。从衣着上看，她倒像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过象她这样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坐进软卧车厢里并不多见。

“出差？去成都吗？”那姑娘似乎看出了祝田冰的心事，主动与他搭话。

祝田冰回过头来，很高兴地点点头：“是呀。”他生怕失去了与她说话的机会，赶忙问她：“你去哪儿？也去成都吗？”

“成都那边有一家公司，要与我们公司谈一笔买卖。”她说。

“我们是同路。”祝田冰高兴他说。在枯燥的旅途中，遇上一位姑娘，他心里甜滋滋的。

列车开动了，离开了站满欢送者的站台。

祝田冰思想的列车也启动了，但是他的思想列车驶向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

此刻，他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姑娘。她的体态匀称，丰满妩媚，相貌说不上漂亮，却也显露着几分诱人的风姿。

“这是我的名片。”她递给他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工作单位和她的名字：林秀敏。

祝田冰一边看着这精巧的名片，一边说：“改革开放了，做生意是最时髦的事情。”

“其实，经商有什么不好！？商业的发达是一个国家兴旺的标志。有人这样说：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度荒，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全民经商。当然，全民都来经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林秀敏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是的。人们现在最痛恨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倒’，中国的经济就坏在他们的手里。”祝田冰觉得这个林秀敏真是谈吐不凡，他随声附和着。

一谈到“官倒”，一谈到各种不正之风，林秀敏的话更加滔滔不绝。

“毛泽东同志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现在不请客吃饭根本办不成事儿。”林秀敏

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有人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不写文章在报纸上登一下，革命就不算成功，革命就是应该温良恭俭让。这些话当然不对，可是，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她在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紧盯着祝田冰的脸，她在观察他的反应。

祝田冰觉得她的这一席话说得实在深刻，不但深刻而且很有分寸。他不禁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时，车厢里的喇叭响了起来：“各位旅客，现在餐车正在营业，供应的品种有各种炒菜……”

“你看，说到请客吃饭就真的该吃饭了。”她热情大方地邀请他，“走吧，祝同志，我们一起去吃顿饭，我请客。不过我可不是为了办成什么事情才请客。”说着，她笑了起来，她的笑容挺动人。

酒足饭饱，当他们从餐车里再次回到软卧车厢里的时候，他们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了。

2. 艳遇伴随着阴谋

作为一名军人，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可是祝田冰却觉得：现在是和平时期，本世纪无大战，警惕什么？“间谍卫星早把我还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了人家。”他曾对别人这样说。

祝田冰忘记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军人的艳遇常常伴随着某种阴谋。

其实，祝田冰并不是没有一点警惕心，当他看见她出手那样大方，一顿饭就抛出了自己1/3的工资的数额，他有点惊奇。继而一想：军人的工资怎能与买卖人相比。他心中的疑问很快又释然了。

特别是林秀敏在餐桌上讲的那一席话，更使他的疑云顿消。她举起酒杯，轻轻地呷了一口，沉静他说：“现在有些人追求吃、喝、玩、乐，这实在太浅薄。人生一世当然应该过上舒服的日子，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应该有所追求，否则他只能作为一个动物生活在地球上。有精神追求的人，才是一个大写的人。”

这话使祝田冰惊异，现代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来很不容易，他开始佩服她了。

“精神追求重要，可是你追求什么呢？”在那间软卧车厢里，祝田冰问她。

“我追求民主自由。你看我们搞买卖的人最自由，想与谁谈生意就与谁谈，买卖双方是最民主的，谈不成就散，谈得成就干，不受限制，没有干涉。”她说。

这话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可是祝田冰却觉得，她把自己的工作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图 11 艳遇伴随着阴谋

尽管林秀敏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间谍，但她毕竟懂得一点儿中国人的心理，她知道在中国要征服一个人，那么你的言谈既不能脱离原则，又不能没有一点牢骚，所以在祝田冰面前，她也发一点儿牢骚：“我们国家尽管开放了许多，可是总有许许多多的条条框框限制你，使你觉得不那么自由。”

“唉——”祝田冰长叹一声，“其实你的生活够自由的了，比我可强多了。”

此刻，祝田冰觉得眼前的林秀敏实在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值得佩服的现代女性。

可是，当林秀敏问他“你对我的印象如何”的时候，他却这样回答：

“我觉得你和大家一样普普通通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事后，祝田冰回忆说：“我是个军人，我想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应该说，“保持距离”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与不了解的女人交往的时候，尤其要这样。

只是，祝田冰与林秀敏的距离能保持多久？这是颇成问题的。

林秀敏作为一个间谍，她的胜利就意味着消灭这个“距离”。

事实上，林秀敏胜利了。

林秀敏开始对祝田冰发起了进攻：“我总觉得军人是很正统的，可是想不到你的知识面那样宽，思想也很解放。一开始，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军人男朋友，我没有同意。如果遇上了你这样的军人，我一定会嫁给他。”

这一席话，说得祝田冰心里麻酥酥的。

“那么，你已经结婚了？”祝田冰问。

她点了点头：“结婚了，但我的婚姻并不幸福。”

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倾述自己不幸的婚姻，这意味着什么？

祝田冰不愿去想为什么，他只觉得：这样一位有思想、有才干的女人，把她那不幸的婚姻说给我听，这就足够了。

对于一个女间谍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头。女间谍征服一个男人，事情的开头大都是在床上。

是的，林秀敏和祝田冰有了这样一个开头：他们拉上窗户上的墨绿色的窗幔，把太阳关在外面。打开电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欲火中烧的心。房间里那张普通的席梦思软床，对他们来说是足够大了。在招待所的这间房间里，他们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们觉得。

从浴室到床上再到沙发上，他们不停地谈着，时而噼噼喳喳，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卿卿我我，谈话的内容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包罗万象。

无论谈到什么，她总是那么热情，那么主动，她操纵着谈话的内容，也操纵着他的感情和行动。

他乐意让她那清脆的话音不断地撞击着自己的耳膜，拨动着自己的心弦。

他更喜欢她。

他觉得，她应该嫁给他，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可她却说：“你总是那么性急。”她娇滴滴地把一只纤细的手搭在他的肩上，“等我们办完了几件大事，那时候……”

“什么大事？”

“怎么，你真的不明白？”她又换了一副面孔，“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从云南边境的那一边过来的，专为台湾的‘老板’作生意的。”

他的心中一惊。他多少猜到了她的隐秘的身份，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祝田冰的脑海里，台湾的情报人员就是电影上的戴笠、毛人凤那样的

形象，或着，是那些从大陆上逃走的罪犯。

“这样一位聪明美丽的女人，怎么会是间谍？”祝田冰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可他又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沉默。

祝田冰的沉默此刻显得有些多余，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一个“美女蛇”，一切都由不得他了。

林秀敏为自己的工作“成绩”而感到自豪。是的，几天之内她不但搜集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她还吸收了一名年轻的军官加入了她的行列。这一切来得是如此顺利。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祝田冰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几名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请”上了一辆汽车，一副锃亮的手铐卡住了他的双手。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早就注意了他们的行动。

林秀敏也在潜返边境时落入了法网。

在间谍人物中，有一种人具有双重秘密身份，他们既是这个国家的谍报人员，又为另一个国家的谍报机关服务，这就是双重间谍。一个叫菲尔比的人就是——

(三) 间谍史上最成功的双重间谍

1. 隆重的葬礼

菲尔比是国际间谍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 30 年代初就读于剑桥大学，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纳粹主义猖獗之时，这使他认为，只有前苏联才能有效地遏制纳粹主义的兴起。1934 年在伦敦加入前苏联谍报机构。

菲尔比为前苏联谍报机构干了近 30 年。他先在外交部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去英国谍报部门工作，直至窃居极其重要的专门从事反苏谍报的军情 6 处。

他曾被派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负责监听前苏联的工作；1949 年至 1951 年，他又被派任英国驻美使馆一秘，负责协调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工作。他把因职务获得的情报全部提供给前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约 20 年，在英美和前苏联的间谍战中，他使英美方面受到的损失最大。由于他提供的情报，英美布置在前苏联和东欧的特务，大部分被消灭。美国报纸曾称他是“间谍史上最成功的双重间谍”。

菲尔比到达前苏联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接受他为前苏联公民，接着授予他克格勃上将衔，并向他颁发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和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英国担任军情 6 处科长期间，因成绩卓越，得到过大英帝国勋章。

菲尔比的出逃，不仅破坏了西方的谍报活动，还震动了英国的上层社会。

1988 年 5 月 13 日，莫斯科西郊孔策沃烈士公墓，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颇为隆重的葬礼。在覆盖着天鹅绒的水泥台上，一口敞开着棺木停放在鲜花丛中，持枪卫士肃立两旁。棺木中的死者身着黑色西服，内穿淡蓝色衬衫，系着缀有红色圆点的领带。他的满头银发整齐地向后梳着，面容安详。他，就是当年震动西方世界的双重间谍、为前苏联克格勃效命数十年的英国前军情 6 处反间谍科科长哈罗德·艾德里安·拉塞尔·菲尔比，世人称之为金·菲尔比。他于 5 月 11 日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 76 岁。

参加葬礼的有 200 多人。他们之中有菲尔比 1963 年定居莫斯科以来结识的前苏联朋友，有专程从伦敦飞来的菲尔比的儿子约翰和菲尔比的遗孀罗发以及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他们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低回激荡的哀乐，鱼贯走过灵柩，向菲尔比告别。每个人都按照俄罗斯传统，依次亲吻死者的前额。50 岁的罗发在亲属的搀扶下，走到丈夫的遗体旁。她欲哭无泪，只是将自己的脸同菲尔比的脸紧紧贴在一起。

13 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手捧用黄色缎子做成的小圆垫，每个垫子上别着一枚金光闪烁的勋章，其中有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各国人民友谊勋章、一级胜利勋章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古巴等国授予他的各种勋章。这些闪光的勋章证明着生前已晋升为克格勃上将的菲尔比的显赫地位和为克格勃立下的汗马功劳。

前苏联有关部门的 4 名高级官员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菲尔比“光辉的一生”，称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谍报人员，是前苏联情报人员的“伟大榜样”，吹捧他剑胆琴心，“每项行动计划都十分周密，一生从来没有出现失误”。

追悼仪式结束后，在 2 名迈着正步的克格勃卫兵的引导下，6 名军官抬

着棺木，走向墓地。卫兵列队向空中鸣枪致哀，菲尔比的灵柩被缓缓放进铺饰着红白丝绸的墓穴。

在菲尔比墓的一侧，整齐地排列着一座座将军墓。不远处，还有一座新墓，里面埋着这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过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的马林科夫。

菲尔比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印度的安巴拉呱呱落地时，当时担任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的父亲哈里·约翰·布里杰·菲尔比给儿子起了个“金”的诨名。“金”是著名作家拉迪亚德·基普林笔下的少年间谍英雄。他父亲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儿子长大后竟成了前苏联间谍英雄。

被前苏联视作英雄的菲尔比，英国人给他戴的“桂冠”是“卖国贼”、“叛徒”、“本世纪最大的间谍”。菲尔比 5 月 11 日去世后，前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立即向英国作了通报，英国报联社于当晚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英伦三岛的各大报纸杂志趁着英国近代史上最大间谍案落下帷幕之际，又抖出了有关菲尔比间谍案的一些新内幕和他晚年的一些生活轶事。

2. “两栖”生涯

很久以来，英国情报机关一直认为，菲尔比 1933 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时就被前苏联间谍机关招募为间谍，并认定同时投入前苏联怀抱的还有菲尔比的同窗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因此存在着一个牛津大学间谍网。但菲尔比对此矢口否认。据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发表的该报特派记者菲利普·奈特利 1988 年初在莫斯科会见菲尔比后写的采访记，菲尔比被招募为前苏联间谍的时间是 1934 年春天，地点在伦敦。

当时有一名英国人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前苏联的情报机构，他满口答应了。菲尔比在言谈之中还透露，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均后于他加入前苏联情报机构，并暗示上述 3 人是他亲自发展为前苏联间谍的。

前苏联谍报机关交给菲尔比的任务是，打入英国情报机关的核心，搞清西方国家针对前苏联的各类间谍活动。

1940 年，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菲尔比进入军情 6 处。由于他精明能干，1944 年被任命为该处反间谍科科长，成了一名表面上为军情 6 处效力，实际为前苏联服务的双重间谍。

菲尔比深受上司的赏识和信任，一度被内定为军情 6 处处长的候选人。

1949 年，他被派往美国，公开身份是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实际任务是协调英美两国谍报机构的行动。

此时，菲尔比已处于西方情报部门的核心。他给前苏联情报机关送去的每一个情报，都使西方付出沉重代价，遭受惨重损失。40 年代末，英美情报机关拟订了一项派特遣人员潜入阿尔巴尼亚搞颠覆活动的计划。菲尔比将这一绝密情报连锅端给了前苏联情报机关。结果军情 6 处和中央情报局派出的数百名特遣人员一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就中了埋伏，落了个全军覆灭的下场。前苏联情报机关还破获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安插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大批间谍。有些想投奔西方的前苏联间谍往往“出师未捷身先死”，且死得不明不白，后来才知道这是菲尔比捣的鬼。

1949 年春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译了 1944~1945 年前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同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其中有一份电报透露，在英国驻美使馆中藏着一名前苏联间谍，代号为“霍默”。从这份被破译的电报内容推测，

“霍默”隐藏得很深，能读到邱吉尔和社鲁门之间的来往电报，并将其内容报告了莫斯科。

联邦调查局和军情 5 处一起立案调查。由于菲尔比负责协调两国的反间谍工作，因此也参与了调查。菲尔比心知肚明，那位“霍默”就是他的同伙，在 1944~1945 年期间任英国驻美使馆一等秘书的麦克莱恩。英美两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范围越来越小，麦克莱恩眼看就要暴露，菲尔比在请示了克格勃之后：制订了麦克莱恩潜逃的应急计划。菲尔比 1988 年 1 月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这对克格勃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当时一切都乱了套，我们只能作好一切准备，一旦暴露，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

1951 年 5 月 24 日，军情 6 处、军情 5 处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提请当时的外交大臣莫里森批准对麦克莱恩的审查。莫里森第二天就签署了批准审查的文件，可就在这天晚上，麦克莱恩乘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逃之夭夭。同他一起出逃的还有另一名前苏联间谍伯吉斯。

两名高级间谍在关键时刻出逃，在西方情报界引起了震动。给他们通风报信的究竟是谁？这成了英美情报界注意的中心。它们很快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菲尔比。在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出逃 3 星期后，菲尔比被召回伦敦，接受审查。

老奸巨滑的菲尔比一口咬定自己一无所知，加上当时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菲尔比总算过了关。但英美情报部门对他已失去信任。1952 年菲尔比被军情 6 处辞退。令人吃惊的是，此后他竟继续充当前苏联间谍达 10 多年之久。据菲尔比自己透露，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军情 6 处的两位朋友尼古拉斯·埃利奥特和乔治·扬。1956 年，埃利奥特和扬安排菲尔比到贝鲁特，以《观察家报》和《经济学家》记者的身分，继续为军情 6 处搞情报活动。

菲尔比最终露出马脚是在 1962 年。由于他在贝鲁特期间写了一些反以色列的报道，引起了他的一位亲以色列的女朋友弗洛拉·索洛门的不满。索洛门是英国马克斯——斯潘塞公司的经理。这年她在访问以色列时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军情 5 处供职的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她向罗思柴尔德透露，菲尔比是个共产党人，他曾试图拉她从事“和平所需的重要工作”。罗思柴尔德立即安排军情 5 处的人会见了索洛门。菲尔比在获得这一情报后，赶紧筹划逃生的计划。

3. 隐居前苏联

1963 年 1 月 23 日下午 7 点 30 分。贝鲁特。

菲尔比的第三位妻子埃莉诺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静候着丈夫。按原定计划，菲尔比今晚将和她一起前往英国大使馆，出席一等秘书鲍尔弗·保罗举行的招待会。突然，一阵急促电话铃声打破了客厅的寂静，埃莉诺拿起电话，里面传来菲尔比那熟悉的声音。菲尔比以平静的语调告诉她，他先要到邮局发报，请她先走一步。“亲爱的，招待会上见。”菲尔比在挂上电话之前深情他说道。埃莉诺对丈夫的记者工作的特殊要求已经习惯，再说她也知道他还在为军情 6 处办事，有些事情不能问得太细。她随即起身独自一人前去参加招待会。

但菲尔比始终没有在招待会上露面，当晚也没有回家。第二天，埃莉诺接到菲尔比的一封信，说他临时决定去执行一项时间较长的采访任务，近期内不能回家。菲尔比还给妻子留下 2000 英镑现金。

菲尔比此去音讯全无。直到3月29日，即菲尔比“出门采访”2个多月之后，英国外交部才宣布了菲尔比失踪的消息，军情6处在6月初终于搞清菲尔比已在莫斯科。7月30日，前苏联《消息报》宣布前苏政府向菲尔比提供政治庇护。这一消息在西方引起了巨大震动。

“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办法逃到苏联的？”《泰晤士报》记者奈特利1988年初在莫斯科采访菲尔比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菲尔比狡黠地笑道：“至于我是如何来苏联的，别去管它，因为这不重要。”但菲尔比详细描述了当时到达前苏联的情景：“那是隆冬季节的一天清晨5时，我到了一个很小的苏联边防站，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个取暖火炉，上面煮着一壶茶，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烟雾。在那里等候我的有三四个人，其中有一名会讲英语的克格勃官员，他是专程从莫斯科来接我的。”

在寒暄一番之后，菲尔比对他来到前苏联表示歉意。他说：“我本想留在西方，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但我受到的压力太大了。”那位克格勃官员握着他的手说，“金，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搞情报工作的都知道这么一句行话：一旦反间谍机构对你产生兴趣，你的使命也就快完结了。我们知道英国反间谍机构在1951年就对你产生了兴趣，现在是1963年，过了整整12年。亲爱的金，你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菲尔比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还声称，他是在英国情报机构暗示让他出走之后才逃往前苏联的。据他说，这是因为他的案情实在太严重，如在英国公开审理，将使当局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菲尔比到了前苏联之后，被安排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处环境幽静的寓所。这是30年代建造的一座小楼，他独自住在第6层。除一个面积很大的门厅外，这座房子还有主人卧室、客人卧室、洗澡间、洗衣房、厨房和一个大餐厅。餐厅的一侧是菲尔比的书房，书房三面的书橱摆满了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描写间谍生活的书，包括许多间谍小说。

在前苏联，这样的住房条件是很优越的。菲尔比每月交付80卢布的房租。此外，他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所乡间别墅，这是他消暑度假的地方。

在结束了几十年惶惶不可终日的间谍生涯后，菲尔比感到特别兴奋。特别是头两年，虽工作紧张，但却感到充实。他除向克格勃年轻的谍报人员传授经验外，还撰写回忆录，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种种不平凡的经历写下来。在此期间，前苏联当局给了他许多荣誉，给他戴上一顶顶桂冠。“这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他说。

大约到了1967年，菲尔比的心境每况愈下，尽管定期收到很高的薪金，但他觉得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菲尔比生前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显而易见，克格勃对我的工作潜力估计不足，我感到心灰意冷，十分沮丧。我又犯了嗜酒成癖的老毛病。更为糟糕的是，我得了疑心病，怀疑周围的一切。”

据菲尔比说，直到后来成为他第四任妻子的罗发闯入他的生活，他的那种烦乱不安的心情才有所好转。那是1970年秋天，也是从英国叛逃前苏联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夫妇，邀请菲尔比前去观看冰上芭蕾舞表演。布莱克夫人同时邀请了自己的俄罗斯朋友罗发小姐一同前往。罗发小姐容貌动人，受过良好教育。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一下子摄住了菲尔比的心。“我在20秒钟之内就做出决定：她就是我要娶的女人，”菲尔比后来说，在此后两个月中，他俩频繁约会，感情日深，终于在这年12月19日结为伉俪。

结婚时，克格勃出钱包了酒席庆贺。罗发小姐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她说，“我们真是相见恨晚。我以前没有结过婚，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在莫斯科目睹了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奈特利在报道中说，这是一对幸福的伴侣，菲尔比在谈话中常赞扬罗发如何能干，他又是如何离不开罗发。

菲尔比常常称前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并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他说：“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还会这样做。”

有没有“三面间谍”这个说法，众说不一，在间谍人物中，真正的“三面间谍”十分少见。同时为三个间谍机关工作，无异于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有个英国人是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间谍，他是一个高明的“走钢丝的人”。

(四) 有三重身份的间谍

英国人乔治·卜瑞克是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间谍，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是最有才干的特务之一。他能同时为三个主子“服务”，而主要的是为前苏联“服务”。乔治·卜瑞克的案件是从审讯开始的，那时，他的身份已被公开揭露。

1961年5月3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审讯了他，宣判他为“外国”(前苏联)的利益而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时他快38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

“你的书面坦白材料供称，你在这几年中是一名领取报酬的外国间谍。”法官对卜瑞克说，“你给这个国家的很多间谍传递了极为重要的国家机密；你也承认，每一份重要文件，你都把它摄成照相复制品，以便递交给前苏联间谍。你不是英国人，而是取得英国国籍的人。很多年来，你一直是英国政府机关(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受到信赖。所有这些不得不使法院认为你犯有背叛的罪行。你的叛变是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根据各种犯罪条例，法院判处卜瑞克42年徒刑，没有上诉和赦免权。正如新闻记者报道的，卜瑞克的整个案件被一幅神秘的密幕所遮盖着，审讯不准旁听，新闻记者每天也只许可参加8~10分钟。卜瑞克听完判决，脸色苍白，随后就失去知觉，跌倒在地。他被送往监狱医院，在那里躺了几天，渐渐地从休克中清醒过来。他也好，他的朋友们也好，都认为这种惩罚在英国来说是非常严厉的，况且，又是在和平时期。

卜瑞克的监禁和审判，使英国情报机关的声誉受到强烈影响，外交部也同样受到了这种影响。英国人不得不立即改变情报机关中的很多方面，某些部门还必须撤销。卜瑞克知道的机密大多，因而，克格勃也会了解这些机密。乔治·卜瑞克作为被判有罪的特务，送到了肯辛顿区的伦敦监狱，并被安置在“德”字区段的牢房中，那儿已经关有300多名囚犯。就这样，卜瑞克开始了持续5年的监狱生活。

1. 早年经历

无论是对遵守监狱制度，也无论是对剥夺他的自由，38岁的卜瑞克都不愿容忍，也不能容忍。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准备逃跑，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不寻常的事儿。别看这样的年龄，可他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卜瑞克的第一次逃跑是发生在荷兰，那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40年春，希特勒军队突然进犯荷兰。那时，卜瑞克在鹿特丹市的一个学校读书，对政治问题并不感兴趣。由于告密，说他是犹太人的儿子，他被盖世太保的走狗逮捕，并关进了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拘留营。

卜瑞克的父亲死于1936年，是一个相当富有的犹太人。他出生于开罗，并在那儿取得了英国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军队中服务，干得很出色，获得了多枚军功勋章。战后，他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到了荷兰。卜瑞克的母亲是一个纯粹的荷兰女人，由于丈夫的护照，就被看作是英国国民。因此，他们的儿子也把自己算作英国人了。

卜瑞克在这个集中营里，很快就有了几个朋友——英国人和荷兰人。他认为自己是很幸福的，因为在德国人轰炸和鹿特丹市大火期间，有半个城市被毁灭，3万多居民死亡。而他却得幸免于难。

“为此，我发誓要向纳粹分子报仇，”卜瑞克回忆着，“但要达此目的，我就必须逃离集中营。”

逃跑计划，他任何人都没有告诉。夜里，他利用换岗的时机逃跑了。逃往往在瓦尔思维利德的叔叔那儿去。他白天躲藏于野外，用田能找到的东西充饥，夜里赶路，尽量避开路过的汽车。

卜瑞克终于勉强走到了叔叔那儿。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稍后，叔叔就把侄儿送到一个认识的农场主那儿。卜瑞克很快地加入了地下抗战组织，积极地同德国人进行斗争。他所参加的那一组的地下工作者，专事切断电话和电报线，扎透德国人汽车的轮胎。

2. 三面应付

1954年9月，乔治·卜瑞克同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女秘书吉兰·艾伦小姐结婚。

1955年3月，他被派往柏林工作。在柏林工作的时期内，他把秘密情报和消息按时转交给前苏联间谍。他同伦敦的前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有交往，并从他们那儿接受任务。

那个年代，柏林到处都是各种情报机关的特务和间谍。在这里，卜瑞克也同西德情报机关发生了联系，当然，这是取得克格勃许可的。他按照在英国情报机关的职务，也要同美国人往来。他的办公所是在斯塔李乌姆奥林匹克大厦里的不列颠情报机关的房间里，而住所是在夏洛特登堡区。他和妻子生活得很安宁，很少参加英国人的宴会和晚会，喜爱看戏和听音乐。

英国情报机关的上司对卜瑞克的“工作”非常满意。据他们看来，他弄到了有关前苏联和克格勃的很重要的情报，有时还弄到带有略图的照片。很清楚，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前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向他提供的。同时，克格勃还通过卜瑞克的手，泄露给英国情报机关几个自己的间谍——德国人，以便英国人确认卜瑞克是一名出色的间谍和情报人员。

盟国的情报人员挖通了一条从阿尔特·格利尼克(西柏林)到拉多夫(前民主德国)的地下坑道，在这条地下坑道中安设有电子仪器，用来窃听东柏林的全部电话通话以及前苏联司令部同华沙、莫斯科往来的电话。这个“岗哨”工作了差不多9个月，1956年4月，共产党人发现了它，自然，卜瑞克是参与了这项工作。开庭时，他招认了，然而，在英国情报机关中，谁也没有怀疑过卜瑞克，虽然关于地下坑道的事，一共只有几个人知道，其中就有卜瑞克。

就在卜瑞克住的那所房子里，还居住着一名来自前民主德国的将军。他在逃往西方前，担任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长的职务，他是在1956年倒向英国人的。现在，他虽更名改姓住在西柏林，仍然担心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知道，克格勃不会饶恕叛变行为。在住所，除了卜瑞克，谁也不晓得他真正的姓氏和他逃跑的经过。通常，这位将军在城里散步，总有两名警卫跟随。可是，有一次夜里，他单独出去牵着狗闲溜，在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肃反工作人员抓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东柏林。以后，英国人打听到，将军因叛变被枪决。这是叛徒卜瑞克的义一项“功绩”。

人们计算了一下，卜瑞克在西柏林出卖给共产党人的英国、美国和前联邦德国的间谍，超过50名之多。审讯时，卜瑞克说出了在被出卖的人中间，有4名是人民劳动联盟的成员。他们从事的反苏活动，卓有成效。这4个人

从柏林失踪了，而后，在莫斯科举行了“公开审判”，肃反工作人员强迫他们“招认全部罪行”，强迫他们揭发人民劳动联盟的活动以及英国、美国和前联邦德国的间谍。关于这4个人，只有英国情报机关的一些高级官员才知道，其中也有卜瑞克。然而，就是这一次，他也没有受到怀疑。

英国情报机关介绍卜瑞克同前联邦德国间谍艾特涅尔相识。英国人认为，艾特涅尔在前民主德国有几名亲近的间谍，卜瑞克可以“改进”艾特涅尔的工作。因此把他作为马克斯·范·弗里耶斯介绍给了艾特涅尔。他们很快接近起来，成了好朋友。卜瑞克同妻子常常到艾特涅尔家去拜访，并给他们的孩子带去礼物。

无论是英国情报机关，也无论是前联邦德国的安全部门，都不知道艾特涅尔早就是一名前苏联间谍，就连卜瑞克也不知道。

卜瑞克在柏林工作了4年，克格勃命令他寻找机会重新迁居伦敦。卜瑞克对英国情报机关佯称克格勃的间谍正在威胁着他，他的“神经已经支持不住”，因此要求把他从柏林调往英国，稍事休息。

3. 身陷囹圄

卜瑞克如愿以偿，他被调到了伦敦。在一个短时期内，他又转交给了前苏联间谍好几十份英国外交部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品。

1959年9月，卜瑞克被调往英国外交部近东司，派往黎巴嫩工作。事先，他应当学习差不多一年的阿拉伯语和近东各国的历史。在此期间，卜瑞克停止了自己从事的前苏联间谍工作而休息了，在黎巴嫩享受着宁静的家庭生活。就在那个时候，西柏林逮捕了他的密友艾特涅尔，他是个前苏联间谍。在被捕前几天，艾特涅尔了解到，他的朋友卜瑞克也是给克格勃工作的。

艾特涅尔从西柏林监狱中给卜瑞克写了一封恳求信，请求帮助，乔治·卜瑞克没有复信；艾特涅尔又写了两三次信，仍旧没有回音。艾特涅尔被自己“密友”的沉默激怒了，决定对他施行报复。他要求同审理他案件的前联邦德国法官会见，向他讲述了卜瑞克的活动以及卜瑞克同克格勃的联系。艾特涅尔的这个口供被转给了英国的反间谍机关，然而，那里认为，艾特涅尔是因故要对卜瑞克报复，诱过于他，以求挽救自己。不过，英国人仍然决定要从艾特涅尔的陈述中审查些什么。然而，审查进行得很缓慢，因为，谁也不相信艾特涅尔。

就在那时，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局局长安东·阿斯特上校，带着一些文件逃到了西方。在讯问中，他告发了乔治·卜瑞克同前苏联情报机关的关系，并提供好些有关他的活动的文件。对英国情报机关和盟国的情报机关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就是说，艾特涅尔向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实话。为了不惊动叛徒，从伦敦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在认为可能的时候”，回伦敦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电报中还说，时间并不急迫，因此，他能在复活节的日子飞到了伦敦。

1961年4月3日，卜瑞克来到伦敦，在机场就被逮捕。在严密的警戒下，他被送往警察局，从那里又把他转到监狱。卜瑞克明白，他这个有三重身份的间谍所玩弄的把戏被拆穿了。英国情报机关就在那时开始准备“卜瑞克案件”，控拆他同外国情报机关(前苏联)的联系以及背叛英国的罪名，这些文件有数百页的供词。

1961年5月3日，举行了对卜瑞克的审判。英国报刊关于这个案件能报

道的，只是反间谍机关提供给他们情况。

4. 越狱成功。

卜瑞克被看作是一名重要犯人，被安置在监狱里。1965年，一个新闻记者报道，卜瑞克被安排在一间单独的囚房中。每星期日，囚犯们允许探访狱友，卜瑞克就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在自己的囚房内安排接待和组织囚犯们进行讨论。就在那时，他已打算越狱逃跑，并寻找帮手。外边来看望他的只有母亲一人。

1965年9月，卜瑞克物色到了助手，这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员，叫辛·伯克，他于1961年入狱，刑期5年。在伯克释放前一年，卜瑞克给他讲了越狱逃跑的计划，约他作为助手，当然，也答应在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并建立起“永久的友谊”。伯克在释放前7个月，就被调往专门的住所——公共宿舍，在那儿，囚犯们可以享受较大的自由。准许他到监狱附近的一个工厂去上班，以便晚上10点左右能回到监狱宿舍。

伯克利用这种条件，购买了两部袖珍的无线电发射机，它们都是使用蓄电池发射的，作用半径达到5公里。

1966年6月4日，伯克被释放了。

伯克出狱以后，就在监狱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夜里，他到公园去，在那里，躺在灌木林里用无线电同卜瑞克商量越狱的办法。

伯克为卜瑞克的逃跑准备好了一切：为卜瑞克的母亲准备了住房，觅得了生活用款、飞机票以及他和卜瑞克用来迅速离开监狱围墙的汽车……。所有这一切，他都通过无线电告诉了狱中的卜瑞克。现在，剩下的只是等待卜瑞克的信号。逃跑计划很简单，但要求考虑精确和行动协调。

1966年6月，监狱逃跑了4个囚犯，为此，加强了监狱的警备

图 13 越狱成功

队以及对囚犯的监视活动。卜瑞克和伯克都垂头丧气了，决定暂时停止逃跑的准备。不过，卜瑞克发现，他仍然被认为是狱中的模范囚犯，对他没有任何怀疑。他就继续修订自己的逃跑计划，考虑好最小的细节。

1966年10月15日，伯克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租用了一所有两个房间的住宅。

10月22日正午，伯克把自己的汽车停放在离狱墙不远的地方，用无线电同卜瑞克联络。下午5点30分，卜瑞克从囚房中出来，同其他囚犯一起，在电视机旁找了个座位观看拳击，然后，他悄悄地走到走廊的窗户前，这时下起了雨。6点30分，卜瑞克从无线电中听到：“开始吧！”伯克也不顾下着倾盆大雨，带着绳梯下了汽车。

“扔吧！把梯子扔过来！”卜瑞克喊叫着。

但是，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很多访问者乘车来到了同监狱紧靠着的医院，汽车挤满了大街的两旁。“福克斯·梅克尔，”卜瑞克用无线电叫喊着，“快给梯子！我不能再等了！从墙上扔过来吧，扔吧！”

时针指着7点，他俩都知道，狱中马上要开始点名。这时，伯克爬到自己的汽车顶上，把绳梯扔了过来。雨下得更大了。伯克知道，如果在这瞬间有人要看到他们，他们的冒险行动就要完蛋。过了几分钟，他看见了爬过围墙的卜瑞克。

卜瑞克从围墙上摔到街上，脑袋碰到了柏油马路，伯克跑到他跟前，把他拖进了汽车。血从卜瑞克的头上淌了下来。他呻吟着，伯克迅速地用被子把他盖上，发动了马达。过了几分钟，他们已经来到了住所，谁也没有见到他们走进屋子。大雨倾盆而下，现在应当如问处理掉这辆汽车，人们会注意到车号。他把车偷偷开到市中心，远离监狱那条街。把车扔在那里，而自己乘公共汽车返回来了。

晚上9点钟，两人坐在电视机前，举起盛有葡萄酒的高脚杯，相互祝贺成功，电视机里，在规定节目之外，刚刚播送了关于特务乔治·卜瑞克越狱逃跑的通告，描绘了他的外貌，悬赏捉拿。在所有的港口，在各飞机场，警察检查着离去的人。搜查逃犯的活动也在伦敦进行。可谁也没有料想到，卜瑞克已经平安地居住在监狱近旁的两个十字街口之间的一段街道内。

过了些日子，伯克写了一篇揭露卜瑞克是怎样逃跑的文章。他说，1966年12月以前，卜瑞克就住在英国，以后在三个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逃出英国，直接跑到铁幕后面去了。

伯克是作为卜瑞克最好的朋友跑到莫斯科去的，而从莫斯科回来时，他已成了最凶恶的敌人了。伯克证实，在前苏联，卜瑞克完全变了样子，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不但如此，伯克还认为，卜瑞克还极力设法要在克格勃的地下室解决他这个“不合心意的见证人”。

1970年，乔治·卜瑞克由于对前苏联的功绩，被授予列宁勋章。《消息报》为此刊载了文章和对他的访问记，他在访问中叙述了他是如何以机智胜过和欺骗自己的敌手。一些人把卜瑞克称为英雄，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叛徒，一个两面、三面特务。

伯克说：“卜瑞克生来就是一个叛徒，他不是沉湎于什么主义或者什么理想，他出卖人们，是由于他在这方面感受到某种满足……”

卜瑞克曾教授英文，并任一个学校中的谍报工作教官，这所学校是前苏联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所属的50所学校中的一个。很显然，他亨通的官运也就到此结束。被揭穿了的特务和间谍，一般说再也不往任何地方派遣，而通常就象那些用不着的东西，被抛进了垃圾堆……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活着，这就无从知道了。

教授的职业看上去与间谍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许多间谍机关都把教授作为“猎取”的目标。间谍机关的魔爪伸向了教授这个职业。

(五)他的职业是教授

1. 初识少校

1956年1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休·乔治·汉布里顿早早地离开了巴黎北约总部的办公室。汉布里顿是西方防御组织的一位经济分析学家。

一走出大门，他一眼看见了街对面那个显然是在等他的男人。汉布里顿浑身一抖，试图装着没注意到这个男人。可这个男人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冲汉布里顿轻轻一摆头，示意汉布里顿跟着他。这绝不仅仅是个邀请。这是个命令。汉布里顿服从了这个命令。

这个男人是克格勃的少校。他把汉布里顿领到了一个小咖啡馆，咖啡馆里还有一个克格勃人员，显然是负责警戒的。少校很快使汉布里顿明白他完全清楚汉布里顿在北约总部的位置和他手中掌握的机密——战略核武器，军事力量的平衡，北约盟国的政治分歧，各种武器系列的生产和性能，对东西方开战后果的估价等等。

少校的语调是漫不经心的，但其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汉布里顿应当与克格勃共享这些资料。唯一的问题是汉布里顿什么时候怎样向克格勃交送这些机密。汉布里顿没有让少校失望：下一周礼拜五中午12:30，在巴黎一个工业区的地铁站旁边。“我们在一个小时以内把所有的东西交还给您，到2点钟，您就可以把它们放回你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了。”

汉布里顿准时到了那个地铁站，少校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冒出来，接过汉布里顿手里的信封，简单他说了一句：“一小时之内还你。”等在一旁的一辆小车飞快地把这个克格勃官员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一个技术小组迅速将所有的资料拍了照。

不过40多分钟，少校便将信封交还给等候在那里的汉布里顿。“我在信封里放了一个小信封，里面有给你的酬金。”

汉布里顿打开大信封，从里面摸出那个小信封，放到少校手里：“我自己的钱够用，”他说。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应当明白，您没有义务为苏联财政当局节约。”

“我有钱买地铁票。”“好吧。两周之后，老时间，新地点。”少校说了另一个地铁站旁边咖啡店的名字。“带点有用的来。”汉布里顿在下午2点前稳稳当地回到了他的办公室。没有比当间谍再容易的了。而且，汉布里顿不得不承认，当间谍满够刺激。

在50年代之前，西方最大的前苏联间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前苏联是反法西斯的最坚固的堡垒。克格勃利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招募间谍这一招不灵了，于是便开始使用金钱和色情来拉人下水。当然，他们同时并不放过思想上的同情者。在北美，克格勃加倍努力地搜罗那些共产党员的后代或同情前苏联的人作为牺牲品。休·乔治·汉布里顿就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汉布里顿1922年5月4日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英国人——他是个出色的记者，是加拿大新闻协会在欧洲的第一位长驻记者。许多年来，他父亲一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匆匆地穿梭往返，而他和他母亲以及姐姐则一直住在法国。

1954年汉布里顿决定到法国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作个经济学家。在巴黎的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叫阿列克赛的前苏联人，是克格勃的一个军官。

1956年初，有一次他们谈到汉布里顿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出路问题。阿列克赛再三鼓励汉布里顿到北约总部去工作。汉布里顿对在军事机关任职并无特别的兴趣，只是顺便给北约总部发了份求职申请，随后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

他在巴黎大学的表现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极大兴趣，并决定授予他博士后研究奖学金。

就在这时，北约突然来找他了。他不知道他一个朋友就在北约经济部供职。这个朋友在看见汉布里顿的求职报告后便开始热心地为他张罗开了。在见了一次面之后，北约总部提出了远比伦敦优厚的条件。汉布里顿接受了。

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东方集团国家和北约各国的经济情况：优点和缺点，潜力和局限。汉布里顿正式和非正式得到的数据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十分有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了北约政治家与军事会议讨论的主要材料之一。因为轻易便可接触到最高机密，汉布里顿常常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中心并扮演着主宰世界的角色。

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这次选择是选对了。

汉布里顿很明白与前苏联人的交往，甚至以前的交往，都会马上危及他接触秘密的权力和他的职位。因此，他写信警告他的双亲无论如何不能向任何俄国人——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提及他的职业。然而，克格勃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他没有意识到从第一次递送资料起，他就开始与敌人合作，与敌人勾结起来了。

接连好几个月，克格勃没有施加任何压力，只是简单地接受他递交的东西。但是，1957年夏天，克格勃感到能够向汉布里顿施加一点压力，让他弄出点真货来了。

汉布里顿知道如果拒绝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再次接头时，他乖乖地拿出3份秘密文件权1份绝密文件。克格勃在汉布里顿身上坚持耕耘了7年，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克格勃总部为此特地在巴黎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汉布里顿。

2. 秘密接头

在汉布里顿和阿列克赛接头点不远的地方总有一辆黑色的大型行李车停着，表面上在进行流动摄影器材服务。就在这辆车内，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在10分钟内可以拍摄100页文件。1958~1959年，许多有关西方生死存亡的文件都在这辆行李车里接受过洗礼。

汉布里顿再三拒绝接受酬金，这使克格勃确信他是个马克思主义信徒，或至少对前苏联怀有十分的好感。克格勃明白现在汉布里顿已经不能拒绝与他们合作了。但是，汉布里顿再三拒绝接受酬金，还有他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的傲气使克格勃明白，与汉布里顿打交道必须十分小心。

阿列克赛与汉布里顿接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接头时间越长，风险越大。1958年，汉布里顿与其妻子宣告离异，于是，阿列克赛建议汉布里顿偷偷学习密码与莫尔斯电码。

1960年春天，阿列克赛告诉汉布里顿为他准备了一套新的联络办法。克格勃专家为汉布里顿专制了一部无线电台，看上去象台普通的录音机，而且是标准的法国产品。汉布里顿只需在特定的时间移开录音机部份，调到特定

的频率，指令便被录制下来了。汉布里顿再往上擦一小撮黑色药粉，便显现出5个数字一组的密码。然后，汉布里顿找到手边专用密码表便可以很轻松地译出指令。

克格勃还决定，从那时起，汉布里顿将资料带回家中，自己拍摄下来，然后按指示将胶卷放入指定的克格勃秘密邮箱里。他只需要表明已收到指令并说明自己能否执行该指令，其方法是向日内瓦的一个地址寄不同的明信片。接头两三年安排一次，而且尽可能安排在法国之外。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他可以拨一个克格勃专用电话的号码找“冯塔纳先生”。

“这一切都是为你特制的，”阿列克赛严肃他说，“你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你不不断升级。你对此有何想法？”“我想我可能会升级”，汉布里顿说。

他没告诉阿列克赛，他也在盘算着摆脱克格勃的控制。

图 14 秘密接头

汉布里顿终于反抗了。1960年5月的一天，他们打电话要求紧急会晤。从大雨滂沱的接头地点跑进一家咖啡店之后，他对阿列克赛说：“北约总部正在对我进行忠诚审查。”这是一句谎言。

“出了什么事？”阿列克赛如临大敌地问道。

“我在渥太华的姐姐偷偷去了一趟古巴。有些西方情报组织发现了她的行动。”

“就这些吗？”阿列克赛追问道。

“目前就这么多”汉布里顿说：“至少，我的上司说我个人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阿列克赛顿时非常沮丧。正因为抓住了汉布里顿这条大鱼，他才能在巴黎一直呆了5年。这是克格勃对西方最成功的渗透之一。“给我们一个礼拜时间，我们会找到办法的。”分手时他说。

再一次接头时，阿列克赛带来的办法令汉布里顿万分惊恐。“我们希望你到苏联来，通过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北约破坏和平的罪行。这将轰动整个世界！你可以用你会的所有语言发言，全世界人民都将信服你。你还可以引用你自己的那些文件。你学会俄语之后，你可以任选一个苏联的大学进行你的研究和写作，并为苏联政府提供咨询。”

“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汉布里顿说，竭力掩饰他的不安和惊恐，“不过我想，如果我留在西方工作，会对苏联更加有益。伦敦经济学院对我的邀请还有效，我想在他们改变主意之前拿到这份奖学金。”

如果汉布里顿离开北约总部，那克格勃便无法象从前一样牢牢地控制他了。到那时一切威胁都将变得无力。汉布里顿静静地听着阿列克赛急促的呼吸声。最后，阿列克赛终于决定放弃原计划：“好吧，我们可以再见一次面。我们要收回无线电台、密码表和唱机，请把它们装进一个小手提箱中。”

1961年，最后一次接头时，阿列克赛又亮出了很多钞票，但依然被汉布里顿拒绝了。在获得自由的喜悦中，他忽略了阿列克赛的一句话：将来再联系。阿列克赛还说，在巴黎一条街拐角的地方，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中午，汉布里顿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接头人。

汉布里顿只需隔一段时间去一次伦敦，他决定住在西班牙的科斯塔——布拉法，有事就乘火车经巴黎去伦敦。几个月过去了，汉布里顿从良心的自

责中恢复过来。这里的生活舒适安宁，几乎可以说太安宁了。从伦敦来的火车晚点了。他这一次错过了从巴黎到巴塞罗那的班车，只好在巴黎过夜。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忽然想起这是 1962 年 5 月的第三个礼拜三。“我很怀疑他们是否会真在那里等我，”他想。

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竟然去了接头地点。

“真是叫人惊喜交加！”接头暗号对上之后，那个克格勃官员低呼道：“要知道我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都在这里翘首以待。我已经待了整整一年了。现在，谈谈你下一步的打算吧。”

汉布里顿说他的博士论文要到 1964 年春才能完成。他表示他深信自己在获得学位之后能够在—所著名的加拿大大学中找到经济学教授的职位。

“好极了！”那个俄国人说，“如果找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会助您一臂之力的。”

在其后的两年中，克格勃没来打搅汉布里顿。1964 年暮春，在巴黎的一次接头中，他告诉俄国人他已被魁北克的拉法尔大学聘为教授。

1964 ~ 1967 年，汉布里顿曾三次在一辆停在渥太华中心邮局前的小车里与克格勃官员会面。在第三次会面时，那位官员希望汉布里顿能发展一些有希望为克格勃服务的人材，尤其是拉法尔大学的职员和学生。他还希望汉布里顿能设法到加拿大外交部任职。但是，汉布里顿丝毫不想放弃他在学校里蒸蒸日上的事业，也不想与加拿大的国家机密有什么牵连。同时，在同事与学生中为克格勃招募新兵困难也很大，于是他索性停止了接头。

18 个月后，焦急的克格勃终于忍耐不住了。克格勃北美小组的头子、克格勃中校鲁道夫·赫尔曼终于亲自出马。鲁道夫是个和蔼友好的人，汉布里顿发觉他知识渊博、头脑灵活。他们常常可以热烈地讨论拉美艺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或怎样把漂亮的娘们儿弄到手。

“你知道休斯敦学院吗？”有一天，鲁道夫突然问道。

“知道。”

“你的一个长期任务是：进入休斯敦学院。。”

“怎样进入？”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进入休斯敦学院并准备一份有关中国经济的详细报告。”

“可我从哪里搜集有关中国的数据呢？在这个酒家吗？”

鲁道夫说：“发挥你的想象力。”

汉布里顿只有遵旨。他写信给台湾驻加拿大的机构，要求对方帮助他研究中国经济。台湾方面的反应是寄给汉布里顿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反共宣传品。要从这些宣传品中找出一些事实是太难了。但汉布里顿别无选择，于是闭着眼睛用那里面的“事实”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了鲁道夫。莫斯科认为这篇文章“漂亮极了”，因为文章里满是俄国人爱听的东西。

1970 年 4 月，鲁道夫告诉汉布里顿，如果一切顺利，两周之后在渥太华将有“大人物”会见他。

汉布里顿在渥太华接受的指令明确而不容考虑。他必须想办法在夏季去以色列搞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他还要利用公开渠道搜集核武器制造所必需的各种资料。在去以色列的途中，他应在维也纳停留以等待指令。

于是，汉布里顿便开始四处扬言将在夏季去中东研究某个专题。经申请，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表示愿向他提供运用图书馆资料等一切便利。

3. 到以色列去

1970年6月初，他遵照指令在维也纳停留并很快与克格勃接上了头。他的新联系人自称波拉。

他告诉汉布里顿，他在以色列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弄清以色列是否确实已造出了原子弹；如果已造出了核武器，那么以色列人是否会在未来的中东冲突中使用核武器。

“这可是个令人为难的命令，”汉布里顿评论道。

“你以前完成过很多比这困难的任务，”波拉说。

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所有的职工和同事尽心尽力地为汉布里顿的研究提供方便。汉布里顿立刻为克格勃的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但是，要搞到有关核武器的具体真实的情报，却又另当别论了。汉布里顿再三询问有关当局他在这个弹丸之国的旅行有何限制，终于弄清楚了不允许他进入的地方。通过阅读大量的图书馆资料和与以色列人旁敲侧击的会谈，他弄清了在禁止进入的地区有些什么设施、该地区的最大能量供应力和最大运输能力，而且，还意外地得知在该地区有些非常优秀的专家在工作。

此外，他还调查了那些与南非有关系的以色列人，他认为他们有可能知道核武器的实情。到了8月初他离开以色列去维也纳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波拉开始读汉布里顿的报告时，脸上带着和鲁道夫·赫尔曼一样的礼仪性的微笑，可一读完报告，他就乐得手舞足蹈。报告证实，在南非技术人员的秘密帮助和大量窃取了美国核技术之后，以色列已经制造出了一些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色列的核武库将越来越大。如果在未来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面临崩溃，它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

“这些情报准确吗？”波拉问道。

汉布里顿详细陈述了使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所有资料来源。

“妙极了！这报告会震动莫斯科。”波拉赌咒发誓地说。

1975年6月，汉布里顿按照指令来到维也纳，等待波拉。在约定的四天中，他每天都在指定地点等足了预定的接头时间：5分钟。可不仅波拉没有来，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来与他接头。他给奥地利的联络地址写信告知他已离开，将在8月15日再来维也纳。

8月中旬，汉布里顿第二次到维也纳，见到了波拉。“祝贺你将去莫斯科。”波拉低声说。

“什么意思？”

“你明天启程去莫斯科。有什么别的事吗？”

4. 间谍训练

汉布里顿并不愿意去莫斯科。他害怕俄国发现以前关于北约对他进行忠诚审查的谎言，但他更害怕拒绝去莫斯科会使克格勃认为他心中有鬼，从而导致更大的灾祸，所以最后他终于满口答应去莫斯科。

两位克格勃官员开着一辆挂有外交牌照的黑色豪华小轿车护送汉布里顿越过奥地利边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他换乘一架图波列夫飞机，飞机里有很多前苏军士兵和便衣保护他。在波兰降落加油之后，汉布里顿被飞机最后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军事基地。

一辆黑色小轿车疾驰过机场直至机舱口，一个衣着考究的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疾步上前迎接汉布里顿。

“我叫巴维尔，”他用很重的美国口音说着英语，“抱歉，让您久等了。您应该得到更隆重的欢迎。”

在曙光中驶向莫斯科时，巴维尔彬彬有礼的谈吐使汉布里顿确信克格勃让他来前苏联毫无恶意。“您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强化秘密训练，将来任务讨论会，还有高级会晤，最高级的会晤。我们还希望你认识一下莫斯科，并在列宁格勒呆上一大。这三周可够您忙的。”

汉布里顿说：“我不能呆三个礼拜。月底前我必须回学校，要呆一周都很困难。”

巴维尔用俄语咕噜了两句什么，然后用英语说：“我们只好尽力而为。不用担心。这不是您的责任。”

汉布里顿下榻于莫斯科西北部的一幢高楼里。他拥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饭厅、二间卧室、还有浴间和厨房，按莫斯科的标准是相当豪华了。

冰箱里装满了佐治亚州的葡萄酒、伏特加、鱼子酱、大马哈鱼以及其他汉布里顿叫不上名字的食物。

巴维尔说波拉和其他的教官将每天早上来给他上课，有一辆带司机的小轿车随时为他服务。在不上课的时候，汉布里顿可以随意到莫斯科街头游玩。

可是训练课根本就没给汉布里顿剩下多少时间。一个技术人员教他使用一种化学药液密写的具体方法。这种密写液将由克格勃给汉布里顿送到加拿大。另一位技术人员教他跳伞的技术、怎样掩藏降落伞以及辨认空降信号的基本概念。

一天早晨，两位技术人员给汉布里顿带来一个卫星短波接收器和一个很灵巧的附件，他们称之为“鲁米纳”。这东西看上去象个灰色的金属小盒子，长 2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5 厘米，顶端有两个小小的液晶显示块。一个技术人员把“鲁米纳”塞进接收器，叫汉布里顿看。突然，液晶显示器发出五颜六色的光亮，然后一连串数字不断地在液晶面上掠过。技术人员解释说，中心的特殊呼叫会使液晶面出现这样的显示。汉布里顿要做的就是录下出现的数字，然后用密码表译出这些数字。克格勃的专家们专为不喜欢莫尔斯电码或接收莫尔斯电码有困难的重要间谍发明了“鲁米纳”。“鲁米纳”没有声音、简单且没有大气层的干扰。汉布里顿很快认识到，任何谍报人员一眼便能看出“鲁米纳”的用途和优点。

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巴维尔说：“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将和我们共进晚餐。他对您关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很感兴趣。希望您象往常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您的观点。”

汉布里顿早就预感到这一次准会有克格勃的头面人物出台，因此他对这位客人并不特别感到神秘。第二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脸色疲倦的俄国人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三个随从，其中两个身材魁梧的显然是保镖。汉布里顿泰然自若。这位客人并不十分热情，也未做自我介绍。他一直讲英语。汉布里顿感到这位客人一定受过很好的英文培养，因为他的语调和句法都很地道，但有时他要问他的随从一个他想不起来的英文词或者随从主动用俄语为他做解释。

人们都离开后，汉布里顿问单独留下来的波拉这位客人是谁。

尤里·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来访之后的第三天，波拉带来了新的命令。“我们希望你能在纽约或华盛顿找到新的职位。同时，最好能寻找途径与休斯敦学院建立一些业务联系。”

又是让他去美国，又是克格勃主席会晤，又是尖端谍报设备“鲁米纳”，这一切都使汉布里顿深切地感到现在自己已经卷入了危险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间谍活动。一旦到了纽约或华盛顿，再想保持目前这种间谍艺术爱好者的身分显然将不可能。间谍活动将不再是一种智力游戏。除了他自己的生命和西方文明的繁荣之外，他还不想用自己的事业和名誉去冒险。

现在他一心想的是赶快离开沉重而充满危险的前苏联，这里的气氛会使他发疯。就象一个人想离开眼镜蛇又绝不想招致它发怒一样，汉布里顿小心地告诉波拉：“从个人来讲，我非常愿意定居苏联。可我已离开学校和自己的工作整整一周了。魁北克的人们都在等着我回去。再呆几天会引起他们的猜疑。还会有机会来苏联的。至于任务，我尽最大努力去完成。”

由于莫斯科之行的阴暗印象，汉布里顿开始忽视克格勃的指令了。他没有去渥太华进行预定的接头。但 1976 年 8 月底，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使他不得不去一条郊区公路的旁边的“信箱”里收取一份“资料”。

“资料”是一支圆珠笔，笔里装有胶卷，胶卷指明了蒙特利尔附近的“信箱”和在渥太华接头的地点。另一个命令指示他到蒙特利尔郊外的一个“信箱”里取出一份密码表和一个卫星接收器，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装以适用于“鲁米纳”。

5. 单独的小轿车

1977 年 1 月，汉布里顿驱车前往蒙特利尔一个停车场，在指令中指定的地方把车停下。几分钟后，一辆小车停在他旁边，一个圆胖的男人下了车，打开汽车后盖，取出车用电池。汉布里顿愉快他说：“嘿，你好！”好象背后有只猎豹在追他，这位克格勃特工抱着电池跑了过来。汉布里顿把电池带回家，然后就可以试用他的“鲁米纳”了。

他把无线电的频率拨到礼拜一联络的地方。几乎是立刻，“鲁米纳”便亮了起来。第一份录制下来的指令是询问他 1977 年夏天能否去下列地方旅游：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或以色列。第二份指令是询问他什么时候能在维也纳接头。第三份指令询问他与休斯敦学院的关系有无进展以及他是否已在美国谋到职位。他告诉克格勃说，1977 年夏天他将去墨西哥参加一次学术大会，因此无法去中东或欧洲。他还说，他暂时还没能接近休斯敦学院或在美国谋到职位。

到了 4 月，“鲁米纳”又传来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使汉布里顿感到困惑和紧张。指令问他是否能采取与在以色列同样的方法来探明南非是否已制造出核武器。克格勃明明知道他在南非根本无法得到象在以色列一样的便利条件。如果克格勃的三个军团：间谍军团、科学家军团和卫星摄影专家军团都无法探明南非的核秘密，他单枪匹马又能创造多少奇迹呢？

可为了应付这个混乱的局面，他只得试一试。在以色列，汉布里顿对南非技术资料和生产力有了一些了解。通过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与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频繁交换信息，汉布里顿开始研究原子核的增殖，从而开始执行指令中要求的调查。5 月底，汉布里顿结束了他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南非已搜集到足够的技术资料和原料，足以制造出一个爆炸力超过投在日本长

崎那颗原子弹的核武器。他认为，南非政府的民族情绪与政治需要都要求迅速制造出原子弹。在报告的结尾，他认为南非将在几个月内制造出他们的头一枚核武器。

他将报告拍成胶卷，用塑料纸包上，塞进安大略省圣卡斯莱因城郊一根电线杆旁的一条石缝里。然后，等到约定的时间，他开着车到1英里外的另一根电线杆。如果报告已被取走，这根电线杆上会有一个粉笔写的记号通知他。

他发现没有记号，他立刻飞车驰回放置胶卷的地方。刚到地方，一辆轿车从他身旁疾驰而过。他记起了在莫斯科受训时一位教官的忠告：如果在接头地点附近发现单独的小轿车，那就要小心。如果是很多轿车，那没什么危险。单独的小轿车本身就很危险。在回家的途中，他在汽车的烟灰盒中烧掉了胶卷。后来，他用密写法汇报了关于南非的报告。

1978年5月，汉布里顿启程前往维也纳，去进行预定的接头。

在维也纳，他和波拉谈了整整3个小时。“你的首要任务，”波拉说，“是改变你的休假年，这样以便在华盛顿或纽约呆上一年。我们为你支付一套房间的钱，不管多少。我们希望你去美国。这个夏天最好离中东远点儿。秋天去美国吧。”

“我尽力而为吧。”汉布里顿虚晃一枪。

不久以后，汉布里顿给克格勃写了一封密写信，表示加拿大校方不同意改变早就制订好了的休假计划，所以1979年他无法去美国。

6. 自食苦果

1978年11月中旬，他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乔治：我妻子和我12月底想邀你到维也纳共同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这封信的意思是让他下周礼拜一去维也纳接头。

维也纳的天空愁云密布，一场暴风雪的余威在大街小巷肆虐。汉布里顿抬脚进了停在一家餐厅门前的小轿车。几秒钟之后，一辆巨大的载重汽车一直开到小轿车后保险杠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这辆汽车没有牌照。同时，另一辆同样的大载重汽车出现在街对面30米的地方。

然后，一群群的人出现在四面八方。汉布里顿知道，这些全是克格勃的人。

一眨眼，波拉跳进了轿车的前座，他简短地说：“就在这儿谈。”他神情紧张地转过脸来：“有人跟踪你吗？”

“我想没有吧。不过我没有十分留神。”

“你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你从不留神，”波拉突然截住话头，欣赏着这些话给汉布里顿带来的焦虑与惊讶。

“出了什么事？”

“情况很严重，你发出的信被秘密警察检查过。你很可能已被监视。当然也可能没有，但你必须设想自己已被监视。我们得到情报说西方特工界正在清查像你这样有可能卷入间谍活动的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你停止一切活动。所有的任务都取消。你可以到我们国家来，或者留在西方……”

“你说什么？到你们国家？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这要你自己来选择。反正东方永远欢迎你。如果留在西方，你就得靠自己。无论如何，停止一切活动。”

波拉递给汉布里顿一个白信封：“这里面的钱也许能对你有所帮助。谈话太久是危险的，如果决定留在西方，马上离开维也纳。”

波拉没有道别便消失在暮色中。回到旅馆房间，汉布里顿打开信封。看着信封里的5000美元，汉布里顿无声地笑了。大概估算一下，从1956年起，他每月从克格勃得到10英镑的活动经费。

1979年的春天和夏天，汉布里顿一直呆在欧洲。他一点也没感到自己已被监视或审查。也许，这次是克格勃错了？

回到加拿大拉法尔大学之后，开头几天似乎也一切正常。

但在1979年11月某一天，他的门铃终于响了。“汉布里顿教授吗？”一个很高的男子问道，身旁站着4个伙伴，“我们有法院的搜查证。可以进来吗？”

这些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特工人员很快找到了“鲁米纳”。“您能说明这东西的用途和它是怎样到你手中的吗？”一位特工问道。

波拉没有错。西方特工界对有间谍嫌疑的人进行了彻底清查。克格勃和汉布里顿犯的错误是认为汉布里顿会幸存下去。早在1977年5月，鲁道夫·赫尔曼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加拿大人从那时就知道汉布里顿是个特务。不过，他们决定放长线钓大鱼，除非他的活动会危及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双重间谍计划——发挥赫尔曼的作用。随着“赫尔曼行动”的结束，加拿大人与汉布里顿的蜜月便也宣告结束。

赫尔曼的证词言之确凿地证明汉布里顿是个前苏联间谍。不过，除了他交给前苏联人的北约文件中涉及加拿大的部份之外，他没有向前苏联人透露过任何其他加拿大政府机密。

他也没有进行过违反加拿大法律的活动。加拿大政府首脑担心根据加拿大法律也许给汉布里顿定不了多大的罪名，因此，他们决定抓住汉布里顿与前苏联克格勃的关系不放，要想查清每一细节。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调查结果清楚地向西方展示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克格勃对西方进行深度渗透的秘密行动。

一些加拿大调查者明白，汉布里顿自己是他与克格勃合作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他专心致力于他的专业，则他一定会做出惊人的成就，自然也就会获得他日夜渴求的荣誉和名利，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汉布里顿很有可能成为明日经济学界的领袖之一。可是，他陷入了克格勃的罗网而不能自拔，于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当年夏天，审讯结束之后，汉布里顿询问加拿大当局他是否能去美国和英国旅游。当局告诉他，联邦调查局也许会以外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他，而英国人则非常乐意以官方的名义正式逮捕他。

尽管如此，汉布里顿1982年6月还是乘飞机去了伦敦。也许他认为时间已冲淡了他的过去，或者英国人已经忘了他。

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忘记他。英国秘密特别法庭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生的任何针对英国的间谍活动都视为有罪。

1983年，汉布里顿以60岁高龄被判入狱，刑期10年。为了使他间谍活动的最大受害人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他将在英国的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克格勃的间谍经常叛逃到西方。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这些叛谍并

不是个个都喜欢的，在中情局人员眼中叛谍是有等级之分的，他们多半获得照顾，有的甚至可以拿到一大笔钱，但有的在失去利用价值后，他们的命运却十分凄惨。

(六) 一个叛谍的路

1. 上校叛逃

1986年1月的一个黄昏，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并肩漫步在雅典市郊。比较高的那个人，身材壮硕、红发宽脸、头顶半秃，讲一口流利但外国腔很重的英语。他名叫维克多·甘达瑞夫，是前苏联克格勃的上校，他说他想投奔西方世界。

和维克多·甘达瑞夫同行的是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办事处的主任大卫·佛登。佛登不仅是中央情报局中的老手，而且是前苏联情报的专家，在外放雅典前一直是中情局前苏联东欧部门的主管。

每一个中情局的人都梦想有高阶层的前苏联官员“过来”，而甘达瑞夫不仅是位上校还是克格勃雅典办事处反情报及安全部门的主管。佛登按照规定希望甘达瑞夫继续待在他的岗位上成为美国的间谍，但甘达瑞夫一口回绝了。

佛登说他得向上级请求。第二次秘密会面时他告诉甘达瑞夫一个好消息。佛登告诉他，中情局会把他弄出希腊，这项行动的风险很高，但成功之后他就可以在美国过他的新生活，并获得一个新的身份。佛登给了他一个在雅典的电话号码，以及一个当做密码的名字，让他在打电话时用，并向他保证，其他的事中情局会处理。

但是，3年过去了，甘达瑞夫仍未获得合法的身份，以致他和家人无法在美国社会光明正大地求职、就业，过正当的生活。因此他对中情局非常不满，并且认真地想到再度变节，重回前苏联的怀抱。

1990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给中情局长韦伯斯特，结果却有如石沉大海。他在信中说：“我得到的只是承诺、拖延，这些都是我之所以从苏联逃出来的相同问题。在美国呆了3年之后我的结论是，想借中情局之助逃出来的人应三思而行。”

甘达瑞夫怨愤难平地向美国一位专栏作家透露，中情局拖拖拉拉地过了两年还不给他一家人绿卡和社会安全号码，他们搜查他的财物，窃听他的电话，答应给他的金钱赔偿少了一万美元。他说，中情局要他个要把他的事透露给新闻界，但他不吃这一套，他要让中情局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他甚至还打电话给前苏联大使馆，希望和前苏联官员见面，以打听他如果回前苏联的话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他想会受军法审判，只是不晓得刑期如何。

他和那位专栏作家在电话中谈了好几次，讲了许多事，显然中情局也发现事态可能会向另一方面演变。

1985年，曾发生过一起克格勃间谍叛逃后又返回莫斯科的事件。那次的主人翁是一个叫威塔里·尤成科的克格勃负责北美地区间谍业务的官员。他在1985年8月向美国投诚。但3个月后，他从乔治城的一家餐厅中摆脱了中情局监护他的人，两无后又极戏剧性地出现在前苏联大使馆，召开一场轰动一时的记者会，说他遭到美国情报人员的绑架，然后搭机返回莫斯科。他的反复变化令中情局非常难堪，中情局因而答应美国国会将吁好整顿其安置投诚人员的作业。

图 15 上校叛逃

2. 前途未卜

投诚者是美国情报部门及政府的重要情报来源，他们可提供前苏联武器、外交政策及对西方国家的情报作业等宝贵资料。他们还可能带来可破获美国政府内间谍的重要线索。例如尤成科就供出隆纳·培顿和爱德华·霍华是前苏联间谍，前者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任职，后者在中情局。他们身份暴露后，霍华逃往莫斯科，培顿则以间谍罪被判无期徒刑。

尽管投诚者很有价值，但是 20 年来中情局里负责处理这类业务的人对投诚者却常常怀有矛盾的心态，不能决定他们是真的投诚，还是前苏联派来的反间谍。尤成科事件就是中情局对前一案处理不当所产生的后遗症。因为在尤成科之前，有一个叫尤里·诺森科的克格勃人员于 1964 年向美国投诚，但其后 3 年多的时间，诺森科一直处于被严密拘禁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牢房里。中情局的人反复审问他，想证实他是反间谍。但他们一直未能找出破绽。在这之后，他们就一反过去的做法，避免侵犯投诚者的人权。因此，尤成科才能毫无阻拦的摆脱中情局的监视。

中情局对投诚者个人生活未来的关切远不如对他们可能带来的情报那样重视。好几个先后投奔美国的人都抱怨说，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就被弃若敝屣了。

投诚者在中情局人员眼中有等级之分，多半的前苏联情报人员都会受到妥善照顾，有的会拿到一大笔钱，但有的则可能沦为洗碗工。中情局里有许多人都认为投诚者是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这种人是不能再信赖的了。

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投诚者的心理，不过美国的一位老情报员指出，几乎所有的投诚者都很聪明、很有雄心，但在工作上却不顺利，夫妻感情也不协调，甘达瑞夫是带着他的儿子及儿子的女老师一起逃到美国的，他叛逃的动机除了私人的原因外，大部分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我比戈尔巴乔夫还早就想在克格勃里推行改革。”

1990 年 7 月 29 日甘达瑞夫真的在美国国务院里和前苏联官员见了面。前苏联大使馆的公使契维里科夫要他回去，并保证不会为难他。他说他要书面的保证，于是托这位公使将他的亲笔函转给戈尔巴乔夫，问他们军法审判可能的结果，并解释他叛逃的原因。在 1 小时的会谈中，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个俄国人及三个美国政府的官员。

这次会谈之后，甘达瑞夫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如果重返前苏联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克格勃会轻易放过他吗？如果在美国继续住下去，得不到信任的日子是没有尽头的。他的心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叛谍的路究竟有多长？

五、无奇不有的间谍工具

在十字坡酒店，武都头被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翻”，差点儿做了包子馅儿。在现代间谍战中，蒙汗药(麻醉剂)仍在发挥着作用。现代科技的最新成就也都被用来制造和改进间谍工具。从蒙汗药到星载遥感器，现代间谍工具无奇不有。

这里只对几种间谍工具略加介绍。

(一)第三只耳朵——寻幽探秘的窃听器

1969年3月的一个早晨，美国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一个保安人员，使用一个特制的无线电监听机，对大使馆进行常规检查，突然他听到两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讲话，其中一个人是使馆的重要官员。于是他走进那外交官的办公室，递了一张条子给他，上面写着：“走出办公室，继续讲话，但要把握住你讲的内容，因为你现在正在广播。”他走出办公室后，外交官仍然在作广播讲话，于是可以肯定窃听器就在外交官身上，但检查了好久，仍未发现。最后，保安人员要外交官脱下皮鞋，拆开检查，发现左脚的鞋稍重了一点儿，原来窃听器就藏在外交官的鞋跟里了。追查下去，发现几天前大使的女仆拿这双鞋去修理过，特务就在鞋上做了手脚，装上了一个发射力很强的窃听器。

1. 窃听器的基本构造和应用

窃听器，英文为“BUG”，和“臭虫”是同一个词。在间谍的目标内外，窃听器真好比夏天的臭虫，无处不钻，防不胜防。

窃听器基本上是由传声器和发射机组成，也许再加上一副录音机。传声器可以经过伪装，放在一个地方，或利用电话机一类的东西预先暗藏起来。

传声器的种类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它们的基本功能都是相同的，即搜集音波并把它们转变为电脉冲。如有一种探针式传声器，状如长针，把它放进墙上预先钻至近乎穿通的孔穴中，它便能将声音引起的震波搜集起来。这种传声器还可以镶嵌在一条塑料软管里，塞到锁匙孔或电线、水管内。又如滴状传声器，它有着高度的灵敏性，能够被隐藏在房间内电话接线匣里、散热器后面、吊灯的盖罩里，或者空气调节器的导管里。接触式传声器不需要直接的气流导入声波，当它破附在墙壁上或窗户上时，发出的声波撞击窗户、墙壁，就发生震动，这样也就传入了传声器。

这些传声器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够直接与扩音机或录音机连接起来，或者放进微型无线电发射机里去。这种发射机能够制成象火柴盒那样大，里面藏一部高度灵敏的传声器，必要的无线电电路、一根天线、以及一个供电器——可能是一个长寿电池。整个设备又可以接上现场的电力装置，以便持续长期发挥效能。

有种超短波无线电传声器，体积比火柴盒大，使用一种寿命约1500小时的特种电池，用尽后可以更换。它的有效距离约300米，频率可以利用一只螺丝调频器来调整，任何有效的超短波收音机都可以接收其信号。这种传声器的机身部件，全部用矽橡胶浇铸，故可防震并可抵御炎热的天气条件。这种传声器的经过改进的型号，可以藏在一个火柴盒里，只要能够装上一根天线，传送距离能超过1000米。另一种型号附有一个吸头装置，能够迅速容易地贴在墙壁上或窗户上。这种高度灵敏的传声器在目标房间时搜集谈话声或别的声音，并把它们传送到1000米以外的地方。

窃听器可以预先暗藏于一些极普通的日常用品内。有一种装有微型件的圆珠笔，书写时能够搜集、扩大周围的人所说的一切并把它输送到装在100米以外的收话器去。每当这种圆珠笔的笔套被拔下，套到笔的另一端上时，窃听装置就开动起来了。这种圆珠笔有两个可以替换的钮状电池，能使用70个小时左右。另有一种装置，可装在一个漂亮的气体打火机里面去。它可以

搜集并输送谈话声到 300 米以外的地方去，使用 3 个钮状电池，可以工作 24 小时。如果使用特制的电池，则使用时数可以增加至 1000 小时，但输送距离则缩减为 100 米。频率也是可调的，当打火机靠一边平放时，里面的水银开关可自动将电源截断，把打火机拿起来直放，它就再次开动了。

有一种装置是把“传声器——发射机”装入一个外观悦目的瓷灰缸内。传声器可以通过转动烟灰缸，使底部的水银开关活动或开或关。它可输送到 250 米远的地方，并可一口气工作 150 小时。

在户外空地上，当没有墙壁、门窗可供利用时，有一种特别的定向传声器可供使用。这种装置也叫做弧形远程传声器或枪管式传声器。它有一个 50 多厘米长的“枪管”，用来指向目标地点，其距离可达到 75 米远。从一座邻近的建筑物上，或者一个敞开的窗户里，情报人员可以把传声器的“枪管”指向人群中正在交谈的目标人物。收到的声音用一个附在传声器手柄上的晶体管扩音器扩大，并用一对听筒来听。如果需要保持确切的记录的话，这种装置可以附在录音机上。在大多数装有电话的办公室和家庭里。间谍没有必要把一个“外来的”传声器引进目标房间里，因为那个电话机即可供利用。

50 年代中期，前苏联就研制成功一种叫做“ ”的窃听器。它的体积只有火柴盒大小，能象 样粘伏在目标上，隔墙收听到屋内的各种声音，它的发射能力很强，在半径 5 公里的范围内，都可以收到它发回的窃听声音。1956~1960 年期间，西柏林的一些重要建筑物上及法国等西欧国家都曾发现过克格勃巧妙地安放的这种窃听器。后来，前苏联又发明了一种叫做“Kg”和“KGR”的窃听器，它更加小巧玲珑，只要把它偷放在房间任何一个不被注意的地方，如烟灰缸里、花瓶里或是挖空了的桌脚里，它都能照样拾音。1976 年潜伏在美国的前苏联间谍“千面人”阿贝尔上校，在他向莫斯科总部发回的秘密情报中说：“苏联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使用 Kg 和 KgR 已获得光辉成果。”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制的“独角仙”窃听器，据称具有世界最高的窃听效能。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在一片混杂的音响中，只把它需要的某些人谈话声音加以收录，而自动排除它不需要的其他音响。

日本有几十家生产窃听器的工厂，利用集成电路技术，生产超小型、高性能的窃听器。有一种窃听器的体积只有火柴盒的 1/4，装在房间的角落里，可以听清 20 米以外的窃窃私语，并能转换成电波向外发射，100 米以外的调频收音机就可以收到。有一种墙上话筒，用吸盘吸在墙上可以清楚地听到 20 厘米厚水泥墙壁另一侧的谈话。还有一种放在电话机下的窃听器，用电话线作天线，将通话内容转换成调频电波发射出去。

有些国家能够制造出象针尖那么小的送话器，可以把它们安放在墙壁、天花板、椅子或个人衣服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些送话器不需要电线就可以把微波信号发送出去。大楼外面的设备可以接受到微波信号。它们可以遥控，也可以利用热、辐射、声音颤动或压力来启动，安放在椅子上的窃听器则可以在有人坐下时打开开关。

较新的窃听器可以在大约 15 秒内把有关资料记录下来，然后在一微秒内一下子把所有资料统统传送出去。除非在这一微秒内监听装置正好向窃听器发射了微波，否则窃听装置是不会被发现的。

窃听器还可以藏在电子打字机、印刷机和类似的机器里。它们可以得到和传送每个按键发出的电子信号。在大楼外面接收信号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读

到文件，就像亲眼看着打字员在打这份文件一样。

一种使窃听器难以发现的方法，是掩盖它发射的无线电频率。这只要在它传送资料时使用同标准电台和电视广播非常接近的频率即可。另一种方法是“频率跳跃”，即：在一毫秒内以一种频率发射，在另一毫秒内以另一种频率发射。

特别难以发现的是那些不通过无线电传送信号的窃听器。它们是用“电线”同大楼外面的监听站连接。这种连接“电线”可以是一切能够导电的物体：房间表面涂料里面的一层含金属粉涂料、普通电线，甚至调节空气的通风孔。

2. 借助动物布设窃听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出现，利用昆虫运载超微型窃听器具进行情报活动已不是什么奇闻了。早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就曾用飞机把臭虫撒在北越的丛林中，用它来发现北越军队的集结地点。臭虫对人体的汗味特别敏感，当它嗅着汗味爬到越军官兵身上吸血时，它背上的超微型发射器就发出信号。美中央情报局还曾用苍蝇运载窃听器，进行情报活动。他们把一种安在硅片上小如针头的微型集成电路做成一个超微型的窃听装置，粘在苍蝇背上，苍蝇通过房门上的钥匙孔或通风设施飞进戒备森严的办公室或会议室，去执行窃听任务。在苍蝇出发之前，要让它吸一口神经毒气，这种毒气能在预定时间内发挥效力，苍蝇到达窃听目标后，就很快地毒发身死，跌落在墙角桌旁，它携带的窃听装置就不致受到苍蝇翅膀振动颤音的干扰而影响窃听效果，房间里的声音就点滴不漏地收录下来，传送出去。前苏联也使用过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苍蝇。据传，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室就飞进过一只这样的苍蝇，它是前苏联克格勃派来的。如果不是一个保安官员在例行无线电监听时发现的话，它可能连续工作几周。最近，西方某国又研制出一种人工苍蝇，它是仿照苍蝇的某些特殊的生物学特性而制造的。这种人工苍蝇有一套完整的窃听收发装置，它能象真苍蝇那样寻觅着带有人体特殊气味的目标，叮在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进行窃听；它的飞行方向还可以用无线电遥控，使它在完成窃听任务后再返回基地。

70年代初，美国情报机关别出心裁地研制出一种更大功率的窃听器。他们先把它系在经过专门训练的鸽子身上，然后再把一束激光射向要窃听的目标(如某个房间的窗户)，鸽子就会乖乖地按着激光的导向，飞落到指定地点。这只不寻常的鸽子用嘴啄一下它身上的按钮，窃听器就脱离鸽身，开始窃听，而这只“听话”的鸽子就又轻松地飞回原地。

3. 电话窃听

一架小型无线电传声机可以轻易地隐藏在电话机里。谈话进行时，传声机把电话线送来的电脉冲转变成为无线电信号，然后由收报机接收。这是一种袖珍装置，大小约如半个火柴盒。将它同电话机的电路串联，从那里取得动力，便可以无限期使用。

监听电话最基本、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使用直接录音。首先得弄清楚接连电话机和接线匣的一对电线，然后接上偷听装置——通常是配备听筒的扩音器和有自动开头的扩音器。那个开关只在收到强度预先确定的信号时，才开动录音机。不用说，这种音响式的开关是一种灵敏装置，它会受到附近响

起来的信号的影响。

还有一种用间接录音的方法，根本就无需直接干扰电话线。取而代之的是把感应线圈置于靠近电线的地方，以便搜集电线的信号。感应线圈的信号输送到扩音器去，以便就近监听。或输入一个发射机里，并随即传到远距离的收听站或录音机去。

有一种情况可能要撒开大网，偷听同座建筑物里的许多房间和电话机。为此，设计了一种多触觉传递监听系统，它能够同时对多至 21 个地点接收信号传送到 1.6 公里远的地方。这些装置或利用声波启动，或由电话线电流开关来启动。将来这种装置还将能够传递声波频率的资料。整个装置将组装成一只结实而便于携带的箱子，以便易于移动并在一辆汽车或一座建筑物中发挥效能。

4. 激光监听器

有些窃听方法根本不需要窃听器，大楼外面的窃听设备能够收到电子计算机发出的无线电波，然后由另一部电子计算机进行翻译。

在所有窃听技术中最吸引人的是向窗子或者稍有声波就能产生振动的任何物体表面发射激光束。激光束能够自动探测到声音的回响，把它们传送给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又把它们还原成声 164 音。利用激光可以侦测到隔着一条街的对面窗内的谈话，而不需要冒风险去安装窃听器。

这种激光监听器所应甲的原理是：当房间内的人讲话时，其声音会引起窗户上的玻璃产生轻微振动，这时，若有一束激光射到玻璃上，便会因受到玻璃振动而造成调变，而这些经调变的激光束反射回来后经过解调设备便可得出原来的声音信号。

激光监听器最大的优点是临场感强，好像就在现场之窗外或隔壁一般。当然，它也会受到某些因素影响，如：交流电白热光产生的杂音、气体放电设备如荧光灯、水银灯、钠蒸气灯光等可能会产生杂音，直接照射的阳光也可能影响激光侦测设施；在做长距离侦测时，空气间的电流会对激光增加一些闪烁现象，造成一种类似人吹麦克风般的杂音。

激光监听器由激光发射器(激光光源)和激光接收器两部分组成。在工作时，被窃听处要有一个能随声波振动的反射面(如窗玻璃)，而接收器要安置在能直接接收到反射激光信号的位置。因此，在使用激光监听器时，要估算好激光发射器与激光接收器应在的位置，其道理与镜面反射可见光的原理相同。

反射面越薄且对声音的反应越好，则此监听器的监听灵敏度就越高。由于一般玻璃的厚薄不很均匀，因此，激光束对同一块玻璃不同位置的作用，就会有不同的监听灵敏度。

当然，监听效果还与监听距离有关，距离较近时容易将发射的激光束对准目标，接收器也容易接收到信号。距离较远时则相反，对准目标和接收信号都会困难些。若把来福枪的望远瞄准器与监听器结合起来，便可解决距离所造成的障碍。

(二) 第三只眼睛——花样翻新的窃照设备

间谍常常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近重要的文件，但是不敢把它们拿走，怕被发现而遭逮捕。当一个间谍遇到这样的问题时，用照相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普通照相机容易引起怀疑，因此西方和东方的科学家便集中精力制造越来越小的间谍专用照相机。在美国，有一名时装模特儿，把两个微型照相机装在她的乳罩里去参加时装展览，以此进行情报活动。在联邦德国，有些风度翩翩的“企业家”叼着的烟斗是能自动调整焦距、每次能照二三十张相的微型摄影机，他用咳嗽声来控制快门，把他看到的景像有选择地摄入微型底片。

现在一般是利用手表，这种手表不仅会报时，里面还有精致的微型照相机，它的微型胶卷可以在光线不好的条件下进行拍照。这些微型照相机不仅能有效地照出大照相机所照的东西，而且伪装得非常巧妙，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安人员才能检查出这种手表还有另外的用途。

普通男女日常携带的其他用品也能像手表那样装上照相机。美国人已经巧妙地改装了一种可以藏在自来水笔里的微型间谍照相机。这种钢笔可以用来写字，同时藏在笔里的照相机装有足够多的胶卷，可以拍摄许多文件。这样的胶卷经常供给间谍，而且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瞬息之间装在照相机里。打火机经常用来装微型照相机。拍摄文件时，只要把打火机上的照相镜头在文件上轻轻摩擦一下就行。如果被人撞见，就假装放下打火机或打火抽烟掩饰过去。

香烟盒照相机现在已经过时了；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它们太笨，太平常，虽然它们比后来的超微型照相机优越。烟盒照相机完全是自动化的，拿着它贴在文件或蓝图上面来回移动，里面的微型胶卷就自动转动，可以拍下好几十张照片。然后把微型胶卷冲洗放大，拼在一起，就能得到同原来的文件一样大的完美的复制品。

微型照相机可以藏在助听器、袖珍半导体、妇女的连镜小粉盒、眼镜盒和衣服刷子里面，间谍的每一样日常用品，几乎都可以巧妙地装上微型照相机。

还有一种能在黑暗中拍摄的红外线摄影机。有一个前苏联特务，设法混进联邦德国一间军事工厂，利用人们不注意，躲在厂里，等工人下了班，所有电灯都熄灭了，就用红外线摄影机拍下秘密图纸。不幸的是正当他忙于拍摄时，被人当场擒住，连相机也被缴获。联邦德国情报机关发现这种相机可以在四壁密封的绝对黑暗中，拍摄出清楚的照片。红外线照相机利用普通的红外线照明，甚至能拍摄封在信封里的信件内容。有一种微型针状灯，把它插进封好的信封里，就能把信件清晰地显示出来。有一种高速翻拍机，每小时可以翻拍 840 页。

大多数照相机都有许多活动部件，因此总会发出声音。但是能为照相机远距离分程传送的“光导管”或一束光纤维，为秘密照相提供了方便，消除了上述的缺点。就是这么一种远距离照相机，断送了英国下议员、前皇家海军司令安东尼·考特尼的灿烂前程。

英国海军司令考特尼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特别反对前苏联滥用英国外交上的好客来大搞名堂，他要求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最后的结果是，前苏联就不能再任意滥用好客的礼仪和特权了。这种限制给前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

带来了种种不便。克格勃当局于是就决定败坏考特尼的名誉，并且把他列在败坏名誉单子的最前列。1961年，考特尼访苏，一个名叫齐纳达·葛里戈里叶夫娜·伏尔科娃的导游主动去接近这位当时还没结婚的海军司令。

照相机就在附近，但是考虑到海军司令考特尼也不是那么天真无知的人，所以克格勃的执行人员就利用光纤维的折光性能，把考特尼和伏尔科娃的不正当行为绕墙折射到一架远距离的照相机透镜上。

5年以后，许多印好的考特尼和伏尔科娃在一起的照片就送到了他的国会同事、他的新婚妻子和一些喜欢桃色新闻的杂志发行人手里。这样又过了一年，安东尼·考特尼就在大选中被击败了，并且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离开了军队。

1991年，一个足金指环照相机在英国南肯辛顿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场以1.2万美元售出。这种指环相机据说只有2个，它是70年代初克格勃用于偷拍美国的核武器及太空计划秘密的。这种小型相机的镜头设在中心石中，它的快门安在刻花指环里面。它用的是35毫米的胶卷，但由于相机大小装不下，必须剪断，它只能拍8张照片。

(三) 微型发报机

美国科学家们制造了一种像一块方糖那么大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一种调频发报机，利用 1~5 个晶体管，依靠它的小电池，能发时到数公里远的地方，而且能连续播发 100 个小时。如果把它藏在小汽车的电池组里或者电话里，它能利用小汽车电池组或电话系统作它的能源。

美国间谍有时把自己变成活动的无线电发报机。他们在衬衫或短外套的下面带一根天线，发报机极小，一般不会被察觉，即使这个间谍被保安人员搜身也不会被发现。有人认为，这样的间谍装置可能在暗杀肯尼迪总统时使用过。为了万无一失，若干杀手把枪对准了总统，保证同时齐射。但是，分散的杀手是如何联系的呢？据说他们都带有极小的收发报机，当总统的车队快到达时，最靠近汽车的一个杀手便开始数数，同时举起手中的伞(发射天线)，他嘴边的小型发报机把口令传给其他杀手，当他数到“5”时，所有杀手一齐开枪，肯尼迪一命呜呼。

现代科学家们已经解决了制造微型发报机的问题，拥有发报机的人想怎么用它，就可以怎么用它。它们可以挂在它们自己的 30 厘米长的天线下面，而天线可以卷在窗帘里，藏在裙子或长裤下面。它们可以藏起来，可以同水管、栏杆甚至金属床架联系起来，这些东西当作天线使用，发射距离就大大延长了。

1965 年 4 月前联邦德国反间谍机关破获了一宗克格勃间谍案，缴获了一种红外线发射机。它利用将声波转变成光波的原理，将声音变成光线，用红外线发射出去，红外线即使是在夜间发射，也看不出来，除非使用特别的仪器侦察。克格勃特务在离美军司令部只有几码的一座西柏林的大厦上，用这种发射机向东柏林的克格勃机关发送情报。这种发射机唯一的缺点是发射者与接收者之间必须没有障碍物阻挡。对于在柏林活动的间谍来说，这是一件很理想的工具。

伊朗陆军少将阿哈迈德·穆加雷比被前苏联招募为间谍后，在 4 年多时间里，克格勃为他提供的现代化工具有微型照相机、快速发报机和微型闪光收报机等等。快速发报机是遥控的，只要用 20 秒钟就可以拍发事先用 20 分钟录制的情报。微型闪光收报机安装在穆加雷比的家中，由前苏联使馆的克格勃人员用无线电信号操纵，收报机上彩色灯泡发出两橙一绿两蓝的闪光，就表示穆的电报已被前苏联大使馆收到。和穆加雷比接头时，只要驾驶大使馆的汽车到穆的住宅附近稍稍停留，按一下装在车座下边的键钮，就能使穆加雷比家中的遥控快速发报机发报。

(四) 杀人不见血的间谍武器

一天，克格勃的一个头目接见了克格勃恐怖分子保格丹·史塔辛斯基。这个头目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件奇怪的东西，交给了保格丹。它样子像手枪，是一段不到 20 厘米长的金属管，有拇指般粗，在末端有枪机和撞针。管子分 3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扳机和一个 1.5 伏特的电池；第二部分是自动撞针，它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第三部分是一个玻璃药针瓶，瓶中装有 5cc 氢氰酸。当撞针击破玻璃瓶之后，毒药和空气接触立即化为雾状，在 60 厘米内对准一个人的面部喷射，可使人立即致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其症状有如心脏病突然发作，一般的解剖也无法弄清其真相。克格勃头目对保格丹交代说：你的任务就是前往慕尼黑，暗杀一个乌克兰流亡分子、“乌克兰民族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列夫·利别特。因为利别特已被中央情报局收买为美国特务，并正在接受专门训练，准备到前苏联活动，是慕尼黑最有危险性的人物，必须迅速干掉他。

保格丹手里拿着那件奇异的家伙，心里免不了忐忑不安。那个头目似乎看透了这一点，便对他说，只要在行动之前先服一粒解毒丸，行动之后再吸一口解毒气，就可以保证安全无事了。

为了让保格丹放心，第二天早晨，那个头目又把保格丹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这时，克格勃的头目指着自己拴着的一只小狗对保格丹说：“这枪的保险盖已打开，准备射击吧！”保格丹吞食了一粒药丸，对着小狗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小狗也没有叫一声就倒地死去了。保格丹又立即打破一个玻璃瓶，吸了一口解毒气，果然安然无恙。

不久，保格丹伪造了一个假身份，飞到了慕尼黑。第二天早晨，他在吃早餐时就吞了一粒解毒丸，穿戴好之后，便把毒枪放在大衣袋内，开始去执行杀人任务。他接连等了两天都没有等到。第三天上午，他看到一个身材矮胖的人下了电车，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认出了这就是利别特。于是，保格丹立即奔上办公楼三楼。当利别特上楼时，他便从楼梯下来，他用报纸包住手枪。当他和利别特碰头时，当即举起右手，扣动扳机。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利别特往后一仰，从楼梯滚了下去。保格丹匆忙打破玻璃瓶，吸了一口解毒气，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大门，将枪和药瓶扔进一座桥下的溪水里。当他赶回酒店的途中，看到利别特办事处门前围满了人，停着警车和救护车。他回到酒店，付清房租，搭乘下一班火车到法兰克福去了。利别特的尸体经法医解剖，认为是死于心脏病。

对保格丹的“战绩”，克格勃总部十分满意。两年之后，总部又要他去慕尼黑暗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首领斯蒂芬·班达拉。由于班达拉身上带有武器，身边又有一名保镖，因此克格勃又专门制造了一支双管毒气枪。这支枪可以同时打死两个人。保格丹到了慕尼黑之后，便在班达拉寓所的周围进行观察。一天下午，他发现班达拉只身一人驾车回家，车驶进车房后也没有关门。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保格丹急速追了上去，把毒气喷到班达拉的脸部。只听“扑通”一声，班达拉立刻倒地而死。不过，警方经过化验，发现班达拉的脑中有少量的氢氰酸的残留物。

由于保格丹完成任务出色，克格勃总部授予他红旗勋章，并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职业冷血杀手。谁知，保格丹在西方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德国姑娘英格·宝尔。他俩结婚之后感情甚笃，但克格勃对这个德国

姑娘却颇不放心，处处监视，终于引起了英格的不满，加之保格丹与上司有矛盾，因此他们便叛逃到了西方，从而公开了上述的杀人勾当。

克格勃还有其他杀人武器。

一天，保加利亚作家马尔科夫，正加入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

突然，一名男子用雨伞尖头刺了一下他的大腿。他当时并没在意，但回到办公室之后，便觉得大腿疼痛难忍，随即被送进了医院。4天之后，他不幸身亡了。经解剖，在他大腿内找到了一枚直径只有1.52毫米的超小型弹壳。弹壳中央有二个直径只有0.35毫米的小孔，这是装毒药用的。虽然它只能装2~3毫克的毒药，但由于是剧毒，所以足以致人于死命。

马尔科夫被杀之后，巴黎又发生了另一起用毒伞枪杀人的事件。被害人是从保加利亚叛逃到法国的科斯托夫。那天，他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地铁车站内候车，突然觉得背部好似被石头重击了一下。回家后他感到剧痛，让妻子检查一下背部，发现上衣及衬衫被刺破一个小洞，背部有一个象被蜜蜂螫过的斑痕，周围有血。当即他被送进医院。医生经过反复检查，发现他的背部有一个尖形金属物。医生们迅速将其取出。当晚科斯托夫发了一场高烧，经过医生们的全力抢救，终于脱险。

使用放射性毒药，也是克格勃进行谋杀活动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比如，叛逃到西方的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大尉正在法兰克福参加一次会议，突然感到不舒服，接着就昏厥了过去。

当他恢复知觉后，就开始剧烈呕吐。医生们起初把他当作胃炎治疗，但毫无作用，后被送进法兰克福一家医院。5天后，霍赫洛夫照了一下镜子，竟然认不出自己来了。他的脸部有吓人的褐色条纹，浅黑的斑点和青紫色的疙瘩，整个脸部已经变形。他的眼睑里分泌出一种带有粘性的分泌物，血液从毛孔里渗透出来，皮肤变得干燥、皱缩而发红。一位著名的教授怀疑他是中了稀有金属铊的毒，可是使用解毒剂又不起作用。这家医院只好把他转送到当地一家美军医院。美军医院组织了6名军医组成的医疗小组，使用了一切新药，但都无法使其病情减轻。可是，约摸过了3个星期之后，霍赫洛夫的病情却开始有所好转。当他病愈之后，不仅头发掉光，而且满头留下斑痕。毒物学家详细研究他的病历之后发现，这是因为他的食物中被人掺进了铊毒。这种铊受过强烈的原子辐射，分裂成为很小的粒子。这种粒子通过饮食进入身体之后，就完全分解，并以剧烈的辐射渗透他的全身，便霍赫洛夫差点丧命。

克格勃还有另一种杀人武器，就是毒针。所谓毒针，就是谍报机关专门为暗杀行动设计制造的一种注射药的特殊注射器。注射液一般都是剧毒药品或剧毒细菌。这种剧毒药品或细菌一旦侵入人的肌体，就会使人呼吸窒息、心脏麻痹而迅速死亡。这些毒针通常被伪装成日用品，如钢笔、手杖、铅笔之类，有的还被伪装成女人手上的“宝石戒指”。可是，人们哪里知道，这些都是瞬间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武器哪！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凶杀武器，也是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在美国谍报机关火器管理局凶杀武器收集所里，收藏和陈列着数以千计的奇异的特务凶杀武器。有各种外形伪装成日常用品的古怪枪支，如外表同普通香烟盒毫无二致的“香烟盒枪”，还有“钢笔枪”、“铅笔枪”、“烟斗枪”、“铜制钥匙枪”、“手杖枪”、“雨伞枪”、“轮胎压力枪”等等。美国还制造了一种火箭手枪。这种手枪的发射体后面有4个钉头大小的反冲器，装上四五枚

1 英寸长的子弹后，扣动扳机，锥子就会把火箭往后打，撞上钉子，钉子点燃发射火药，弹簧夹子夹住这个发射体，直到产生高压，然后再喷射出去。还有一种灰色光滑的塑胶枪，名叫“特死枪”。其作用就象汽车里的电容器放电系统那样，当把小小的电插头插上去时，每个插头有二个小小的倒钩，连接着 4 米多长的绝缘电线。这种枪开枪时，可放出 5 万伏的电压，倒钩若挂上人的衣服，就会使人的心跳加速而被迅速解除武装。

(五) 隐显墨水与微点腋片

在间谍战的神秘世界里，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用普通信件或用电话传送情报是不安全的，电话容易被窃听，在战时政府检查私人信函也早已成为惯例。因此，远在古代，人们就知道用密封的蜡丸传送情报，后来就用隐显墨水(或称密写墨水)书写情报，不过很难确切说出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种墨水的。

大约在 6000 年前，埃及人首先制造出有色墨水。据历史记载，有个叫菲罗的人，是希腊军事学家，他用一种叫“没食子”的药制造了隐显墨水。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等也是利用这个配方制造隐显墨水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隐显墨水的应用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当时大多数间谍都利用隐显墨水密写情报。德国间谍应用丰富的化学药物知识，造出了五花八门的隐显墨水，使盟国的反间谍机构穷于应付。

隐显墨水大致可分为 3 类。

第一类是有机溶液，如牛奶、柠檬汁、醋和体液等。用这类溶液写的纸只要稍微加热，立即形迹毕露。这类墨水有它独特的优点：俯拾即是。那些不可能接触到化学药品的间谍和犯人，可以利用唾液密写情报。还有不少间谍在用完较高级的隐显墨水后，就求助于尿。

第二类是用化学药水制成的墨水。这类墨水干时没有颜色，用适量的试剂处理后就会显色。大多数普通有色墨水是用无色溶液的混合物制成的，如硫酸铁与鞣酸混合生成带色液体。制造隐显墨水就是采用上述工艺，不过两种化学药品不是在工厂里完成反应，而是留待纸上完成反应。例如用无色的硫酸铁溶液在纸上书写，然后用氰亚铁酸钾轻轻涂抹，即刻显出艳丽的蓝颜色，而用氢硫酸钠涂抹就会变棕色。硫酸铜或酚酞可用氨气显色，还有其他许多指示剂也可这样用。使用隐显墨水的秘诀在于找到一种物质，它需要非常特殊的药剂或者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才能显示颜色。还有更高级的化学药品必须经过几个中间显色步骤才能使之显色。

第三类叫放射性墨水，它是用摄影法显色，如镭 D 丙酮溶液曾被间谍用来在衣服上密写情报，而丝毫没有引起反间谍机构的怀疑，因为他们只注意寻找纸上的隐显墨水。用这类墨水书写的衣服，只需放在 X 射线底片上曝光，即可显色。

除了上述 3 类墨水外，也可以用淡水书写情报而无需加入任何化学药品。用水在纸上写字，扰乱了纸的纤维，把它放在碘蒸汽中，碘蒸汽就固定在被字迹扰乱的纤维上而显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惊险间谍案不胜枚举，其中，在第一次世界时，涉及隐显墨水的最著名的间谍要数德国女间谍玛丽亚·维多莉卡，她皮肤白皙，碧眼金发，以“美丽的安特卫普女人”的外衣作掩护，成功地躲过美国的反间谍机构达 5 年之久。美国的情报机构只知道她是个普鲁士贵族，后来在无意中截取到她的一封似乎无关痛痒的信，因怀疑信中有密写而做了检验，果然在信纸的右上角发现了密写的情报。维多莉卡被捕前，住在美国长岛一家豪华的拿骚滨海旅馆，她的房间正好监视着美国运送去欧洲军队的航道。当时美国总统亲自命令将她逮捕，从她的住处搜查到大量的隐显墨水和密写用的圆珠笔，还有两条浸透了隐显墨水的头巾。面对大量间谍活动的罪证，这个名噪一时的迷人的女间谍，终于精神崩溃，还未送交法庭就一命呜呼了。

由于间谍频繁地利用隐显墨水，而很多隐显墨水就是用常用药品作原料，也有人因此而遇到麻烦。曾经轰动一时的“玛达·哈莉间谍案”就是一例冤案。这个不幸的女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起诉的理由是她带有神秘的隐显墨水，指控她的人断定只有那些与西班牙间谍有联系的人才能得到这种药水。其实这种药水是水银的氧氰化物，在世界各地的普通药房均可买到。玛达·哈莉否认它是隐显墨水，说这是她经常使用的避孕冲洗药水的部分药品。但这种药水确实可以用做隐显墨水，用硫酸就可使它显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间谍学校专门训练间谍用极普通的物质写情报，如用阿斯匹林、含有酚酞的轻泻剂、香烟灰和甘油等物质，当然也使用更高级的隐显墨水。纳粹间谍乔治·达斯及其同伙在大西洋岸潜水登陆，他把灰色的药品（一种新型隐显墨水）装在密封的火柴盒里，这种药品泡在水里，用火柴当笔即可书写情报。药水干后，字迹就看不见了，用紫外光照射就显出颜色，达斯一伙登陆不久即被逮捕。在他的手帕上密写有联系人的姓名和住址，把手帕放在氨气下，就显示漂亮的粉红色。离开氨气，颜色立即消失。

另一纳粹间谍乔·K，用氨基比林作为隐显墨水，这是一种随处可买到的普通头痛药。他用牙签当笔，在一封寄往德国的普通信件上，密写下关于军队调动和舰只损耗等极有价值的情报。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不管乔·K如何狡辩，法官仍判他20年徒刑。

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致力研究更安全、更先进的传送情报的技术。

在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人们可以用密码、无线电报、间谍卫星等方式来传送情报。相比之下，用隐显墨水传递情报速度既慢，所占面积又大，而且不安全。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把它送进博物馆，那也是错误的。隐显墨水用起来方便，而且目前还在研究更高级、更难破获的隐显墨水。因此可以断言，只要世界上有间谍活动一天，就必然会有人使用隐显墨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德国人发明了微点胶片的新技术，这一新成就使隐显墨水大为逊色。利用这种微点技术，可把大量的情报微缩在比普通打字机的句号小得多的一小点胶片上，使用苯胺碱的相片感光机，就可阅读微点胶片上的情报。寄出微点胶片很方便，可以利用寄无关紧要的信件作掩护，把微点装在粘合的信封口盖上。微点胶片有发光的特性，胶水正好可以遮盖这一缺点，普通胶片卤化银的结晶颗粒太大，不能缩微成小点；微点胶片有明显的优点，它比最高级的隐显墨水能传送多得多的情报，制造微点胶片的药剂也并不复杂，从普通药店里极易弄到，因而它可以在战场、野外等任何地点就地制造。

很多工业间谍也喜欢采用这种微点胶卷方式，如在美国萨亚纳米德公司工作的化学家西德尼·福克斯，从公司偷走了关于生产新的抗生素的高度机密资料，把它拍在微型胶片上，然后放在雪茄烟中寄到意大利，卖给意大利的制药商。

(六) 麻醉剂与间谍粉

无味和速效麻醉剂是间谍的重要用品之一。利用它常常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个法国特务机关的军官讲了他使用麻醉剂的经验：

“虽然国际上的记载证实一些间谍成功地使用特制巧克力或其他食品，或者在饮料中滴麻醉品把对方麻醉住，但这种办法很大程度上依靠机会和对方戒备的程度。我的看法，大多数情报专家也认为，最好的麻醉办法是：确定了对方不是一个滴酒不入的人，我在酒柜里的每一瓶酒中加入麻醉剂。即使是个警惕性最高的人，当他看到他的主人和他一起喝同一个酒瓶里的酒，而且主人首先把酒喝了下去，那么他的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其结果应该是两个人都被麻醉，而不只是一个人被麻醉。但是我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对方来到以前服用解毒药，使自己不会被麻醉。这样，成功几乎是有把握的。只要你使用正确的麻醉剂和正确的解毒药。”

间谍用的有些麻醉剂是致命的。它们装在小药瓶里或做成药丸。这种致命的麻醉剂不到紧急关头是不使用的。如果一个间谍被捕并且要受极刑，他可以选择使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受苦或泄露重要秘密。根据许多官方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和德国的间谍曾经采取过这种极端措施。许多纳粹头子，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受审讯和被处死。美国的U—2间谍飞机驾驶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当他的飞机在前苏联领空被击落时，他带有速放毒药。如果鲍尔斯愿意的话，他也能避免被捕和受审讯；但是鲍尔斯决定要活下去。

为了跟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行动，克格勃使用了一种称为间谍粉的化学跟踪剂。只需将极少量间谍粉或其甲醇溶液喷洒在使馆人员经常接触的物品上，例如汽车的座垫、方向盘或门把手上，人们沾上间谍粉再去接触别的东西，就能显示出他们的行踪。

间谍粉原来是一种称为硝基苯戊二烯醛的化合物，是一种不溶于水、易溶于甲醇的淡黄色结晶粉末。为了检查物品上是否涂有间谍粉，美国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方法。只需用一小块蘸有甲醇的棉花揩拭被怀疑的物品，然后滴上一滴0.1%的间禁二酚溶液，再加一滴盐酸，若有间谍粉存在会立即显现粉红或紫红色。间谍粉量越多颜色越深。这方法非常灵敏，100平方厘米上有1000万分之一克间谍粉便能检查出来。如用仪器代替肉眼，更灵敏10倍。

美国化学家作了一些试验。将0.5毫克/毫升间谍粉甲醇溶液喷洒在门把手上，干燥后，请一人打开门走出去，再打开另一扇门走进另一实验室，记下他接触过的所有物品。

45分钟后，在这人手上以及他接触过的所有物品上都查到了间谍粉。

有了这种检查方法后，美国方面对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中最有可能被跟踪的人的汽车进行了实地检查，结果发现有5辆汽车显示正反应。为了进一步确证，将揩拭后的棉花球送往实验室用更精密的仪器检查，结果确实无疑。

经试验，美国化学家发现徐在物品上的间谍粉只需用蘸有甲醇的纸巾擦揩两次便能完全除去。用肥皂和自来水仔细擦洗也能将沾在手上的间谍粉除去。

(七) 星载传感器

传感器是卫星监视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探测物体辐射或反射的电磁波来记录地球表面的图像。即使处在地球周围 200 ~ 800 公里的轨道上，它们也能以非凡的清晰度拍照地面上的物体。最常见的可见光传感器已能达到 0.1 米的地面分辨率，工作在微波波段的合成孔径雷达能穿透浓云和迷雾对地面成像，热敏红外传感器能在夜暗中有效地视物，后两者还具有一定的识破伪装的能力。因此，如今地球上的任何重要目标和重大活动，无论隐蔽得多么巧妙，也难逃卫星的慧眼。

星载成像传感器所搜集的地面图像可以模拟形式记录在胶卷上，也可以数字形式形成于电荷耦合器件(CCD)等传感器上。曝过光的胶卷可用回收舱送回地球，也可在卫星上显影并用电子装置加以扫描而变成电信号，然后通过微波线路传回地球。CCD 等传感器所获取的数字图像数据可直接地或经由通信卫星实时或近实时传给地面站，也可暂存在星载磁带记录仪内待卫星飞进某一地面接收站接收范围时再快速下传。

成像传感器的性能可用图像几何特性、对比度、频谱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等技术参数来描述。对比度是指场景中物体亮度与背景亮度之比，它可能与测量时所用的谱段有关。光学系统的空间分辨率系指传感器记录场景中微小细节的能力。然而，图像上能看得见的物体最小细节的尺寸确定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取决于系统本身的空间分辨率，又取决于被观测物体的特性，如光照条件，被观测物体的大小、形状和排布，以及大气对光在到达传感器之前的影响等等。

传感器的分辨率可定义为两个相同的小物体仍能被区分为两个单独物体时的最小间距。这一定义适用于使用照相胶卷的相机系统。

在军事照相侦察卫星和民用地球遥感卫星上，使用各种不同的成像传感器来观测地球表面，其中主要有照相机、电视摄像机、多谱段扫描仪、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等。

照相机通常分为画幅式、全景式和航线式几种类型。它们各有优缺点，适于不同场合的应用。画幅式相机图像畸变小，几何精度高，通过重叠图像可得到立体观测能力；全景式相机对地面轨迹两侧覆盖范围宽，可是图像畸变大；航线式相机结构简单，但不能用于立体观测。

现已制成 400 多种型号的玻璃，利用计算机进行组配，可把它们结合成高精度的光学镜头；这种镜头，是卫星在数千公里上空识别地面目标所必需的。用这种方法拍摄的照片，清晰度极高，分析专家已经能够从中看到在阿富汗的前苏联士兵正在清洗他们被污染的车辆——这是从事化学战的一个有力证明。

多谱段扫描仪主要有光机扫描仪和推扫式扫描仪之分。前者能探测较宽的电磁波谱范围，而且便于星地数据传输，但几何畸变较大，空间分辨率较差。后者使用探测元阵列，如 CCD 线阵或面阵。CCD 是一种大容量、高密度信息存贮器件，它勿需机械扫描、激光扫描或电子束扫描。因此，推扫式多谱段扫描仪具有结构简单、无运动部件和几何畸变小等突出优点，但由于探测元阵列的局限性，目前其电磁波谱探测范围主要限于可见光和近红外谱段。

即使是最先进的光学镜头，在夜幕和恶劣的天气下也会拍不清物体。红

外照相已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在某些方面，要比最好的光学摄影胜过一筹。例如，现在已有可能根据红外摄影的照片，判断在某个机场几小时之前曾停过某种型号的飞机，甚至能判断飞机燃料箱随油量。红外摄影能有这种神奇魔力，是因为它能记录飞机的几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相对热通量密度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被广泛应用于海洋监视、地球资源勘测和军事成像侦察等方面。合成孔径雷达其实也是一种侧视雷达，只不过其天线的物理尺寸较短，但随着卫星的运动，短天线把在飞行轨道不同点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用电子方法加以相加和合成，从而达到高分辨率所需要的长天线的效果。合成孔径雷达的显著优点是不受云雨和夜暗条件所限制，可全天候、全天时工作，能透过干燥地表揭示地下数米深处的奥秘，甚至能“看到”数百米深的海底。其缺点主要是图像几何畸变较大，判读也比较困难。

未来的照相侦察卫星必将使用性能更优、质量更佳的遥感器。例如，一种目前正在研制中的星载多谱段扫描仪将能用多达 200 个以上邻接谱段同时搜集地面目标图像。由于每种物质都具有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辐射特性，这种真正的“多”谱段扫描仪在从太空识别地面物体并详细描述其特征方面定会有出色表现。这种遥感器还可能准确地确定各种武器是用何种金属制造的——是铝，是钢，是钛，还是别的什么金属。这些信息能透视出武器的性能，因而对目标判读大有用处。此外，这种遥感器也可能描述各工厂散发出来的不同气体的特性，从而可判断它们是否在从事化学武器生产。

对于目前业已在航天遥感领域崭露头角的合成孔径雷达，随着其性能的不断改进和判读技术的不断提高，它们在未来的成像侦察和民用遥感方面必将大显身手，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可以预料，无论星载遥感器性能还是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都会取得重大突破，因而有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图像并从中提取更多、更有用的情报。

(八) 新型反间谍侦察工具

夜视镜——这是一种可以在漆黑的夜间看清对面物体的望远镜。普通夜视镜只供一人使用，如果把镜片取去，换成3寸阔的屏幕，就可供数人同时观看。夜视镜还有调节器，可以配上单镜头反光摄影机，用来拍摄屏幕上出现的图像，效果极清晰。此外，还可换上另外一个调节器，与录相机相连，用来录相。

夜视镜有两种类型，一种靠自然光源，例如星光，而可将其光量强化放大7万倍；另一种是红外光源，它可以在黑夜中茂密的森林内看到100米以外的人。如果在微弱的月光下，则可看得更远，看到200米外的汽车牌号。

弹性潜望镜——这是一种可以在屋外透过任何细小的墙洞、壁缝、钥匙孔来偷看屋里情况的工具。它由光纤制成，是一根很细小的玻璃管，像一条粉丝，具有弹性，可任意弯曲。一端是个微型镜头，可将屋内的光或图像，原原本本传至另一端，另一端则装着一个窥视镜，可将图像放大，使人看得一清二楚。这种工具很简单，便于携带，使甲方便。这种潜望镜还可配上摄影机，把看到的情况记录下来。

个人雷达探索器——这是一种可以在黑暗中探察出室内有无物体存在或物体移动的遥感工具。它的别名叫“小雷达”，体积很小，可随身携带，但灵敏度很高，其原理同军用雷达一样，利用电波反射来侦察任何物体的方位和距离。它可以在35米范围内，追踪任何移动的目标。它有一个很小的电表，从表上的指针可以看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

电子耳——这是一种可以在黑暗中探听远处细微声音的电子侦听工具。这种工具外形看来象手电筒，有着手枪般的把手及耳筒，使用时只要将电子耳指向目标，就可在150米的距离之内，收听到目标发出的最细微的声音，并把它放大到足以听得一清二楚的程度。如果把这种“电子耳”和“夜视镜”配合一起使用，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如同白昼一般，对100米内的目标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星龙”喷液——从前，反间谍人员要想偷看被监视对象密封的文件时，往往使用“蒸气开封”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虽仍行之有效，但稍一不慎就会留下痕迹，被监视的敌人发觉后即逃之夭夭。现在，有些国家的反间谍机关已开始使用一种能使信封透明的喷液，名叫“星龙”。把液体喷在信封表面，30秒钟后，信封就变成玻璃纸一般透明，信笺上书写的文字就历历在目。喷液于透后，信封上不留一点痕迹。有了这种喷液，间谍窃取信函中的机密也变得轻而易举了。

